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十九世紀不列顛

選舉改革與身體表演（1865-1880）

Electoral Reform and Body Performance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1865-1880

王璟銘

Ching-Ming Wang

指導教授：林美香 博士

Advisor: May-Shine Lin,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June, 2024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十九世紀不列顛
選舉改革與身體表演（1865-1880）

Electoral Reform and Body Performance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1865-1880

本論文係 王環銘（學號 R10123001）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n 28-06-2024 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Ching-Ming Wang (student ID R10123001) 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林美惠

(指導教授 Advisor)

楊尹庭

李婷婷

庄育宜

系主任 Director: 陳碧宏



誌謝



穿著和當初面試時一樣的西裝，坐在同一間會議室的同一張椅子上。得知口試通過的當下，即使窗外雷雨交加，我卻看到了三年前的和煦暖陽。喟嘆隙駒、謳歌滄桑本是史學家的日常，我仍無法豁免於在竣工之後，發覺時間感急速塌縮的那份驚詫。儘管實際撰寫論文不過數月，但若沒有一路走來的陽光、土壤、空氣和源泉，我這粒種子不可能發芽茁壯。

首先，我要感謝照亮我的幾輪太陽，他們從不同角度給了我無私的關懷和溫暖，請容我擅自用文字將這些陽光占為己有。恩師林美香教授，是我在學術上的啟蒙者和引路人。儘管我不是但丁，上天卻還是為我帶來了維吉爾。大二選修英國史時，期末報告得到老師肯定，那本頒給最佳講者的《貝葉掛毯》，現在還收在我的書櫃裡。大三恰逢疫情，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以〈十七世紀英格蘭菸草藥用價值的理解與應用〉為題，完成大專生研究計畫。期間更在老師鼓勵下，上修研究所專題課程。然而，無論是在研究室還是國合長辦公室會談，我常赧於提交不純熟的稿件占用老師的工作時間，但老師從未因為事務繁忙而推辭。老師的批改建議就像五月日光，既有初夏的犀利，也有季春的包容。我的文章若能有一絲洗鍊，要歸功於縱橫在草稿周圍的大量筆墨。更令我深感佩服的是，我總能在兩天內收到批閱完的草稿。除此之外，我的研究生活也得到老師的諸多眷顧。無論是研究助理還是教學助理，老師都給予我完全的信任，並以培育研究者為方向安排工作，讓我得到寶貴的默會知識和現場經驗。我在碩士階段能夠累積四篇會議論文的發表經驗，也多虧老師在碩論尚未成形時依然准予放行，還提供我在課堂上分享的機會。老師完全支持我往學術發展的目標，讓我在感到挫敗時依然具有信心。平時生活也承蒙老師的悉心關切，還能時常跟著老師品嘗世界各地的特色料理，談論各式各樣的話題。感謝老師教導給我的一切，老師一直是我為學的榜樣，我時刻自礪，望能不負所學，無忝師名。謹在此致上最深切的感謝。

從政大到臺大，陌生的環境令人迷惘，但我卻和宋家復教授一見如故。跟著老師在小間研討室的三門課，使我對文字、掌故和人物關係的洞察力有了飛躍性的成長。老師從不吝於與我對話，唯一一次阻止我繼續問下去，是因為佔用了太多課堂時間。課堂時間也是永遠不嫌多，延長一小時以上已是常態。之後擔任研究助理時，更是常常到老師研究室叨擾，在如山的書堆中挪出一方桌案，一聊便



是數小時。老師的博學使得討論的話題不受限於研究領域的差異，不只收穫頗豐，談話本身也是種享受。老師也時常提點我待人接物的道理和細節，對我有莫大的助益。承蒙老師的寄予厚望和提攜，也感念老師給我的啟發和教誨。謹在此致上最真心的感謝。

中研院也在我的碩士生活中佔據不少份量。這裡是座寶山，而我有幸能遇到一位好嚮導。張谷銘教授時常馳騁於國際學術機構，讓我接觸到了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丹麥、尼德蘭、比利時、奧地利、俄羅斯、義大利、日本、韓國、印度和中國的學術脈動。老師十分肯定我的工作表現，也願意包容我的疏失，使這份頗具挑戰的工作帶給我相當愉快的回憶。和老師一起解析中、英、法、德四語的原始手稿也是非常難得的體驗。老師平時非常關心我，也積極給我機會列席學術會議，打開視野、與各國學者直接交流，使我見識到世界史研究的可能和活力，也令我有勇氣思考踏出中文舒適圈的計畫。謹在此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我也要特別感謝三位口試委員。盧省言教授為我引介了男性史研究的相關成果，並協助審閱本論文的研究計畫。老師從論文的發想階段開始，就對這個研究題目投以熱情的關注。非常感謝老師的支持與鼓勵，我也從專題課程中滿載而歸。李峙皞教授為我指出了論文論證可臻於完善之處，並接連評論數篇我的會議論文。非常感謝老師時常為我解惑並肯定我的問題發想方向，也給我機會接下讀書會的主席，希望這一年來的工作沒有辜負老師的期待。雖然沒有機會親炙楊尹瑄教授的課堂，但我是透過老師的譯文，才得以拜讀 Roger Chartier 教授的文章，容我將之當作一縷緣分。非常感謝老師願意給素未謀面的我一個機會，成為我論文草稿的頭幾號讀者。諸位口試委員為本篇論文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使其能更平易近人。若本文有任何錯誤，其責任完全在我。

其次，我要感謝肥沃的學術土壤。臺灣世界史討論會從我大學時期就展現出世界史研究群的溫暖及和諧。感謝汪采燁教授、李尚仁教授和陳重仁教授的醫療史讀書會。感謝楊肅獻教授、陳致宏教授、夏克勤教授、張哲維教授和洪仕翰副總編輯的東歐史讀書會。楊肅獻教授除了是我碩二的導師，也是第一位建議我可以調查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老師，在此一併致上誠懇的感謝。感謝陳建元教授在一次演講後與我深入討論研究問題，並在發表會的休息時間親切地來關心近況。

我有幸能與許多老師結緣。感謝秦曼儀教授與我討論研究方向，以及在思考問題的角度、書籍史和方法論方面給我的指引。感謝陳慧宏教授大力支持我申請



各項獎學金，並在畢業典禮時和我討論未來規劃。感謝擔任我碩一導師的張瑞林教授，老師不只叮嚀我注意身體狀況，也鼓勵我盡早完成碩士學業這個階段性任務。感謝孔令偉教授慷慨地分享學思歷程，並與我討論未來發展方向。感謝呂紹理教授在日常生活史方面給我的啟發。感謝江文瑜教授和周婉窈教授對年輕學生的關懷與照顧，我從老師們身上學到寶貴的一課。感謝藍弘岳教授和渡邊浩教授在政大舉辦的系列講座，對我構思未來研究頗有幫助。感謝甘懷真教授和川島真教授在臺大-東大雙邊論壇的指教，讓我理解到自己的研究盲點。感謝李衣雲教授和 Patrick J. Houlihan 教授提供給會議論文的回饋，有助於精進我的論文寫作。

我也要感謝臺大歷史系和中研院史語所的各位職員，他們在我不熟悉業務時，非常細心的給予指導，平時也承蒙他們許多照顧。特別感謝呂怡燕助教、楊芷柔組員、楊霈琳組員、陳南之助教、羅珮文組員、陳怡婷組員、江亦青助理、潘吉雄助理、王家容助理、廖珮君助理、李雅玲助理、陳建廷助理、翁愈琄助理。

再者，我要感謝如空氣般常伴左右的同儕、先進和後浪，他們使我頭腦清明，也令我燃燒鬥志。特別感謝黃勝韋和范凱閔兩位老友，高中至今十年的交情，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交流。一起修課、用餐、郊遊、談天，一起抱怨彼此遇到的糟心事。他們的博學、穩重和洞察力使我欽羨，我也無時無刻不以他們為自勵、自省、自律的目標。從高中開始他們就是我的頭號讀者，我也因此樂於在知識的海洋中持續探勘。感謝和勝韋在疫情期間進修的充實歲月。感謝和凱閔在天臺徹夜暢談的數個夜晚。我相信即使樟山寺的石桌早已移去，壺中溫熱的鐵觀音依舊是常相聚首的保證。

特別感謝摯友黃子軒，從大學被我拉進系學會之後，我就一直得到他的幫助。我們互相支持、鼓勵、敦促、監督彼此的論文進度，並且如期完成。感謝他讓我覺得自己真的做得到。本篇論文從發想、選題、規劃、調查、整理、撰稿到修訂，他都是我的忠實聽眾。即使我把聊天空間當作整理思緒和分享調查結果的平臺，他也都會認真且不厭其煩地給予回應。感謝在雅思補習班和健身房和他一同奮鬥的時光。也感謝他邀我進入史學讀書會，與簡瑞瑩、巫承興、葉宇軒、盧德容、王尚旻、余昱穎、詹千萱、黃暉宬、柯政佑幾位優秀學人，日以繼夜地討論各種正經和不正經的話題。感謝瑞瑩總是不吝給予充滿善意的支持和協助。感謝承興及宇軒時常讓我留宿，也感謝他們為研討小組貢獻良多，願意給我機會教學相長。

感謝李峙皞老師發起的知識史讀書會，以及吳孟軒老師、江孟勳、趙一穎、吳怡萱、施銘彥、賴炯姵、紀晏如、陳恬緣、曾昭鈺等先進的參與，還有子軒和宇軒的陪伴。我也要感謝帶我熟悉中研院工作的李逸群學長。感謝與我討論升學規劃的曾幸麒學長。感謝與我分享研究心得的蔡斯昀學姐。感謝和我介紹東京和上海學術現況的葉有韞學長。感謝我的助理夥伴楊凱鍵，以及助教夥伴張存一和黃健傑。感謝帶我研讀聖經的李耘天。感謝邀我研讀拉丁文獻的許耘甄。感謝教我古希臘文的楊步榆。

最後，我想把最實在的感謝留給滋養我心靈和情感的源泉。我不是非常乖巧的兒子，但我的母親與父親總是無條件地給予支持和包容。非常感謝我的父母願意讓我選擇全力奔赴歷史學，而無後顧之憂。我完全可以想像，要讓孩子在現在的環境就讀人文科系，需要操煩多少事情。感謝他們從來不向我要求得做出什麼成績。感謝他們願意聽我發牢騷和分享研究所得，即使內容可能無趣、乏味且枯燥。我非常幸福，能擁有一間專屬自己的書房，以及容納得下上千本書的空間。雖然我不一定會成為他們心目中期待的樣子，但我希望自己能讓他們感到驕傲。我也要感謝我的兩位手足，讓我偶爾也能喘口氣，張弛有度地經營生活，在我忙碌的行程中帶來歡樂。另外，我要致上最純粹的感謝給我的摯愛。當我獨行於漫漫長夜時，你就是我夜空中的天狼星，在我最需要的時候，你的理解和陪伴是我走下去的力量。謝謝你教會我愛與被愛，也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中，和我一起慶祝所有美好時刻，一起面對所有鬱悶心情。感謝上天，我知道我可能擁有更少，也曾擁有更少。碩士論文的完成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我會將這塊里程碑當作踏腳石，往更高更遠的地方邁進。我相信即使我的前方是雷雨，我也能看見沉澱於過去時間中的那道光。

謹此

王璟銘

誌於桃園龍潭

西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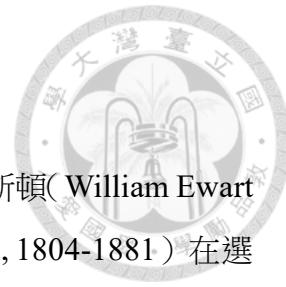


本論文曾獲得一一二年趙綺娜教授紀念獎學金

研究計畫獎

謹此特致謝忱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十九世紀中期不列顛政治領袖威廉·格拉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 和班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在選舉改革浪潮中的身體表演以及其性別意義。兩人在 1865 至 1880 年間成為彼此在政治上的頭號勁敵，而「表演」成為兩人被後世評價時經常使用的譬喻。

維多利亞時代歷經了三個重大的改革法案，同時也見證了愈加強調身體鍛鍊的男子教育。而這兩者的變化都圍繞著陽剛特質內涵的解釋權。本文從當時代人如何理解身體的政治意義切入，兼採文化史與性別史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身體的實踐視為確立性別特質的方式，從而理解其政治意涵，並透過身體表演分析政治人物及其政黨所經營的個人形象。

本文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政治領袖的個人作品、議事紀錄與諷刺漫畫。研究發現兩位政治領袖在成長階段和初入政壇時，就已經依據各自的楷模人物，展現出不同的公眾形象。這個差異在他們各自成為政黨領導人之後越加明顯。本研究將格拉斯頓的男子氣概與自由黨價值觀、迪斯雷利的紳士風度與保守黨價值觀相連結，指出他們如何透過身體表演來向選民傳遞政治理念並引領政黨路線。

在研究結果方面，本研究以「男人注定鬥爭」(manhood a struggle) 概述政治競爭與陽剛特質的關係，這也是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各自改造自由黨、保守黨，並賦予鮮明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的成就。政治領袖的演講內容與其姿態，是傳遞政策和意識形態的絕佳工具，也是批評時政或諷刺領袖的重要素材。一系列的改革法案，不只牽涉到政治版圖的變動，也重構了不列顛的選舉模式。

關鍵詞：陽剛特質、男子氣概、紳士風度、諷刺漫畫、「男人注定鬥爭」、選舉改革、改革法案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bodily performances and gender significations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 and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amidst the electoral reform wave of mid-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Both figures emerged as each other's primary adversaries in politics from 1865 to 1880, with "performance" becoming a frequently used metaphor when assessing their legacies.

The Victorian era witnessed three significant reform acts, coinciding with a growing emphasis on physical exercise in male education. Both of these changes revolved aro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sculine traits' connotations. This study approache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and adopts methods from cultural and gender history. It views bodily practices as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gender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understanding its meaning in political through bodily performances to analyse the personal images cultivated by political figures and their parties.

The primary material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personal writings of political leaders, parliamentary records, and satirical carto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political leaders exhibited different public persona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role models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and early political careers. This divergence became more pronounced after they ascended to leadership positions within their parties. The study links Gladstone's manliness to Liberal values and Disraeli's gentlemanliness to Conservative values, illustrating how they used bodily performances to communicate political ideologies to voters and shape their parties' agendas.

In terms of research findings, the study outlines the phrase "Manhood a struggle," emphasizing the leader-centric political landscape, which Gladstone and Disraeli transformed by imbuing their respective parties with distinct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stances. The speeches and postures of political leaders serve as excellent tools for conveying policies and ideologies, as well as materials for critiquing current affairs or satirizing leaders. Reform Acts not only altered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but also restructured the electoral pattern in Britain.

Keywords: **Masculinities, Manliness, Gentlemanliness, Caricature, 'Manhood a struggle', Electoral Reform, Reform Acts**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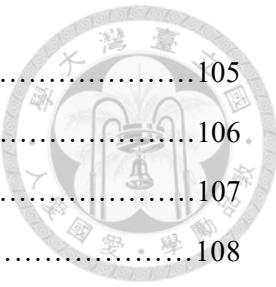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3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材料.....	13
第四節、章節安排及大綱.....	16
第一章、領袖魅力：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男性理想.....	19
第一節、十九世紀不列顛的男性教育.....	19
第二節、迪斯雷利與紳士風度.....	23
第三節、格拉斯頓與男子氣概.....	32
第二章、明星對手：保守黨與自由黨的領袖身體與政治理念.....	47
第一節、保守黨與「兩個國家」.....	48
第二節、自由黨與「哈登崇拜」.....	55
第三節、諷刺漫畫的變形肖像.....	61
第三章、男人注定鬥爭：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與改革.....	85
第一節、改革成為競爭的手段.....	85
第二節、改革成為競爭的目標.....	89
第三節、競爭成為改革的標準.....	93
結論.....	111
第一節、政治領袖的身體表演.....	111
第二節、身體表演與選舉改革.....	113
徵引書目	119
附錄	127
一、迪斯雷利、格拉斯頓與聯合王國政治事件年表.....	127
二、弗尼斯的素描.....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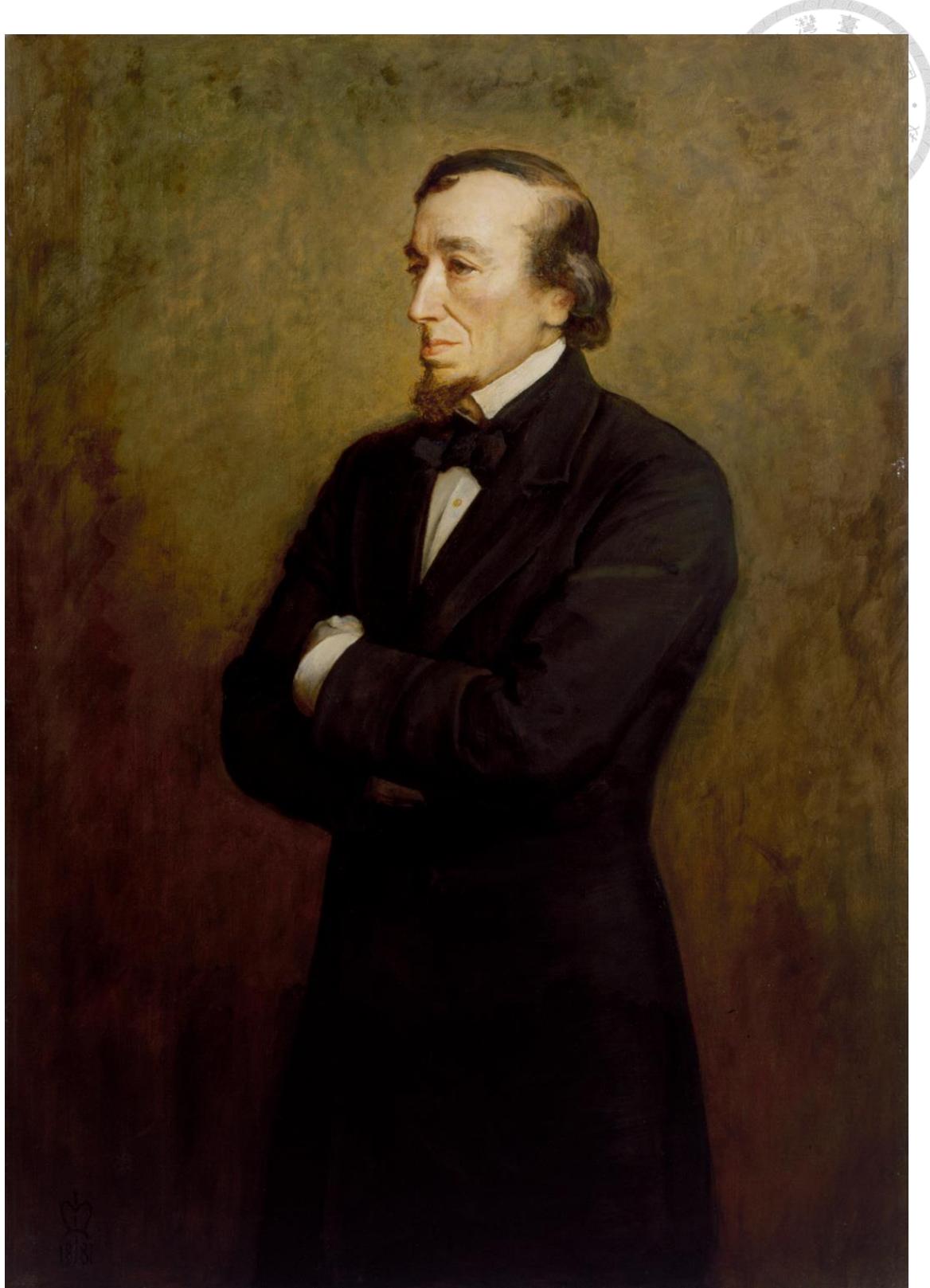
圖次



圖一、《維維安·格雷》的作者.....	42
圖二、年輕的格拉斯頓.....	43
圖三、國會議員迪斯雷利.....	44
圖四、國會議員格拉斯頓.....	45
圖五、財相迪斯雷利.....	66
圖六、1867 年德比內閣.....	67
圖七、財相官袍.....	68
圖八、財相格拉斯頓.....	69
圖九、首相迪斯雷利.....	70
圖十、首相比康士菲伯爵.....	71
圖十一、聯合內閣.....	72
圖十二、格拉斯頓內閣.....	72
圖十三、格拉斯頓於哈登伐木，坐姿.....	73
圖十四、格拉斯頓於哈登伐木，立姿.....	74
圖十五、國會中的迪斯雷利.....	75
圖十六、國會中的格拉斯頓.....	76
圖十七、精益求精.....	77
圖十八、新校長.....	78
圖十九、明星對手.....	79
圖二十、被逐出天界的伊刻西翁.....	80
圖廿一、「舊冠換新冠」.....	81
圖廿二、「樵夫，放過那棵樹！」.....	82
圖廿三、保姆格拉斯頓.....	83
圖廿四、前往柏林會議.....	84
圖廿五、酌劑：改革：競爭：.....	100
圖廿六、掃清路障.....	101
圖廿七、伯明罕的弗蘭肯斯坦.....	102
圖廿八、首要問題.....	103
圖廿九、政治「經濟學」.....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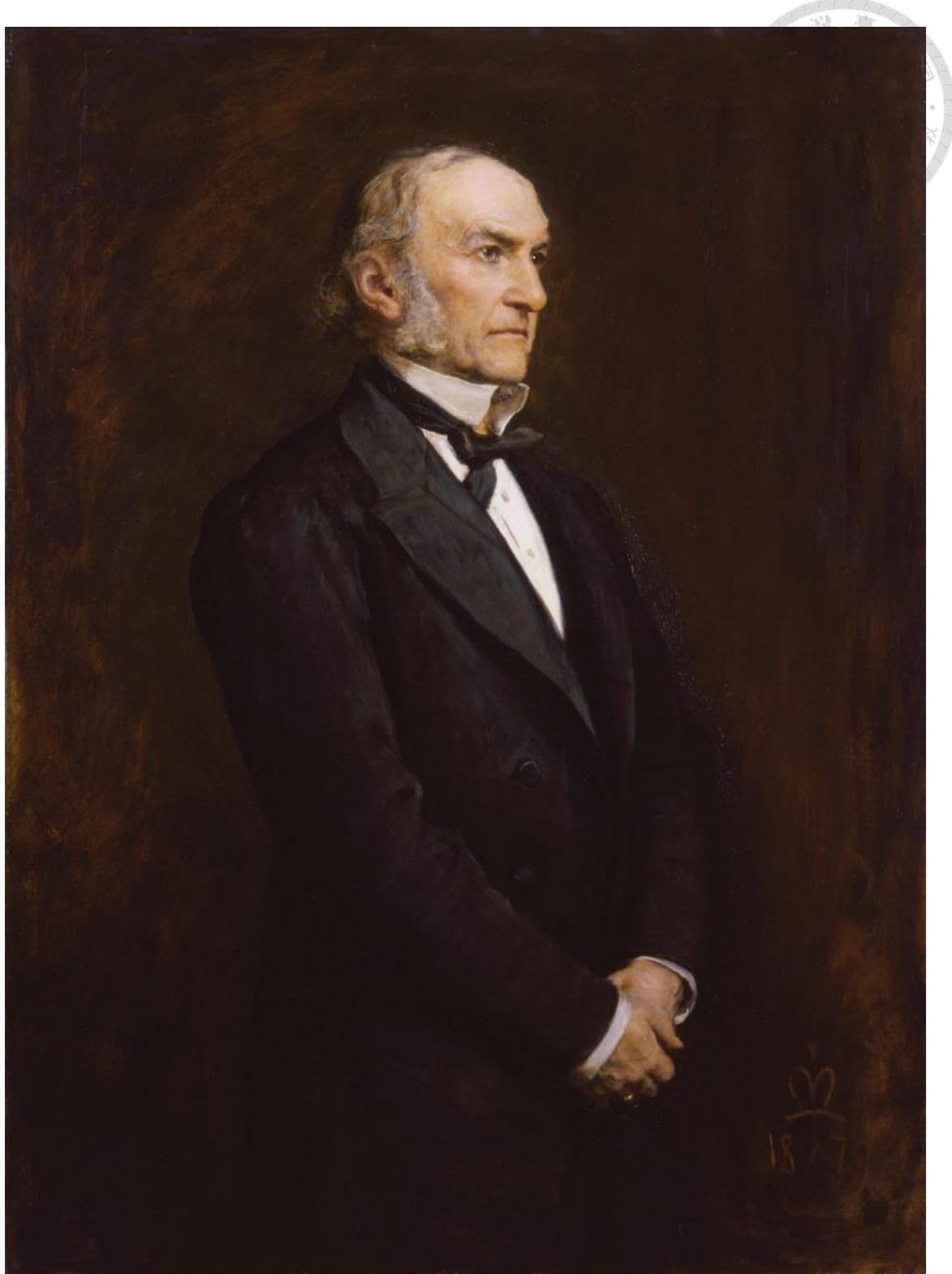
圖三十、「正面我贏，反面你輸」.....	105
圖卅一、男性普選權.....	106
圖卅二、軌道的阻礙.....	107
圖卅三、開庭之前.....	108
圖卅四、彌爾的邏輯：女性公民權.....	109
圖卅五、報春花節.....	116
圖卅六、如鷹隼的格拉斯頓.....	117



班傑明·迪斯雷利，比康士菲伯爵。

約翰·艾佛雷特·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繪。油畫，1881年。

資料來源：*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3241.



威廉·厄華特·格拉斯頓

約翰·艾佛雷特·米萊繪。油畫，1879年。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3637.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1832 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通過之後，不列顛的選民數量從 51 萬人增加至 81 萬人，佔成年人口的比例從 5% 微幅提升至 7%。選民結構由於加入了更多中產階級而開始鬆動，被排除在外的工人們則組織起「憲章運動」（Chartism），持續向國會施壓。直到《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867*）通過之後，選舉的財產門檻才降到工人階級可企及的程度，此時選民總人數從 131 萬大幅增加至 250 萬，比例則攀升至 16%。換句話說，當時除了愛爾蘭之外，在不列顛的成年男性大約每三人就有一人享有選舉權。這個改革趨勢一直延續到《1884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884*）的頒布，選舉人從 310 萬再次劇增至 560 萬，比例達到 28.5%，這表示在平均收入較高的區域，大約每三名男性只有一人沒有選舉權。¹下一次擴大選舉權要到一戰結束之後，《1918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 1918*）取消大部分的財產及性別限制。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r. 1837-1901）見證了《1832 年改革法案》的持續發酵以及隨後發生的一連串政治改革，不列顛的政治運作模式在其統治之下逐漸穩定而成熟。然而改革之路並非一帆風順，每一部法案的推出，事實上都牽涉國會內部的利益盤算和意識形態角力。

維多利亞時代的兩大政黨為改組自托利黨（Tories）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以及承繼自輝格黨（Whigs）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兩黨大約在十九世紀中葉伴隨 1845 年「愛爾蘭大饑荒」（Great Famine）和《穀物法》（Corn Laws）爭議而成形。當時保守黨首相皮爾（Robert Peel, 2nd Baronet, 1788-1850）為了廢除糧食進口稅而與陸軍及殖民地大臣史丹利男爵（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 later 14th Earl of Derby, 1799-1869）決裂，皮爾辭職，保守黨分裂。分裂之後的保守黨在貿易上支持保護主義政策，講求溫和而漸進的改革方針，代表土地貴族的利益。主要人物有史丹利男爵（他在 1851 年成為德比伯爵）、本廷克勳爵（Lord George Bentinck, 1802-1848）、格蘭比侯爵（Charles Cecil John Manners, Marquess

¹ Chris Cook,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5), 68.



of Granby, 1815-1888)、前貿易局主席赫里斯 (John Charles Herries, 1778-1855)，以及在《穀物法》問題上激烈抨擊皮爾首相的猶太裔議員班傑明·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1852年，德比伯爵（即原來的史丹利男爵）上任首相並組織少數政府，迪斯雷利成為了財政大臣（下文稱財相）和下議院領袖。

另一方面，保守黨中支持皮爾的一派 (Peelites) 逐漸與輝格黨、國會中的激進派 (Radicals) 及自由派 (Liberals) 合流，並在 1859 年宣告成立自由黨。在自由黨正式成立之前，一些支持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的政治人物組成聯盟，鼓勵更為激進的改革方針，代表了工商業中產階級的利益。主要人物有在 1846 年接替皮爾成為首相的羅素勳爵 (Lord John Russell, later 1st Earl Russell, 1792-1878)、以干涉主義 (interventionism) 外交手段聞名的帕默斯頓子爵 (Henry John Temple,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1784-1865)、積極支持《1832 年改革法案》的哈利法克斯子爵 (Charles Wood, 1st Viscount Halifax, 1800-1885)、上議院皮爾派領袖亞伯丁伯爵 (George Hamilton-Gordon, 4th Earl of Aberdeen, 1784-1860) 和下議院皮爾派領袖威廉·格拉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格拉斯頓在 1852 年底出任亞伯丁政府的財相，先前擔任這個職位的哈利法克斯和迪斯雷利，都被當時的評論家認為表現欠佳，²而格拉斯頓在 1853 年 4 月 18 日報告預算案時展現的出色能力，獲得了日記作家格雷維爾 (Charles Cavendish Fulke Greville, 1794-1865) 的高度讚美：

他演講了五個小時，並得到了全場的贊同，這是下議院有史以來最為盛大的政策展示 (displays) 和極為出色的財務報告；這是一份經過大膽、熟練、踏實設計的偉大計畫 (a great scheme, boldly, skillfully, and honestly devised)，輕視群眾的喧嚷和來自外部的壓力，而它的執行絕對完美。即使是那些不讚賞預算案或因其受損失的人，也都會承認這場表演 (performance) 的優點。這場表演大大提高了格拉斯頓的政治地位，而且比這項行政措施本身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讓全國確信格拉斯頓有能力勝任重要的政治崗位，適合統率各黨派並領導內閣團隊。³

² H. C. G. Matthew, "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Politics of Mid-Victorian Budgets," *Historical Journal* 22, no. 3 (September 1979): 615-643.

³ Charles C. F. Greville, *The Greville Memoirs*, 3rd part, vol. 1 (London: Longmans, 1887), 59. Project Gutenberg.

格雷維爾認為，格拉斯頓的「表演」不僅讓一場本應枯燥的預算案報告變得引人注目，更彰顯出一位政治人物的領導能力。「表演」一詞也被史家布萊克男爵（Robert Norman William Blake, Baron Blake, 1916-2003）用於對迪斯雷利的描述：

圖說：英國國立學術圖書館

迪斯雷利擅長表現的藝術（the art of presentation）。他是公眾表演的主辦人（impresario），是掌管劇團的主要演員（actor manager），也是我們歷史上最為傑出的議員之一。他曉得政治主要取決於印象、風格和趣味，也知道邏輯、沉著及對選項的冷靜評估在政治上無足輕重。這就是政治人物重視他的原因。他們明白議會民主政治生涯中，大部分情況不需要親自處理，而是要為他人代勞之事或必然發生之事賦予對的基調。⁴

布萊克將政治人物的領導力與表演緊密連結，並進一步點出表演的目的是為團體行動定調。保守黨與自由黨一方面繼承了托利黨和輝格黨的對立傳統，另一方面則在政黨成型的過程中逐漸確定各自的價值與立場，而分別為兩黨立下穩固發展基礎的領袖就是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本文從選舉活動的角度出發，探討十九世紀不列顛選舉改革浪潮對兩人政治表演的影響，以理解兩人乃至兩黨如何透過表演傳達各自的政治理念。

二、文獻回顧

朗福德（Paul Langford）在有關 18 世紀政治人物行為表現的研究中指出，自《1689 年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至《1832 年改革法案》期間的歷任首相，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政治人物形象：一種熟習奉承及表現技巧，舉止大膽，行為不羈，和藹可親，自命不凡，並且以對君主的忠誠為榮；另一種善於演說和推動法案，舉止謹慎，外表樸素，冷漠內斂，恪盡職守，不屑於巴結群眾。⁵朗福德並不認為可以簡單地用兩種形象來為政治人物分類，他強調這更像是政治人物一體兩面的角色特質（attributes），係因應逐漸轉型的政治環境而生，偏重以公共政策目標而非私人利益關係來召集支持者。圖姆斯（Robert Tombs）也觀察到這兩種形象在 19 世紀得到繼承，代表人物即本文的兩位主角：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他形容

⁴ Robert Blake, *Disraeli* (1966; repr., London: Methuen, 1978), 764.

⁵ Paul Langford, “Politics and Manners from Sir Robert Walpole to Sir Robert Peel,”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94 (1997): 118.

格拉斯頓給人的印象是嚴肅、飽學、充滿幹勁，是苦修而內省的虔信者；迪斯雷利則沉著、幽默、衣著講究，是華麗而浪漫的愛國者；兩人「彼此相異，但都是典型的『維多利亞人』」（both were characteristically but differently “Victorian”）。⁶霍金斯(Angus Hawkins)則指出，1867年的改革間接強化了保守黨與自由黨的對立，兩黨將各自的領袖透過刻意的形象經營與行銷手法包裝為偶像，目的是吸引群眾支持。⁷選舉改革對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公眾形象的影響及其意義，已有相關研究文獻支持，以下分段討論「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身體」、「男性身體與政治」和「性別研究中的身體」。

(一) 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身體：從內在本質到外在呈現

喬治時代(Georgian era, 1714-1837)晚期的紳士講求「能言善道、彬彬有禮、圓滑和諧、從容優雅」，這些品格可概括為「紳士風度」(gentlemanliness)。⁸而「男子氣概」(manliness)是與此類似的概念，也是維多利亞時代文化的熱門課題，在教育、體育、文學及思想等方面皆有豐富的討論，這些作品將男子氣概視為一種後天養成而非與生俱來的特質。⁹「男子氣概」一詞與「陽剛特質」(masculinity)一詞可互相替換，但隨著近代性別研究的發展，兩個辭彙逐漸分化出不同的意義。學者們常用陽剛特質指稱各種類型的男性特徵，這類特徵往往與群體認同有關；而男子氣概則用於指稱其中一種陽剛特質，在特定文化、特定時代中被視為理想男性的品格和教養男孩的目標。男子氣概與陽剛特質原屬於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史學家大約在1990年代開始接觸這個課題。¹⁰斯各特(Joan W. Scott)首倡

⁶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504-507.

⁷ Angus Hawkins, *Victorian Political Culture: ‘Habits of Heart and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97.

⁸ William Stafford, “Gentlemanly Masculinities as Represented by the Late Georgian Gentleman’s Magazine,” *History* 93, no. 1 (January 2008): 65-66.

⁹ 參考 David Newsome, *Godliness and Good Learning: Four Studies on a Victorian Ideal* (London: Cassell, 1961); J. A. Mangan,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Educational Ideology* (1981; rep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Norman Vance, *The Sinews of the Spirit: The Ideal of Christian Manlines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Thought* (1985; re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tefa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1991; rep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¹⁰ 1980年代後期已有方法論文章和個案研究的論文集出版，但首次嘗試形成理論的論文集則要到1991年才出版。參考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December 1986): 1053-1075; J. A. Mangan and James Walvin, ed,



將性別當作史學分析的範疇，他認為性別是權力關係的一種表現方式，其意義是在特定政治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所以是歷史學家的研究課題。而托許（John Tosh）等人的研究成果則開展了新的史學分支「男性史」。托許響應新文化史家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 1928-2023）對於女性史研究「不應忽略男性」的呼籲，從他自己研究十九世紀不列顛的經驗出發，提倡男性歷史研究應當關注「身體」，因為從文學材料出發的研究，大都強調男子氣概的培養是在訓練精神與道德，但這無法解釋 1880 年代的男子氣概標準為何重視身體素質。托許主張，在十九世紀的不列顛，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男性需要適應不同的男性期望，不同階級各有不同的陽剛特質，其中男子氣概的闡述明顯受到中產階級價值觀影響。托許認為個人經驗的歷史分析可以幫助歷史學家掌握男子氣概的完整特性，因為男性在公共領域的表現，可能受到社會環境影響而有偽裝和表演，並不代表個人真實的群體認同。¹¹

托許提倡的研究取徑於爾後十年之間得到廣泛迴響。在哈維（Karen Harvey）和雪帕德（Alexandra Shepard）的回顧文章中，¹²歸納了男性史的四種主要研究取徑，其中性別史、社會史和心理史三種取徑都圍繞著個人經驗，試圖建立「陽剛特質史」（history of masculinity）；文化史取徑則專注於男子氣概與陽剛特質的表現。取徑的差異導致研究主題的分歧，而關注個人經驗的研究成為 2000 年代的主要趨勢，多數學者試圖將陽剛特質視為一種社會關係，而不僅僅是文化規範。與此相對，當時只有少數學者從政治史取徑出發，托許即其中之一。他在〈霸權陽剛與性別史〉（“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the History of Gender”）一文中，指出文化史的劣勢，在於較難從特定時代下的意義討論概念的變遷；但若結合文化史和政治史對權力運作方式的分析，則能看出不同陽剛特質之間的競爭關係。¹³這一派學者利用社會學家康奈爾（R. W. Connell）的「霸權陽剛」（hegemonic masculinity）概念，分析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 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1987; rep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Michael Roper and John Tosh, ed, *Manful Assertions: Masculinities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1).

¹¹ John Tosh, “What Should Historians Do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no. 38 (1994): 179-202.

¹² Karen Harvey and Alexandra Shepard, “What Have Historians Done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Five Centuries of British History, circa 1500-195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274-280.

¹³ John Tosh, “Hegemonic Masculinity and the History of Gender,” in *Masculinities in Politics and War: Gendering Modern History*, ed. Stefan Dudink, Karen Hagemann, and John Tosh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51-55.



統治階層用以維持權威的男性規範與實踐。哈維和雪帕德呼籲學者應在此基礎上研究男性規範的彈性，以考慮多種規範並存和彼此競爭的可能性。

托許在 2011 年觀察到，相較於性別史取徑遇到了研究瓶頸，文化史取徑則取得了可觀的成果：陽剛特質搭上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的研究趨勢，成為文化史家用來研究性別規範及刻板印象等課題的分析工具，他們不再認為澄清男子氣概與陽剛特質的定義是必要的問題。換句話說，比起討論「何謂陽剛特質」，文化史家更關注「陽剛特質造成何種影響」。托許提到文化史研究的三項特徵：第一、「表現先於經驗」，即從研究對象的行動而非個體經驗出發，探討文本的意義；第二、「整合體的解散」，即從個人的身份標記（如性別、種族、階級）出發，分析多重身分的交互關係；第三、「權力定義性別」，即認為性別是由權力關係發展而來，並且以象徵或隱喻的形式鞏固權力。這三項特徵都指出個體需要被放在群體關係中理解，雖然個人的輪廓可能變得模糊，但該時代的文化也會因此變得清晰。¹⁴文化史取徑強調行為與表現。托許數年前呼籲的「身體」課題，便獲得許多文化史學者青睞，他們使用「身體」討論軍旅、風尚、美學、工藝和情感表達等課題。¹⁵

2010 年代有關陽剛特質的研究，焦點已經從討論其內在本質轉為關注外在呈現，包括服飾、性行為和身體動作。赫霍特（Ruth Heholt）和帕森斯（Joanne Ella Parsons）提到，陽剛特質的表現在十九世紀呈現多元並蓄的圖景，無論是嚴肅內斂的男子氣概或華麗奔放的另類特質都很明顯。而為了理解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現象，他們將過去被視為霸權、保守、殖民者代表的中產階級白人男性，重新拉回討論核心，因為這些殖民者的身體，並不如殖民論述中所描繪的那般理想；反之，殖民者在殖民地如何改變、適應與生存，成為了帝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¹⁶貝加

¹⁴ John Tosh,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An Outdated Concept?” in *What is Masculinity? 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 J. Arnold and S. Brad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17–34.

¹⁵ 參考 Matthew McCormack, *Embodying the Militia in Georgia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ominic Janes, *Oscar Wilde Prefigured: Queer Fashioning and British Caricature, 1750–190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6); Declan Kavanagh, *Effeminate Year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Karen Harvey, “Craftmen in Common: Objects, Skill and Masculi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Gende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600*, ed. Hannah Grieg, Jane Hamlett, and Leonie Hann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68–89; Katie Barclay, “Performing Emotion and Reading the Male Body in the Irish Court, c. 1800–1845,”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1, no. 2 (Winter 2017): 293–312.

¹⁶ Ruth Heholt and Joanne Ella Parsons, “Visible and Invisible Bodies,” in *The Victorian Male Body*, ed. Joanne Ella Parsons and Ruth Hehol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1.

圖（Joanne Begiato）承繼這個方向，重新審視十八、十九世紀的男子氣概。他跳脫過去爭辯「何謂男子氣概」的窠臼，不再認為身體只是精神的陪襯、附庸或負擔，而是將其視為男子氣概的源頭、容器和媒介。換言之，貝加圖認為男子氣概的研究應該更關心身體的自我表現與描繪，以及與此相關的物質文化及情感展現。¹⁷

綜上所述，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身體在過往研究中常被忽略或低估，因為維多利亞人留下的材料中，大多聲稱身體不如心靈重要，導致早期學者普遍採信這個說法。而在文化史家證明身體可用於分析個人在社會中的表現之後，性別史家突破了「陽剛特質史」的瓶頸，改從身體切入討論陽剛特質的表現，以及不同陽剛特質在特定社會中的競爭關係。本文呼應斯各特和康奈爾的觀點：性別是權力的表現方式，性別的意義為政治所服務，統治階層的權威來源是特定種類的陽剛特質；並結合文化史及性別史的方向，認為陽剛特質是由權力關係來定義，不同種類的陽剛特質在同一個社會之中彼此競爭，競爭的主要方式則是個人的身體表現，勝利者得以維持、鞏固、強化其所承載的權力和社會地位。本文將焦點放在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兩位維多利亞時代政治人物的身體表演上，從兩人接連在國會大選取得勝利並成為首相的脈絡中，梳理男性身體的政治意義。為此，需要了解相關研究的趨勢。

（二）男性身體與政治：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

回到本節開頭關於圖姆斯對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兩人評價的話題。雖然他將兩人稱為「典型的維多利亞人」，卻也提到他們的形象及行事風格，在一眾政治人物之中相當突出。¹⁸他們在 1860 至 1880 年代都發揮足以改變國家命運的影響力，也都展現極具特色的個人形象。有賴於報紙與電報的發達與普及，兩人的政治競爭在當時就引起媒體關注和互相比較，是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¹⁹大多數傳記作者都將兩人的競爭解釋成個人層面的齷齪。格拉斯頓的傳記作者詹金斯（Roy Jenkins）認為：格拉斯頓「對敵我都相當寬容，唯獨無法忍受帕默斯頓和迪斯雷利」，後者更是從 1865 年帕默斯頓去世起，至 1881 年病逝為止，都

¹⁷ Joanne Begiato, *Manliness in Britain, 1760-1900: Bodies, Emo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3.

¹⁸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504.

¹⁹ 一家地方報紙在 1876 年指出兩人有相似的經歷和興趣（實際的相似之處並不多），而性格、言談和舉止則相去甚遠。儘管該報自身立場偏袒格拉斯頓與自由黨，但作者依然承認格拉斯頓的行事作風激化了自由黨內部的分歧，並肯定迪斯雷利擁有讓保守黨團結一致的優秀手腕。見“Gladstone versus Disraeli,” *Potteries Examiner* (Staffordshire), 16th December, 1876.



是格拉斯頓在政壇上唯一感到棘手的人物。²⁰而迪斯雷利的傳記作者布萊克男爵，則稱早在 1852 年格拉斯頓首次擔任財相時，兩人的對立與敵視便已浮上檯面，並在 1868 年迪斯雷利上任首相之後，政治競爭被提升到舉足輕重的地位，「主宰了英格蘭的公共生活」。²¹

然而，在比亞季尼（Eugenio F. Biagini）撰寫的格拉斯頓傳記中，上述「公仇源於私恨」的傳統說法並未被接受，他將格拉斯頓於 1870 年代末在外交政策上的反對力道加劇，歸因於他的宗教信念。²²奎諾（Roland Quinault）進一步挑戰兩人「水火不容」的說法，他重新檢視兩人對彼此的描述，並指出兩人的關係在大多數時間裡，並不如傳統印象中惡劣，反倒能夠相互欣賞與尊重，甚至在若干議題上持相同立場。此外，奎諾也主張：「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在 1860 年代的議會衝突，是由各自政黨領袖策動的黨派任務」，至於關係惡化的原因，奎諾的觀點與比亞季尼一致，認為主要是宗教和外交政策的不同意見。²³根據上述說法，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的政治角力具有相當明顯的表演性質，他們能夠配合政黨需求扮演特定角色，而即使在衝突激化的 1870 年代晚期，兩人也能夠將公、私領域的批評意見區分開來。儘管奎諾對於衝突的解釋還有充實空間，但他證明了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大抵不涉及私領域，且都明確理解自己表演的方法與目的。

麥柯馬克（Matthew McCormack）與羅伯茨（Matthew Roberts）認為兩位政黨領導人的競爭是具體而微的政黨價值較量，他們將保守黨與自由黨之爭形容為不同種類陽剛特質的衝突，而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則扮演兩黨意識形態的闡釋者與執行人。麥柯馬克在〈男人的領域？〉（“A Man’s Sphere?”）一文中，進一步主張 1867 年改革之後的競選活動，為企圖彰顯陽剛特質，即彰顯政治能力的政治人物提供了展示身體的舞臺。²⁴許多研究迪斯雷利的文獻皆指出，他將政治鬥爭當作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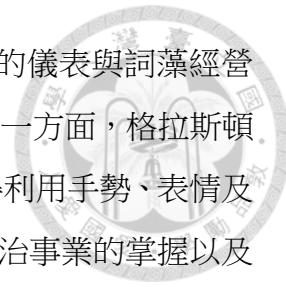
²⁰ Roy Jenkins, *Gladstone: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60.

²¹ Robert Blake, *Disraeli*, 346-347.

²² Eugenio F. Biagini,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2000), 82-84.

²³ Roland Quinault, “Gladstone and Disraeli: A Reappraisal of their Relationship,” *History* 91, no. 4 (October 2006): 557-576.

²⁴ Matthew McCormack and Matthew Roberts, “Chronologie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Masculinities, c. 1700-2000,” in *Public Men: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Britain*, ed. Matthew McCormac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94; Matthew McCormack, “A Man’s Sphere?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sculi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urope*, ed. Christopher Fletcher et al.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251-258.



示自我價值並藉以博得關注的活動，為此他積極運用誇張華麗的儀表與詞藻經營自己的形象，並最終成功扮演保守主義和愛國心的代言人。²⁵另一方面，格拉斯頓擅於演說的形象也同樣深植人心。相關研究指出，格拉斯頓懂得利用手勢、表情及語調，將演講轉變成精彩的戲劇表演，他對古典學問的熟稔、政治事業的掌握以及道德價值的堅持，也讓他贏得了「人民的威廉」（People's William）和「大老爺」（the Grand Old Man）兩個響亮的綽號。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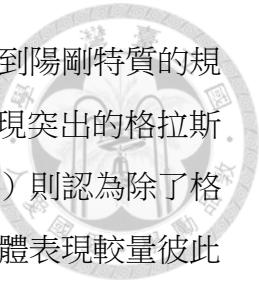
綜觀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文化的相關研究，學者們對於身體、政治與陽剛特質的關係，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都將男子氣概當作參政權利的依據，而男性身體是表現男子氣概的工具；²⁷另一種看法則認為，由於身體在維多利亞時代是不適合公開談論的話題，所以即使理論上男子氣概是身體與道德的雙重規範，實際上卻幾乎只看得到強調道德表現的文獻。²⁸托許指出擁有政治權利的男性，以表現出特定的陽剛特質（在十九世紀中葉是男子氣概）來彰顯社會

²⁵ Paul Smith, "Disraeli's Politics,"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1818-1851*, ed. Charles Richmond and Paul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2-173; Daniel R. Schwarz, "Disraeli's Romanticism: Self-Fashioning in the Novels,"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1818-1851*, 64-65; Patrick Brantlinger, "Disraeli and Orientalism,"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1818-1851*, 79-80; Robert Blake, *Disraeli*, 226-227; David Cesarani, *Disraeli: The Novel Politici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5; Maurice Cowling, *1867: Disraeli, Gladstone and Revolution: The Passing of the Second Reform B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17-241; Angus Hawkins, *Victorian Political Culture*, 265-268.

²⁶ Eugenio F. Biagini, *Gladstone*, 10-12; D. A. Hamer, "Gladston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Myth," *Victorian Studies* 22, no. 1 (Autumn 1978): 41-50; Richard Joseph Scully, "The Origins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s Nickname, 'The Grand Old Man,'" *Notes and Queries* 61, no. 1 (March 2014): 95-100; Roy Jenkins, *Gladstone*, 230-253; 453-473. 「大老爺」是十九世紀不列顛對政治巨頭的慣稱，帕默斯頓和迪斯雷利都曾被如此稱呼，但加上冠詞的限定用法專指格拉斯頓，有時會以縮寫 G.O.M. 出現。這個用法曾被揶揄成 M.O.G. (Murderer of Gordon)，用來指責格拉斯頓政府在應對喀土木圍城戰 (Siege of Khartoum, 1884-1885) 時的怠慢，導致蘇丹總督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 戰死。格拉斯頓隨後也引咎辭職。

²⁷ Anna Clark, "The Rhetoric of Chartist Domesticity: Gender, Language, and Class in the 1830s and 1840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1, no. 1 (January 1992): 70-71; Donald Eugene Hall, ed, *Muscular Christianity: Embodying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Linda Young, *Middle-Class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ustralia and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95-123; Lawrence Goldman, "The Defe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Endowed Schools Act,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1874 Election,"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Victorian Britain: Essays in Memory of Colin Matthew*, ed. Peter Ghosh and Lawrence Gold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8-135.

²⁸ Edward Palmer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66), 423-424;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Abacus, 1977), 272-274;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29-234; Francis Michael Longstreth Thompson,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52-354; Steven Marcus,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Transaction, 2009), 170-171.



地位，並進一步主張：要到十九世紀中葉之後，身體才逐漸明顯受到陽剛特質的規範，且凸顯其在政治領域中的重要性。而在國會辯論與演講中表現突出的格拉斯頓，則成為政治領域男子氣概的典範人物。²⁹格里芬（Ben Griffin）則認為除了格拉斯頓之外，迪斯雷利也是重要的典範人物，兩人在國會中透過身體表現較量彼此的陽剛特質。³⁰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不僅限於他們在國會的個人表現，也體現在他人的視覺重現中。沃爾（Anthony S. Wohl）的研究指出，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諷刺漫畫（caricature）中，迪斯雷利因其猶太人的身分以及對近東外交事務的熱中，而被政敵刻劃成「狡猾、不懷好意的猶太陰謀家」，以減損其道德正當性。³¹然而史密斯（Paul Smith）等人卻從迪斯雷利的早期經歷和小說創作中，得出另一個角度的看法：迪斯雷利對自身的猶太血統感到自豪，並因此萌生對社會與政治地位的追求，他竭力表現出猶太族裔的獨特性，以扭轉猶太人在不列顛的邊緣地位。³²由於《1673年宣誓法》（*Test Act 1673*）的規定，任公職者必須宣誓信仰聖公會。儘管此項法案是針對天主教徒，但也同時導致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長期被排擠於政治圈之外，直到 1828 年廢除該法案為止。迪斯雷利如何處理、詮釋、反轉對自己身分的詆毀，依然是頗具研究潛力的課題。

另一方面，關於格拉斯頓公眾形象的研究則相對成熟，主要集中於個人領袖魅力的經營與展現。比亞季尼詳實描述格拉斯頓自 1874 年引退後至 1879 年復出的過程中，利用大眾媒體持續發揮影響力，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張在 1877 年拍攝的相片，格拉斯頓手握代表自由主義的斧頭，砍倒象徵舊體制的毒樹。「砍樹」是傳統激進派的政治語言，而被格拉斯頓發揚光大，他時常在威爾斯的哈登城堡（Hawarden Castle）周圍樹林裡砍樹。這讓他看起來像是現代版的辛辛那圖斯

²⁹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1861-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5-197; John Tosh, "What Should Historians Do with Masculinity?", 182; John Tosh, "Masculinities in an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Britain, 1800-1914,"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330-331; John Tosh, "Public History,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Britain," *History* 99, no. 2 (April 2014): 201.

³⁰ Ben Griffi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Britain: Masculini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0-191.

³¹ Anthony S. Wohl, "'Ben JuJu': Representations of Disraeli's Jewishness in the Victorian Political Cartoon," *Jewish History* 10, no. 2 (Fall 1996): 89-134.

³² Paul Smith, "Introduction,"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1818-1851*, 1-15.



(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c. 519-c. 430 BCE),³³一個代表功成身退和公民美德的傳說領袖。比亞季尼把崇拜格拉斯頓的行為稱作「哈登崇拜」(Hawarden cult)，支持者高喊著「格拉斯頓和自由」、「格拉斯頓和改革」、「格拉斯頓萬歲」等口號，斧頭甚至成為自由黨的非官方象徵物。³⁴

哈威(Christopher Harvie)指出「哈登崇拜」主要分布在不列顛的西部與北部，其狂熱程度甚至讓旁人認為他們願意為格拉斯頓赴死。哈威認為激發追隨者熱情的原因，是他的身體表演極富煽動性魅力：他的目光像猛禽一樣銳利，他長年伐木的身體即使年邁依然健壯；他的耐力、專注力和語言能力都使他有辦法讓現場觀眾變得激動。³⁵勞倫斯(Jon Lawrence)也認為群眾政治的重點在於形式而非內容，領袖需要展現出自己的力量，並與當地社群創造連結，以此獲得觀眾的擁戴、信任及支持。³⁶喬伊斯(Patrick Joyce)主張「哈登崇拜」之所以能觸及勞工階級，是因為格拉斯頓透過伐木的身體勞動與追隨者產生共鳴。³⁷溫謝福(Ruth Clayton Windscheffel)則證明格拉斯頓相當在意公眾形象如何反映真實的內在，他時常與肖像畫師協調畫像的內容，尤其是人物的姿勢，希望能夠兼顧身體與精神、政治事業和知性興趣的呈現。除此之外，格拉斯頓也懂得運用新興的照相技術，讓私人生形象化為受大眾歡迎的「伐木學者」(scholar-woodcutter)。³⁸

溫謝福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觀點：政治人物的想法，在其身體形象的塑造與呈現中可能佔主導地位。無論是為了忠實呈現自我，還是為了攻擊政敵的身份，政治人物的身體都是形象經營的重點。由於身體在維多利亞時代是與性別及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的概念，故還需要討論性別研究分析身體的方法。

³³ 辛辛納圖斯是羅馬共和時期的公民，傳說在西元前 458 年，羅馬東部遭受攻擊，他被元老院任命為任期半年的獨裁官 (dictator)，而他只花了半個月就平定戰事，卸甲歸田，毫不貪戀權位。

³⁴ Eugenio F. Biagini, *Liberty, Retrenchment and Reform: Popular Liberalism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1860-18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95-416.

³⁵ Christopher Harvie, “Gladstonianism, the Provinces, and Popular Political Culture, 1860-1906,” in *Victorian Liberalism: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ed. Richard Bellamy (London: Routledge, 1990), 152-174.

³⁶ Jon Lawrence, *Speaking for the People: Party, Languag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England, 1867-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4-65.

³⁷ Patrick Joyce,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9-50.

³⁸ Ruth Clayton Windscheffel, “Politics, Portraiture and Power: Reassessing the Public Imag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in *Public Men*, 93-122.



(三) 性別研究中的身體

斯各特認為「性別」（gender，或稱社會性別）是賦予身體差異（或稱生理性別〔sex〕）一系列特定意義的知識，並指出這種知識係基於社會結構而生，通常用來安排社會秩序和鞏固政治權力。³⁹康奈爾則主張政治權力中存在「霸權陽剛」，這是一種維持統治權威的男性規範與實踐。統治階級的男性可透過身體表演來展示優越地位和權力，並以此排擠不同性別、階級、種族，以及性少數、身心障礙者等群體進入權力核心。康奈爾認為過去的性別研究錯誤地忽略男性「也是」一種性別，而沒有討論男性身分本身具有的多元特性，因此他呼籲使用「複數形式的陽剛特質」（masculinities），以突顯男性身分內部的競爭與支配關係。另外，康奈爾也主張身體對於維持統治權威相當重要，統治階級一旦無法在身體表演中展現陽剛特質，就會使陽剛特質與優越地位和權力的連結逐漸黯淡。⁴⁰換句話說，重複的表演和識別表演中的陽剛特質，構成了陽剛特質本身的意義，並使其得以存續。

身體的重要性以及陽剛特質的意義，可以用哲學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謂性別的「操演」（performative）來解釋。操演來自語言哲學，與「陳述」（constative）相對，指透過言語來發揮作用的社會行動，如承諾、辱罵、發誓、宣判、祝福等。這類言語的內容被稱為「操演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具有「話語本身既是行為的原因也是結果」的特性，即「操演性」（performativity）。⁴¹巴特勒認為性別同樣具有操演性：性別身分產生了相應的行為，行為也建構了性別身分，性別身分既是行為的原因也是結果，故他說「性別始終是一種行為」（gender is always a doing），能透過實踐產生影響力。⁴²巴特勒進一步主張，性別規範需要透過身體來實踐，而身體也會在實踐中確立（或鬆動）性別規範，規範需要透過重複實踐才

³⁹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rev.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⁴⁰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28, 54-55.

⁴¹ 以邏輯表達式更精確地定義操演性的內容，可以說「若且唯若行為實踐，則行為確立」，也就是「如果行為實踐，則行為一定確立；如果行為確立，則行為一定實踐」。在語言哲學中，陳述的重點是話語的內容，也就是「說了什麼」，內容可能是實話或謊言，需要進一步分析陳述當下的脈絡。而操演則不然，其重點是話語的行動，也就是「有沒有說」。以辱罵為例，無論內容是否符合真實情況，如果罵出口（行為實踐）則一定是辱罵（行為確立），而辱罵要成立，也一定要罵出口才算數。巴特勒採用的操演性並不是根據語言哲學中的操演話語，而是較為抽象的邏輯表達式，也就是「若且唯若性別實踐，則性別確立」。

⁴²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0), 7-24. 關於人稱代名詞，Butler 偏好使用“they”，本文無論性別，一律使用「他」。



能不斷確立自身存在，而身體的性別操演又以規範為基礎，所以身體就是具體化的權力，不僅是受到權力作用的對象，也是行使權力的主體。⁴³

綜上所述，十九世紀中葉不列顛的政治領域，可謂是陽剛特質的競技場。無論是政治才能還是參政資格的衡量標準，都圍繞著陽剛特質，並因選舉改革而成為討論焦點。各自身負政黨價值的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都有意識地透過身體表演來展示陽剛特質，以爭取他人的支持。本文之要旨為分析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身體表演，及維多利亞時代人的回應，以理解當時社會如何識別身體表演的政治意義。

三、研究方法與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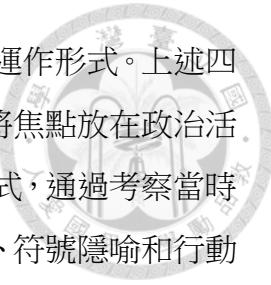
過往研究已指出格拉斯頓在經營公眾形象上的考量、政黨競爭的動機與目的，以及特定陽剛特質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綜合有關政治人物身體表演、陽剛特質表現，以及政黨價值競爭等方面的既有成果之後，本文聚焦於不列顛選舉改革對格拉斯頓及迪斯雷利兩人形象經營的影響，並主張其影響可以透過分析兩人的身體表演而得知。為了分析身體表演的政治意義，本文選擇探討選舉活動中的性別議題。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材料及限制，以下分段討論之。

（一）本文採取之方法

斯各特、康奈爾及巴特勒皆指出性別、身體與權力三者存在緊密的關係。差別在於斯各特強調性別概念的知識史，他認為性別創造了身體差異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連結，身體被當作不平等現象的客觀依據；康奈爾注重性別概念的社會史，他聲稱性別本身就隱含了支配與從屬的權力關係，而身體則成為劃清界線與重申規範的工具；巴特勒從根本上質疑性別概念，他主張身體既不客觀也不是完全被動的工具，而是一道基於社會脈絡而自我劃定的邊界，身體透過行為操演性別，並將權力與性別掛勾，進一步內化為身體表演的必要元素。⁴⁴這三位學者的觀點可以用來補充男子氣概歷史研究前沿的課題。貝加圖已經注意到身體對於性別概念與規範的重要性，而採取文化史視角分析男子氣概，然而，他沒有將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政治活動納入調查範圍，因為他更關注物質與個人情感的關聯。政治活動不僅是維

⁴³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3), xxi-9; Judith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7), 74-75.

⁴⁴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128-141.



多利亞時代長居媒體版面的文化內容，也是最為核心的一種權力運作形式。上述四位學者對於性別、身體、權力三者之關係皆有不同看法，本文則將焦點放在政治活動中的身體表現及其性別涵義，並引入文化史對於權力的研究方式，通過考察當時代人的識別經驗，分析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兩位首相的身分標記、符號隱喻和行動意義。

（二）研究材料的選擇

本文的背景是十九世紀不列顛的選舉改革與政黨競爭，研究時段為 1865 年至 1880 年。1865 年帕默斯頓子爵的逝世，是選制再次改革以及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兩人競爭首相之位的契機，而 1880 年格拉斯頓二度拜相與隔年迪斯雷利病逝，則為兩人的競爭畫下句點。另外，由於 1865 年以前兩黨的意識形態與政黨紀律皆尚未成型，選舉權的擴張程度也不足以涵蓋各社會階級，因此必須將研究時段限縮在 1865 年之後。

第一類材料是政府檔案和收藏，國會辯論的文字稿收錄在《國會議事錄》（*Hansard*）中，這包括迪斯雷利、格拉斯頓以及其他議會同儕的發言紀錄，是本文的核心材料之一。另外，在「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中，保存了大量珍貴且具分析價值的人物肖像，為本文的論述提供相當關鍵的參考依據。

第二類是回憶錄、書信與傳記。福特（Michael Richard Daniell Foot, 1919-2012）和馬修（Henry Colin Gray Matthew, 1941-1999）已將格拉斯頓日記整理出版，迪斯雷利的書信則由金士頓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 at Kingston）的教授們接力整理成冊，第一冊於 1982 年出版，最新的第十冊於 2014 年出版，收錄 1868 年的信件。⁴⁵這些私人文書可以補充議會外的言談並捕捉到個人意見。另外，維多利亞時代人留下的許多回憶錄及傳記，對於理解當時人對時代變革以及兩位政治領袖的看法也十分有幫助。

第三類是個人著作與小冊。迪斯雷利的小說已被許多研究者利用於解釋其行事動機、政治理念及世界觀，對於研究一位政治人物而言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材料。從格拉斯頓對古希臘文學和基督教神學的研究專書中，也可看出其道德理想的源

⁴⁵ 迪斯雷利書信集的編輯者有 J. A. W. Gunn, John Matthews, Donald M. Schurman, M. G. Wiebe, J. B. Conacher, Mary S. Millar, Ann P. Robson, Ellen L. Hawman, Michel W. Pharand, Sandra den Otter，其中 M. G. Wiebe 參與了全部十冊的編輯工作。

頭。此外，兩人也都針對政治問題出版過小冊，我們可分析其內容以理解兩人的政治理想與思路。洛帕坦－盧米斯（Nancy LoPatin-Lummis）和帕特里奇（Michael Partridge）主編的《維多利亞政治人物生平》（*Lives of Victorian Political Figures*, 2006）中，則收錄其他人所發表，談論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小冊。

第四類是報紙與刊物。維多利亞時代的報紙版面分為大報（broadsheet）和小報（tabloid），大報使用較正式的文字報導嚴肅的內容，而小報則更偏好具煽動力和娛樂性的內容。報紙是維多利亞時代主要的大眾媒體，也是較容易取得、流通的文字載體。大報將以「泰晤士報數位資料庫」（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所收錄的《泰晤士報》（*The Times*）為主。小報則以新井潤美（Arai Megumi）編輯的三冊《樂趣周刊》（*Fun: A Collection of Books from the Victorian Weekly Magazine*），以及「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收錄的《潘趣周刊》（*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為主，其中登載大量與時事有關的諷刺漫畫。諷刺漫畫的使用與分析也是本文的核心課題。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身體表演與競爭關係，可以從諷刺漫畫中看出其深化兩方對立的效果。這些漫畫具有更直接鮮明的表現手法，甚至允許畫中角色的變形與誇大。

（三）研究限制

本文儘管能利用已整理出版的材料，但礙於交通及經費限制，部分史料還須藉由二手研究間接獲悉。本研究之限制在於未能直接調查藏於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Oxford）的迪斯雷利檔案，藏於威爾斯哈登格拉斯頓圖書館（Gladstone's Library, Hawarden）的格拉斯頓檔案，以及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中關於兩人的資料。另外，由於論述篇幅有限，無法將所有相關材料排列於文中。

為分析之便，本研究只關注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兩人於公領域的表現，而未能企及私領域、同儕關係及婚姻關係等對個人性別塑造亦不可輕視的因素。而若要將身體展演的政治意義擴展到社會各層面，則可能需要參考量化研究或是書籍史針對當時讀者習性、背景和政治傾向的調查結果。本文未觸及地域問題，聯合王國內部各個構成國對於政治改革的分歧意見，並不能單純藉由以兩位首相為主體的研究來討論。從首相、國會議員、選民到一般群眾，從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到愛



爾蘭，每個個體的複雜經驗以及多重身分的交織性，絕非可以用在一個議案上是投贊成還是反對票來下結論。各次大選的勝負也是結果論，未能細緻分析個人特質對選舉勝負的影響權重。

本文目的僅在探討選舉文化中的性別議題，並不主張陽剛特質是兩人拜相的決定性條件，而是具有不應忽視的重要性。維多利亞時代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兩種陽剛特質之外，尚有性少數的「另類」陽剛特質，希臘羅馬的古典陽剛特質，海外殖民地的異國陽剛特質，以及戰地前線的軍人陽剛特質等，皆對維多利亞社會產生影響，也是未來可以持續發展的課題。

四、 章節安排及大綱

本文除緒論及結論之外，正文分三個章節，安排及說明如下：

第一章「領袖魅力：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男性理想」，本章將關注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理想（ideal masculinity），也就是男孩的教養目標和成年男子的理想特質，並以此為基礎，分析兩人如何理解陽剛特質的政治意義。為此，本文將討論兩人的男性身體觀及其形成脈絡。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十九世紀不列顛的男性教育」，綜合教育者對男性理想的看法與陽剛特質論述，以說明身體在男性理想中扮演的角色。第二節「迪斯雷利與紳士風度」，聚焦迪斯雷利的行為舉止與自我塑造。第三節「格拉斯頓與男子氣概」，則討論格拉斯頓的學習經歷與自我定位。

第二章「明星對手：保守黨與自由黨的領袖身體與政治理念」，本章將考察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如何透過身體表演來詮釋政治理念，為此本研究將個別分析保守黨與自由黨在兩人領導下的政策方向，並從諷刺漫畫對兩人的變形描繪反面論證身體表演與政治理念的關係。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保守黨與『兩個國家』」，以迪斯雷利的小說《西碧爾：兩個國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所提到的貧富問題為引，討論迪斯雷利如何帶領保守黨並推廣其政策。第二節「自由黨與『哈登崇拜』」，則從自由黨對格拉斯頓的領袖崇拜出發，分析格拉斯頓的政治理念與其個人表現的關係。第三節「諷刺漫畫的變形肖像」，透過解析諷刺漫畫中兩人肖像的元素，探討創作者企圖激起讀者對時事聯想的方向。

第三章「男人注定鬥爭：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與改革」，本章將剖析身體表演和政黨價值的整合，如何影響兩人在選舉改革中得到的評價，並進一步闡述



陽剛特質和男性身體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意義。為此，本文以迪斯雷利小說《科寧斯比》(*Coningsby*, 1844)中「男人注定鬥爭」([the decree of] manhood [is] a struggle)一句，形容兩人競爭與陽剛特質的關係。⁴⁶本章將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改革成為競爭的手段」，分析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在政治改革中樹立的形象，以及兩人形象如何體現各別黨派的立場。第二節「改革成為競爭的目標」，則聚焦於兩人在下議院中關於選舉改革的辯論表現。第三節「競爭成為改革的標準」，將焦點移至改革內容中涉及的選民，以此補充政治人物對身體的設想與規範。

本文探討維多利亞時代男性形象的政治意涵，聚焦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分析兩人如何運用自身形象來影響政治改革與領導政黨。本文指出，迪斯雷利以精緻打扮和文學才華塑造「時髦公子哥」形象，成功結合保守黨和工人群體的傳統價值；格拉斯頓則以學術修養和宗教信仰打造自律、勇敢的男子氣概，並以「伐木學者」的堅毅身體形象，呼籲群眾支持自由主義改革。兩人分別通過不同的陽剛特質，在演講和公開活動中展現領袖魅力，影響選民和政治觀點。本文還分析了諷刺漫畫和商業照片中對兩人形象的詮釋，顯示出當時政治人物身體形象的重要性。最後，本文貢獻在於探討了選舉改革和公開演講中的陽剛特質，並指出身體表演能建立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信賴關係和情感。

⁴⁶ Benjamin Disraeli, *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844), bk. 3, chap. 1, 110.





第一章、領袖魅力：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男性理想

本文研究對象為十九世紀下半葉不列顛的兩位政治領袖：保守黨的迪斯雷利和自由黨的格拉斯頓。兩人早年的學習經驗和生活經歷，對日後在政壇上的表現頗有影響。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在《教育漫話》（*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中所勾勒的紳士，持續影響十八、十九世紀的男性教育觀。洛克所謂的紳士是支持社會運作的優秀男性。他相信要將男孩培養成紳士，就得使其具有男子氣概，具體表現為行動的優雅得體和心靈的勇敢、自信。¹

一、十九世紀不列顛的男性教育

十八世紀後期的一本教養手冊，切斯特菲爾德伯爵（Philip Dormer Stanhope, 4th Earl of Chesterfield, 1694-1773）的《與子討論成為世俗紳士的藝術》（*Letters to His Son on the Fine Art of Becoming a Man of the World and a Gentleman*, 1774），在十九世紀相當受歡迎。伯爵主張紳士要培養良好的學識和語言能力，同時也要注重與其身分相符的華麗服飾與舉止。伯爵對紳士的定義比洛克狹隘，是指有權利參與政治的男性。他相信「人們會從一個人的穿著中對其品味和性格形成一些看法」，²並認為「繡金的緋紅外套」（scarlet coat laced with gold）和「織錦背心」（brocade waistcoat）是紳士的理想穿著，但紳士不能只有外表出眾，因為人就像是一本書：

華麗的封面能吸引目光，能引起每個人的注意；但對女人以及像女人的男人（men who are like women）來說，他們更關心書的封面，而非書的內容。有見識、有學養的男人會直接檢查內容，而他們若是發現書的內容與封面的華麗不相符，就會以更強烈的憤慨和蔑視將其扔掉。我希望當我的這版作品〔指其子〕被打開閱讀時，最好的評論人會發現內外一致且相互關連，內容充實而富有精神。³

¹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 rep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0), 46, 72, 100, 174.

²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etters to His Son by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on the Fine Art of Becoming a Man of the World and a Gentleman*, vol. 1 (1774; repr., London: M. Walter Dunne, 1901), 150-153.

³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etters to His Son*, vol. 1, 13-14.



伯爵並不贊成服裝與地位不相襯，他認為身為貴族卻穿得簡陋會有損名譽；而在其他段落中，他形容穿著比所屬地位華麗、過度在意外表的男性為「花花公子」（coxcomb）和「紈褲子弟」（fop）。⁴在上段引文中，伯爵提到「像女人的男人」只在乎外在而不重視內在；換言之，伯爵認為雖然紳士應該打理好外表，但過度在意外貌反而會減損陽剛特質。除了服裝之外，伯爵也叮嚀兒子注意打理身體，包括保留略長的捲髮，把鬍鬚刮乾淨，注意口腔清潔，最好還能擁有 5 呎 10 吋（約 178 公分）的理想身高。⁵據信格拉斯頓的身高是 5 呎 10 吋半（約 180 公分），而迪斯雷利似乎和他差不多高，位於當時男性身高的平均值。⁶

十九世紀初，愛爾蘭政治人物埃奇沃斯（Richard Lovell Edgeworth, 1744-1817）則對紳士抱持不同看法。埃奇沃斯認為紳士是「國家的驕傲」（country's pride）和「自由的堡壘」（bulwark of her freedom），應在精神和物質條件上保持獨立，這種獨立就是有男子氣的品格（manly character）。他認為準備成為紳士的男孩需要一個身教的楷模，這個楷模通常是他的紳士父親。楷模有助於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待人接物的道理。埃奇沃斯接著建議年輕的紳士應該懂得辨認事物的實用價值，「男人就算是穿樸素的外套，也能和穿著繡金華服一樣自豪」（men are as proud of plain coats as of gold and embroidery）。⁷

蘇格蘭作家史邁爾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的《自勵》（*Self-Help*, 1859）是十九世紀中葉最暢銷的行為指導手冊之一。史邁爾斯認為品格是具體呈現在個人身上（embodied in the individual）的道德秩序，也是統治國家的主要力量。因此，品格是每個男孩都該學習的內容，而不只是菁英家庭子弟的事。他將品格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有男子氣的品格。埃奇沃斯認為是獨立，而史邁爾斯則認為是「誠實、正直、善良和堅定的意志」（truthfulness, integrity, goodness, and strength of purpose）。這樣的人能夠做好事、抵抗誘惑，也能承受艱苦與不幸。而比這樣的人更高一層的是「真正的紳士」（true gentleman），與傳統說法中代表統治階級

⁴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etters to His Son*, vol. 1, 51-54, 150-153.

⁵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etters to His Son*, vol. 1, 47-48, 87-90, 97, 215.

⁶ Henry Colin Gray Matthew,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98),”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 2nd ed., ed. Robert Crowcroft and John Cann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5; Harvey Sicherman, “Disraeli’s Secre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7 (Spring 2002): 46.

⁷ Richard Lovell Edgeworth, *Essay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ondon: J. Johnson, 1809), 47-48, 247-253.



的紳士不完全相同。

史邁爾斯稱紳士為道德規範的最高標準，並歸納出紳士的品格包含「淳樸、誠實、耿直、有禮、節制、勇敢、自重、自勵、謹慎、克制、友善、勤奮、英雄式的自我犧牲、男性的溫柔」（*honest, truthful, upright, polite, temperate, courageous, self-respecting, self-helping, discretion, forbearing, kindly, industry, heroic self-denial, manly tender*），而與財富或地位無關。一位真正的紳士因具有這些品格而受到敬重。⁸史邁爾斯修正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對外表的注重程度，認為貴族的習氣不能同樣適用在中產階級身上，重要的是整潔而非華麗。他主張中產階級不應模仿貴族的穿衣風格，因為不但造成不必要的經濟負擔，還會危害社會風氣：

人們希望將男孩培養成紳士，或更準確地說是「有教養」（*genteel*）的男人；然而結果卻常常只是將他們變成假紳士（*gents*）。他們養成了對衣著、時尚、奢侈品和娛樂消遣的品味，這些品味無法為男子氣概或紳士風度奠定堅實的基礎。⁹

史邁爾斯對品格的推崇，是因為他試圖擴張紳士的定義，使其適用統治階級以外的群體，尤其是日漸崛起的中產階級。然而，在同時代的另一部作品，休斯（Thomas Hughes, 1822-1896）的小說《湯姆·布朗的校園生活》（*Tom Brown's School-Days*, 1857）中，作者從另一個角度延伸了紳士的內涵。休斯主張男孩應該注重運動，尤其是拳擊，因為他相信拳擊不僅是「英國男孩解決紛爭的自然英式辦法」（*natural and English way for English boys to settle their quarrels*），而且有益於鍛鍊脾氣和肌肉。讀太多書反而會有傷害。除此之外，休斯還認為「強身派基督教信仰」（*Muscular Christianity*）是紳士的必要元素，即透過身體運動陶冶個人道德和學習宗教價值，因為信仰而勇於拒絕爭鬥，則是最高尚的勇氣。休斯並不鼓勵暴力，但也不因此放棄教導男孩們在必要時透過打架來解決問題。¹⁰

綜上所述，從洛克、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埃奇沃斯到史邁爾斯和休斯，可以看出「紳士」一詞的定義和指涉範圍因人而異，狹義上指具有政治權力的上流階層男

⁸ Samuel Smiles, *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 rev.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97), 382-408.

⁹ Samuel Smiles, *Self-Help*, 290-300.

¹⁰ Thomas Hughes, *Tom Brown's School-Days*, 6th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6), 296-299.
這部作品設定的背景為 1830 年代的公學。



性，廣義上則用於描述男性在公眾生活中的理想型態。有實際從政經驗的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和埃奇沃斯較排斥「紳士」的廣泛定義。另一方面，隨著中產階級的人數和重要性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提升，開始出現關注中產階級不同之處的教養手冊。史邁爾斯和休斯都試圖擴充「紳士」一詞的適用範圍和內容。

然而，十九世紀初期陽剛特質的定義，正是因為紳士的道德內涵被抽離，而連帶受到影響：紳士不再講求內外兼備的禮貌（politeness），而只要求表面功夫的禮節（etiquette）。¹¹另外，由於更多女性、孩童投入工廠工作，許多男性的身分認同受到衝擊而產生焦慮，這種焦慮拒斥帶有女人氣（effeminacy）的文雅（refinement）和禮貌，認為文雅和禮貌削弱男性天生的蠻橫（brutality）和粗魯（rudeness）。¹²中產階級開始強調純樸（simplicity）、獨立（independence）、勇氣（courage）、勞動尊嚴（dignity of labour）、身體活力（physical vigour）等「有男子氣概的」（manly）特質，這些特質在十九世紀不列顛被統稱為男子氣概（manliness）。¹³

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教育過程中，成為「紳士」是最重要的課題。十九世紀初期的不列顛，並沒有全國統一的行政系統支持學校教育，課程內容端看各學校的成立目的。以青少年教育為例，有以教授學術知識為主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培養宗教人才的教會學校，以及原本提供平民教育，卻逐漸貴族化的公學（public school）。¹⁴洛克、切斯特菲爾德伯爵和埃奇沃斯都認為，紳士應該具備拉丁文知識。¹⁵這個觀念確實體現於學校教育中，各類學校都將拉丁文視為最重要的科目，並依法只能使用十六世紀的權威教材，文法學家李利（William Lily, 1468-1522）的《拉丁文法基礎》（*Latinae Grammaticae Rudimenta*, 1540）。¹⁶

然而，文法學校、教會學校與公學，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學校氣氛：文法學校

¹¹ Michael Curtin, “A Question of Manners: Status and Gender in Etiquette and Courtes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no. 3 (September 1985): 395-423. 十八世紀的禮貌要求必須透過外在行為向他人表達内心關懷，十九世紀的禮節則僅要求不要和他人產生摩擦和誤解。參考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8-20.

¹² Michèle Cohen, “‘Manners’ Make the Man: Politeness, Chival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1750-183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313.

¹³ John Tosh, “Gentlemanly Politeness and Manly Simplicity in Victorian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12 (2002): 469-471.

¹⁴ John Ashton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1.

¹⁵ 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15-146;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etters to His Son*, vol. 1, 7-8, 51-54, 75-79; Richard Lovell Edgeworth, *Essay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247-253.

¹⁶ Foster Watson, *The Old Grammar Scho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6), 72-76.



和教會學校大多採取導生制（monitorial system），教師先把年長和優秀的學生教會，再讓這些學生去指導其他學生的學習問題，營造教學相長、提攜後進的氛圍；公學則崇尚學長學弟制（fagging），即年輕學生接受年長學生保護和使喚，以及強身派基督信仰，藉由體育競賽和嚴格紀律培養學生的榮譽感和團隊精神，同時強化資歷和服從上級的觀念，以培養未來領導者的自信。也就是說，對公學學生而言，身體能力相當重要，不僅決定該學生是否能夠融入同儕，同時也牽涉學生之間的階級秩序。

二、迪斯雷利與紳士風度

（一）迪斯雷利的教育

班傑明·迪斯雷利於 1804 年 12 月 21 日出生於首都倫敦，是家中長子，家族屬於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其父親艾薩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 1766-1848）是學者、作家及文學評論家。雖然是猶太人，但迪斯雷利的家庭並不要求子女信仰猶太教，迪斯雷利與兩個弟弟雷夫（Ralph Disraeli, 1809-1898）、詹姆斯（James Disraeli, 1809-1868）都在年幼時受洗成為聖公會的一員，這在當時並不常見。¹⁷ 1817 年，受洗後的迪斯雷利至倫敦東北部郊區，沃爾瑟姆斯托地區希根山丘（Higham Hill, Walthamstow）的希根會堂（Higham Hall）上課，教師是一位論派（Unitarianism）牧師伊利澤·科根（Eliezer Cogan, 1762-1855），為顯赫家族子弟講授古典語言、神學、英語和現代科學，以一間教會學校的標準而言，科根對科學的開放態度實屬罕見。¹⁸

¹⁷ 「塞法迪」為希伯來語的西班牙（סְפָּרָד，Sepharad），源自《希伯來聖經》中指稱伊比利半島的詞彙，和合本譯為「西法拉」（俄 1:20）。1492 年，天主教國家的「復地運動」（Reconquista）結束時，西班牙雙王頒布了《阿罕布拉詔令》（Alhambra Decree），驅逐原本居住在伊比利半島而不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這些保有原居地生活習慣的一支派系即稱為塞法迪猶太人。迪斯雷利相信自己父系家族是來自義大利威尼斯的塞法迪猶太人，然而根據布萊克的考察，其祖父應該是來自義大利的教皇領（Papal States），並在 1748 年為了尋覓商業利益而移居英格蘭。參考 Robert Blake, *Disraeli*, 5; David Cesarani, *Disraeli*, 10.

¹⁸ 一位論派否認三位一體和基督的神性，早在《尼西亞信經》（*Symbolum Nicaenum*, 325-381）頒布時即被普遍認為是異端思想。聯合王國的宗教自由可以追溯至英格蘭國會通過的《1689 年寬容法案》（Toleration Act 1689），其給予新教異議者（Protestant Dissenters）一定程度的禮拜自由，但仍然限制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反三位一體派（nontrinitarianism，包括一位論派和主張二神論的卡特里派〔Catharism〕等）和無神論者的信仰自由。要到聯合王國國會通過《1813 年三位一體教條法案》（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ct 1813）之後，一位論派才被納入新教異議者的寬容範圍。參考 1 Will. & Mar. c. 18, 53 Geo. 3 c. 160.



然而，儘管科根的教會學校所提供的已是菁英教育，也培養出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¹⁹但根據布萊克男爵的說法，迪斯雷利似乎另有心儀之所：他曾在 1860 年表示原本打算去弟弟們就讀的學校——全國頂尖的溫徹斯特公學（Winchester College）。這是英格蘭歷史最悠久的一間名校，也是培育公職人員的搖籃。²⁰儘管最後迪斯雷利沒有如願，但從其他同學的描述來看，他在希根會堂的學習經驗似乎並不壞，甚至可能早在這時就展現了他的創作天賦。迪斯雷利的同學們對他的印象是「活潑、無憂無慮，能輕鬆應付課業，平時常用自己創作的冒險故事逗樂朋友」。話雖如此，迪斯雷利並沒有在學校給老師留下好印象，科根曾表示「我永遠沒辦法讓他學會虛擬式」。²¹

布萊克等幾位傳記作者認為，迪斯雷利當時若是到溫徹斯特公學就讀，可能會遭到嚴重歧視和霸凌，因為迪斯雷利年少時體弱多病，比起運動更喜歡閱讀，難以融入崇尚階級和氣力的男學生群體。除此之外，他還有著一套符合刻板印象的猶太人外貌：黑瞳、鷹勾鼻、黑色卷髮和蒼白黯淡的皮膚，這會讓他更容易成為被霸凌的對象，因為公學的學生相當擅長且樂於「辨認」猶太人。²²當時公學內部對猶太學生的霸凌事件相當猖狂，包括肢體、言語和關係上的暴力，以致於家長們還要另外為孩子安排防身技巧的課程，才有辦法讓他們在緊急時刻保護自己。²³切薩拉尼（David Cesarani）和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則強調，迪斯雷利的母親就是因為考量到他的身體狀況和公學的霸凌風氣，所以才會強烈反對將他送去公學。²⁴

¹⁹ 迪斯雷利或許是校友中名氣最大的一個，其他有名的學生包括埃及學者夏普（Samuel Sharpe, 1799-1881）、保守黨議員吉布森（Thomas Milner Gibson, 1806-1884）、科學家羅納德（Francis Ronalds, 1788-1873）和收藏家沃恩（Henry Vaughan, 1809-1899）等。

²⁰ Robert Blake, *Disraeli*, 12-13. 二十世紀初出版的傳記有提到迪斯雷利自述其父親與科根的相識過程，布萊克認為這有可能是迪斯雷利被安排去接受科根教導的原因之一，參見 W. F. Monypenny and G. 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rev. ed., vol. 1 (London: J. Murray, 1929), 24.

²¹ Christopher Hibbert, *Disraeli: The Victorian Dandy Who Became Prime Ministe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9.

²² Robert Blake, *Disraeli*, 16-17; Charles Richmond, "Disraeli's Education,"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ed. C. Richmond and P. Smith, 17; Roger Mason, *Disraeli v Gladstone: Westminster's Most Bitter Feud* (London: Fonthill Media, 2020), 66, Kindle. 並沒有明確材料證明為何迪斯雷利的弟弟們「可以」去念公學。如果傳記作者們強調的「猶太面孔」屬實的話，那他的弟弟們確實有可能因為身體較為健壯（以便在遇到霸凌時反擊或承受傷害，同時符合公學價值觀），且長相並不非常符合刻板印象的猶太人，而獲得家長同意。嚴格來說，他們兄弟的身分是在聖公會領洗的基督徒，而非猶太教徒，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於猶太人。

²³ Todd M. Endelman, *Radical Assimilation in English Jewish History, 1656-194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98-99;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in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Liberal Socie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86-94;

²⁴ David Cesarani, *Disraeli*, 34; Christopher Hibbert, *Disraeli*, 9-10.



迪斯雷利的「氣質」、「外貌」和「身體狀況」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他會有和弟弟們不一樣的升學安排。

（二）迪斯雷利的野心與楷模

1819 年，十五歲的迪斯雷利離開科根的學校。迪斯雷利對躋身上流的渴望與表現欲，在他十七歲時得到了刺激。離開科根的學校之後，迪斯雷利在家利用父親的藏書自學，被介紹進入父親朋友合夥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實習生，並兼差擔任倫敦大出版商約翰·默里二世（John Murray II, 1778-1843）的出版顧問。默里不僅是迪斯雷利父親的好友，同時也是朗德爾（Maria Eliza Rundell, 1745-1828）、克雷布（George Crabbe, 1754-1832）、司各特（Walter Scott, 1st Baronet, 1771-1832）、珍·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拜倫勳爵（George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 1788-1824）等著名作家的出版商。迪斯雷利並不想當律師，他總覺得這是大材小用。除了透過服裝和手勢打扮成「時髦公子哥」，與他看不起的同事做出區隔之外，迪斯雷利也利用時間從事文學創作，他相信自己「值得更戲劇性的未來」。²⁵他還把心思放在股票炒作上，認為這是一夕致富的機會。從後見之明而言，儘管沒能讓自己成為富翁，但這確實給了他更加戲劇性的未來。

1820 年代，聯合王國外相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 1770-1827）為了維護聯合王國在美洲的經濟利益，不願那些在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 1803-1815）結束後復興的歐洲專制勢力，介入中、南美洲的獨立運動，曾試圖拉攏美國總統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發表共同聲明。1823 年，門羅在國情咨文中宣告「美洲事由美洲人管」的孤立主義思想，在日後被稱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坎寧積極推動聯合王國承認各個獨立的新國家，並在 1825 年與各國簽訂商貿協議。當時在國內興起一股美洲投資熱，迪斯雷利觀察到「儘管公眾對整個行業一無所知，但他們爭先恐後地搶購股票」，股價急遽上漲，人人擁「股」自重，「沒有任何人要賣掉手上的英墨礦業公司（Anglo-Mexican Mining Association）股票」；他自己則是和默里以及商人波爾斯（John Diston Powles, c. 1787-1867）合夥，

²⁵ Christopher Hibbert, *Disraeli*, 14-15.



樂觀地利用保證金槓桿操作美洲礦業期貨，也就是借錢從事高風險投資。²⁶

然而，礦業股票的漲幅在 1825 年 1 月陷入停滯，「投機的風險已經變成操作的障礙」，又因為國內沒有關於公司進展狀況的消息，有些持股人開始將股票變現，盲目的投資信心逐漸動搖，遂導致股市泡沫的破裂。為了喚起投資人的信心，迪斯雷利接連出版三本小冊宣傳美洲礦業，鼓吹「黃金國（Eldorado）不再是個空想」、「〔新世界〕一個行政區的貴金屬年產量，比舊世界所有國家加起來還多……不列顛能好好利用這些礦物」、「礦山是墨西哥這個國家真正的財富源泉，那些持反對意見的理論經濟學家，都無法勝過經驗的鐵證」。²⁷從迪斯雷利留下的信件來看，他應該確實盡其所能地研究了投資項目，也對手上的股票充滿信心，相信股票的價值「會在幾年內從一百英鎊漲到超過一千英鎊」。²⁸話雖如此，無論迪斯雷利寫的書有多少內容是真憑實據，他自己又相信幾分，終究是對市場現況過於樂觀。那三本振振有詞的小冊沒辦法挽救市場的信心，迪斯雷利也沒能及時變現手頭的股票，因為這時發生的事比他所意識到的還要嚴重。除了礦業公司經營不善之外，美洲新興國家也無法及時贖回發行的債券，連帶使許多從事高風險投資的銀行倒閉，最終引發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機。²⁹

迪斯雷利虧損了大約 6,000 英鎊，為此他決定再次和默里、波爾斯合作，創辦支持坎寧和托利黨的日報《捍衛者》（*The Representative*），「我不僅能獲得可觀的利潤，它也會實質幫助我實現最大的野心」。³⁰但迪斯雷利獲得的不是利潤，而是又一次的挫敗。《捍衛者》發行不到一年就宣告停刊，迪斯雷利也陷入神經衰弱。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上的打擊，也是因為《捍衛者》承載了他所謂的「野心」：「不做一家報紙的編輯，而做一間大機構的總裁、一群有教養的紳士（a band of high bred

²⁶ Benjamin Disraeli to Robert Messer, draft, April,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ed. J. A. W. Gunn et al., vol. 1, 1815-183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no. 21, 27; Benjamin Disraeli to John Murray, January 31,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vol. 1, no. 18, 23-24; Robert Blake, *Disraeli*, 24-25.

²⁷ Benjamin Disraeli to John Murray, January 31,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vol. 1, no. 18, 24; Benjamin Disraeli, *An Inquiry into the Plans, Progress, and Policy of the American Mining Compan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8; Benjamin Disraeli, *Lawyers and Legislators: or Notes on the American Mining Compan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3; Benjamin Disraeli, *The Present State of Mexico*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111.

²⁸ Benjamin Disraeli to Robert Messer, draft, April,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vol. 1, no. 21, 28.

²⁹ Larry Neal,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825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British Financial System," *Review* 80 (1998): 53-76.

³⁰ Benjamin Disraeli to Robert Messer, draft, April,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vol. 1, no. 21, 29.



gentlemen) 和重大權益的首領」，他原本希望這份報紙能凝聚志同道合的優秀夥伴，並發揮社會影響力，甚至挑戰第一大報《泰晤士報》在輿論的領導地位；未料事與願違，似乎即使是一群富有學識和才華的紳士也無法保證事業成功。³¹迪斯雷利自認屬於「有教養的紳士」的一份子，事實上，他也的確透過父親和默里的人脈，與許多上流社會人士來往，或至少有所耳聞。

在這些人當中，他最欽慕的一位就是拜倫勳爵。在《捍衛者》停刊之後，迪斯雷利透過旅行來治療神經衰弱，不僅是為了舒緩身體不適，同時也為了恢復嚴重受挫的自信心。迪斯雷利追尋拜倫的足跡，踏上他曾經旅行過的城市和鄉野。³²這位在參與希臘獨立戰爭（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1821-1829）中因病而死的大文豪，人生和他筆下的英雄一樣精彩。在迪斯雷利的小說《維維安·格雷》（*Vivian Grey*, 1826）中有段討論文學的對話，幾個貴族在哀嘆股票下跌讓流行文學走向拙劣時懷念起拜倫：

拜倫的離世是永遠無法挽回的痛。他實在是個真男人（real man），我用這句話來讚美他擁有人性所應追求最為優秀的品格。至少就我而言，我沒有野心讓世人當我是神仙或天使下凡；而且當我觀察到世上大多數的人在身體和心靈上都同樣女性化（effeminate）時，我確實擔心是否就連我自己的野心也太過崇高。拜倫的心靈就像他筆下的海洋，在洶湧的狂濤中顯得崇高，在熠熠豔陽的光輝中依然燦爛，在浩瀚曠野的孤寂宏偉中格外強大，我們會被其本身特質的魅力吸引目光，而即使像是透過黯淡的玻璃觀察那樣模糊，但他的心靈仍能夠表現出所有其它部分的特質。³³

從這段文字不難看出，迪斯雷利眼中的拜倫就是理想人格的完美典範，是有教養的紳士，也是與女性化沾不上邊的「真男人」。除此之外，迪斯雷利也堅信拜倫奠定了時髦公子哥的經典形象：

「時髦公子哥」（dandy）已被認為是庸俗的用語，現在代表時尚的詞彙是「花美男」（beau）。時髦公子哥能否復興還有待商榷；至於這個被淘汰的

³¹ Benjamin Disraeli to John Murray, September 21, 1825, in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vol. 1, no. 28, 39.

³² Robert O'Kell, *Disraeli*, 34-35.

³³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4, chap. 1.



頭銜本身，雖然在剛開始流行的時候還有些缺陷，但拜倫的作品使它不僅融入英式文化，更成為時代經典。³⁴

也就是說，迪斯雷利認為拜倫充實了時髦公子哥在過去被詬病虛有其表的缺陷，並且將時髦公子哥與英國紳士畫上等號，與此相比，花美男雖然時尚，但卻是法國的舶來品。而他也在《維維安·格雷》中讓「迪斯雷利」與拜倫、司各特、歐文、騷塞（Robert Southey, 1774-1843）、米爾曼（Henry Hart Milman, 1791-1868）等知名作家並列：一位女士向維維安·格雷（Vivian Grey）索取歐文的親筆簽名，格雷在模仿筆跡仿造出簽名之後，詢問那位女士要不要順便收集上述其他幾位作家的「手跡」。³⁵這是迪斯雷利在所有小說中僅僅兩處提及本名的段落之一，也是他將拜倫視為楷模的一條證據，故有些研究者稱迪斯雷利「自封為拜倫的傳人」。³⁶

迪斯雷利在《維維安·格雷》、《年少公爵》（*The Young Duke*, 1831）、《孔塔里尼·弗萊明：精神自傳》（*Contarini Fleming: A Psychological Auto-biography*, 1832）和《阿爾羅伊奇譚》（*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 1833）等早期的小說中，為主人公添加了「拜倫式英雄」（Byronic hero）的性格，使他們驕傲、有野心、受挫、不滿，像拜倫也像迪斯雷利。這些小說的體裁大多是「銀叉小說」（silver-fork novels），也就是作者匿名提供貴族名流生活的小道消息。³⁷迪斯雷利不是貴族，所以我們不能認為小說內容完全符合貴族的實際狀況。

在出道作《維維安·格雷》的書名頁上，作者名為「時尚之人」（“a man in fashion”）。直到 1833 年，受雇於文學刊物《弗雷澤雜誌》（*Fraser's Magazine*）的畫家丹尼爾·麥克利斯（Daniel Maclise, 1806-1870），為「《維維安·格雷》的作者」畫了一幅肖像（圖一），並以當時使用的假名「阿爾弗雷德·克羅奎斯」（Alfred Croquis，姓氏在法文意為「速寫」）落款。在肖像中看得到菸斗、戒指、燕尾服、緊身褲、絲質領帶以及時髦的站姿：包含了時髦公子哥的所有視覺元素，

³⁴ Benjamin Disraeli, *The Young Duke*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1), bk. 1, chap. 4, 33-34.

³⁵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2, chap. 9. 原文如下：“Come, there is Washington Irving’s autograph for you; read it; is it not quite in character? Shall I write any more? One of Sir Walter’s, or Mr. Southey’s, or Mr. Milman’s or Mr. Disraeli’s? or shall I sprawl a Byron?”

³⁶ Robert O’Kell, *Disraeli*, 35; Daniel R. Schwarz, “Disraeli’s Romanticism: Self-Fashioning in the Novels,”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ed. C. Richmond and P. Smith, 45.

³⁷ Douglas Hurd and Edward Young, *Disraeli: or The Two Liv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3), 36.



並以從事文學工作的紳士自居。迪斯雷利將拜倫視作行為和心靈上的楷模，自我塑造成符合他印象中最陽剛的姿態。迪斯雷利的理想男性標準來自他所認識到的貴族和文人社群，隨著拜倫這類外表精緻講究而內心熱情浪漫的人物被樹立為典範，時髦公子哥也擺脫空有其表的既定印象，成為繼續維持禮貌的復古紳士象徵。

（三）迪斯雷利的小說主人公

迪斯雷利沒有接受大學教育，也沒有進入公學就讀，這樣的學習經歷時常被視作他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捩點：與其他同樣成為首相的人相比，迪斯雷利缺少了背景與人脈的先天優勢；另外，部分學者相信他的校園生活並不快樂，並認為這導致他在年輕時就意識到自己與英格蘭社會格格不入，遂決定終其一生追求成為凌駕於眾人之上的支配階級。³⁸然而，這類主張並非根據迪斯雷利的親口承認，而是從他在具有自傳色彩的數本小說中，刻劃的主人公形象所推斷出來的解釋。

在《維維安·格雷》中，主人公格雷剛進學校即成為風雲人物，並因為鼓動學生反對導師、私下籌備劇團，而讓達拉斯校長（Everard Dallas）意有所指的提醒同學留意「你們之中煽動對抗體制的陌生人」（*seditious stranger among you*），這讓班上小團體的領袖，大塊頭史密斯（St. Leger Smith）藉機嘲諷格雷就是那個陌生人，並和格雷爆發肢體衝突。³⁹值得留意的是，史密斯除了說格雷是陌生人之外，也曾對他的外表奚落了一番。史密斯是典型的「校園惡霸」角色，他從初登場時便打算向格雷示威，所以帶著五十個搗蛋鬼去戲弄這個新人，要讓格雷清楚認識到史密斯就是學生們的頭目：

「天啊！時髦公子哥！（A dandy, by Jove!）」桑雷治·史密斯低聲說道。

「多麼精緻時尚的服裝！（What a knowing set out!）」小強生拉高嗓門叫著。

「小寶貝想找媽媽囉！（Mammy-sick!）」大巴洛對著格雷咆嘯。不過，最後喊的那句毫無疑問是造謠中傷的誹謗行為，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夠在剛到

³⁸ Robert Blake, *Disraeli*, 17; Charles Richmond, “Disraeli’s Education,” in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ed. C. Richmond and P. Smith, 18.

³⁹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1853; repr., Tokyo: Hon-no-Tomosha, 2002), bk.1, chap. 4.



這裡時，像維維安·格雷一樣，在達拉斯先生這樣嚴肅古板的老學者面前，還能站得如此泰然自若而無所畏懼。⁴⁰

史密斯和他的小跟班們顯然將格雷的打扮當作笑柄，一種可能是受到他們的學習內容，也就是古典學科和基督教價值觀的影響，兩者皆認為追求精神智識的成長比追求物質享受的豐富更高尚，故更欣賞樸素耐用的服裝。但考量到他們只是十幾歲的孩子，更有可能是因為「時髦公子哥」的打扮在男孩眼中就像女生。⁴¹戈弗雷(Sima Godfrey)歸納出「時髦公子哥」典型的衣裝：筆挺的衣領、奢華的領帶、緊身的背心，並進一步分析出「時髦公子哥」是十九世紀倫敦、巴黎兩大都市的特色，是站在比群眾更高的位置，透過優雅和諷刺的行為挑戰既有秩序的「局外人」(outsider)和「異客」(foreigner)，他們可以被視為對功利主義社會的一股反動力量。⁴²「局外人」和「異客」的說法也與小說中的「陌生人」遙相呼應。

而在《維維安·格雷》問世之後五年，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也寫下他對「時髦公子哥」的定義：

時髦公子哥是衣冠楚楚的人，他的技藝、職責和生活方式都在於穿衣服這件事情上。他的每一寸靈魂和精神，每一分錢財和人格都堅決地奉獻在一個目標上，就是把衣服穿得體面出色；因此，就像別人穿衣服是為了活著，他活著是為了穿衣服。⁴³

但這個說法實際上只描述了一半。「時髦公子哥」起源自「花美男」布魯梅爾(George Bryan “Beau” Brummell, 1778-1840)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掀起的時尚風潮，對於服裝的要求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⁴⁴他們不只認為服裝應該要有合身的剪裁和講究的質料，也要求行為必須文雅而不莽撞，身體必須整潔而有香味。當時上流社會的服裝和禮儀規範，為了與新興企業家劃清界線而愈加華麗誇張，目的在於表現出與汲汲營營、追求工具理性的企業家完全相反的印象。出身中產階級的布魯梅

⁴⁰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1, chap. 3.

⁴¹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1, chap. 1: “his hair curled, and the boys called him girl.”

⁴² Sima Godfrey, “The Dandy as Ironic Figure,” *SubStance* 11, no. 3 (1982): 21-33.

⁴³ Thomas Carlyle, *Sartor Resartu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felsdröckh* (1831; repr.,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8), 314.

⁴⁴ Daisy Hay, *Mr. And Mrs. Disraeli: A Strange Rom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23.



爾，則透過出色的穿搭品味和極度繁瑣的打扮程序（如花五個小時打一條簡樸的領帶），推廣低調內斂但奢華的衣著風格，成功吸引上流階級的仿效：成為「時髦公子哥」的每一項要求都與工具理性背道而馳。他們會投注影響生計的大筆錢財在衣服、香水和沐浴上，也會花費遠超所需的大把時間來整理自己的儀容，平日無所事事，四處尋找表演諷刺技巧和俏皮話的機會。他們的信念是什麼？或許正如追思布魯梅爾的文章所說，「外觀保養的講究有利於心靈的高尚，我們相信這個說法極為真實且非常嚴肅」。⁴⁵

讓我們把焦點放回《維維安·格雷》。史密斯和他的跟班總是一搭一唱，所以有理由認為他們在剛見到格雷時說的三句話存在層遞關係：由外至內，先是嘲諷外表，接著譏笑服裝，最後調侃心理。從史密斯等人的修辭可以看出，格雷的打扮被他們解讀為一種幼體化的表現。或許是因為格雷的外觀，就和「在家中受到母親妥善打理」的小男孩頗為類似，所以他們才會在提到外表和服裝之後，說格雷肯定在「想媽媽」，也就是像個幼兒一樣軟弱、依賴大人、受呵護、無法獨立。這就能解釋為何迪斯雷利會用「冷靜」和「勇敢」等特質來為格雷辯護。

然而，迪斯雷利並沒有否認格雷是個時髦公子哥，而且在書中前一章已經提到，格雷在成長過程中逐漸變成一個在乎外表的孩子，不只會拒絕再穿帶有褶邊的衣服，還會把零用錢存起來拿去買當時流行於紳士之間的一種護髮乳：馬卡髮油（Macassar oil），用來把他的直髮弄捲。⁴⁶早在 1890 年代，傳記作者弗勞德（James Anthony Froude, 1818-1894），便根據迪斯雷利本人的說法，認為這就是他對自己早年經驗的描寫，包括《維維安·格雷》和《孔塔里尼·弗萊明》的同名主角，都是迪斯雷利透過紙筆再現的自我；⁴⁷但蒙尼彭尼（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1866-1912）和巴克爾（George Earle Buckle, 1854-1935）也提醒，「不能相信自傳式小說忠實呈現了迪斯雷利過往生活的細節」。⁴⁸那麼，小說內容的可信程度如何？迪斯雷利在 1870 年自陳早年寫的小說「充其量只是想像力作用於知識的結果，而非從實際經驗獲得的資訊」。⁴⁹迪斯雷利是否和學校裡身材最壯碩的同學打架或許不

⁴⁵ John Lemoinne, "Brummell," *Revue des Deux Mondes* 7, no. 3 (August 1844): 484.

⁴⁶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1, chap. 2.

⁴⁷ James Anthony Froude, *Lord Beaconsfield*, 2nd ed., *The Queen's Prime Ministers: A Series of Political Biographies*, ed. Stuart J. Rei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90), 15-19.

⁴⁸ William Flavelle Monypenny and George Earl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vol. 1, 28.

⁴⁹ W. F. Monypenny and G. 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vol. 1, 85.



是重點，但根據迪斯雷利本人的說法，格雷確實是他某個側面的自我描寫。⁵⁰無論描寫的內容是否符合真實，我們可以透過迪斯雷利在小說中提及的知識細節，了解他選擇發揮的題材基礎。

維維安·格雷的個性高傲、浪漫、充滿野心，認為自己是時髦公子哥，⁵¹並且對他人的嘲笑不以為忤，只反對史密斯等人譏諷自己幼稚的話。對迪斯雷利本人而言，時髦公子哥也可以是個冷靜勇敢的男子漢。這和卡萊爾之所以用諷刺的筆調描寫時髦公子哥有關。因為在十九世紀早期，所謂「紳士」抑或是理想男性的定義，正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而有所不同。識別紳士的方式漸漸從出身轉變成行為，而「時髦公子哥」的規範填充了紳士身分的內容，卡萊爾認為這威脅到紳士的道德內涵，以致於無法區分「真正的」（true）和「假裝的」（acting）紳士。⁵²

相較於以階級觀念和世襲地位給未來領導者培養自信的公學教育，迪斯雷利在教會學校學了希臘文、拉丁文以及歷史、文學、宗教的相關知識。即使他的學業表現並不突出，但這些知識為他的自學、閱讀和創作能力奠定了基礎，甚至可能啟發了一些「非常不尋常的浪漫想法」。⁵³維維安·格雷「發現世上所有的智慧都集中在五十本古書裡，他以為想像到最傲慢的心靈睥睨那些不幸的現代人」，孔塔里尼·弗萊明則深信「除非我是最偉大的人，否則人生一定難以忍受……我渴望在軍隊前頭揮舞我那鼓舞人心的劍，或衝進言詞交鋒的熊熊烈火中」。⁵⁴根據布萊克男爵的說法，迪斯雷利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的家族是義大利貴族之後，因此具備進入貴族社群的條件；但也因為他有猶太血統，所以不見容於英格蘭的上流社會。⁵⁵

三、 格拉斯頓與男子氣概

威廉·格拉斯頓於 1809 年 12 月 29 日出生於航運大城利物浦，是家中么子，家族來自蘇格蘭低地，父親約翰·格拉斯頓(John Gladstone, 1st Baronet, 1764-1851)

⁵⁰ 迪斯雷利曾表示，《維維安·格雷》、《孔塔里尼·弗萊明》和《阿爾羅伊奇譚》分別代表他積極真實的野心、詩人性格的成長以及理想抱負。參考 Robert Blake, *Disraeli*, 38.

⁵¹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1, chap. 7.

⁵² James Eli Adams, *Dandies and Desert Saints: Styles of Victorian Manho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53.

⁵³ Christopher Hibbert, *Disraeli*, 11; Robert O'Kell, *Disraeli: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3.

⁵⁴ Benjamin Disraeli, *Vivian Grey*, bk. 1, chap. 6; Benjamin Disraeli, *Contarini Fleming: A Psychological Auto-Bi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1832), bk. 1, chap. 8, 72-73.

⁵⁵ Robert Blake, *Disraeli*, 1-10.



是托利黨國會議員、商人和奴隸主。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同樣擁有優渥的家庭條件，但似乎沒有族群認同的顧慮，而順理成章地進入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和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就讀。但光是這樣淺薄的敘述，並無法解釋格拉斯頓為何會在一眾菁英中脫穎而出，成為男子氣概的代言人和典範角色。他的教育背景和個人經歷，無疑在人格塑造以及樹立楷模方面發揮了重要功能。事實上，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一樣，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足以影響人生未來方向的關鍵事件。

（一）格拉斯頓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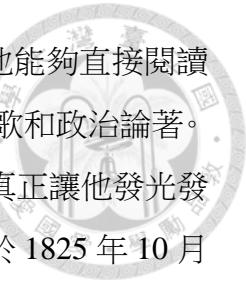
1821年，11歲的格拉斯頓和三位哥哥一樣進入伊頓公學就讀，但他的哥哥們似乎都不大想在這裡待著：大哥托馬斯（Thomas Gladstone, 2nd Baronet, 1804-1889）已經在伊頓待了四年多，但成績並不出色；二哥羅伯森（Robertson Gladstone, 1805-1875）在格拉斯頓入學的同一個月，轉到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商業；三哥約翰（John Neilson Gladstone, 1807-1863）則在前一年就從伊頓轉去樸茨茅斯（Portsmouth）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⁵⁶格拉斯頓對三哥的印象是「比我大三歲，有更高程度也更具男子氣概（more manly）的品德」，而他自己則是「在完全沒有任何知識和其他熱衷事物的狀況下進入伊頓公學，除非我那時已經對議論產生一種自命不凡的熱愛」。⁵⁷換言之，格拉斯頓認為他在學校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體驗就是參加辯論活動。根據史學家哥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 1823-1910）對格拉斯頓的回憶：

伊頓和牛津為他的蘇格蘭智慧和商業頭腦增添了最高規格的英格蘭文化。雖然伊頓在那時候只教他古典學，但男孩們對公共事務相當感興趣，其中很多人是政治世家子弟。有個熱鬧的辯論社，叫做「棒棒糖」（Pop），格拉斯頓是那裡的明星。到了牛津之後，他除了古典學之外還加修了數學，拿到了雙一流學位（double first-class honours）。而且他也是辯論社的明星。⁵⁸

⁵⁶ Roy Jenkins, *Gladstone*, 9-10.

⁵⁷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1809-1859 (London: Macmillan, 1903), 15.

⁵⁸ Goldwin Smith, *My Memory of Gladston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6. 伊頓公學辯論社的官方名稱是「伊頓會」（The Eton Society），是屬於年長菁英學生的俱樂部，因為最初常在一家棒棒糖店（lollipop shop）聚會討論而被稱作“Pop”，故依典故譯為「棒棒糖」。根據 OED 的解釋，“Pop”被認為是粗俗不敬的稱呼，而帶著敬意的稱呼為「文人」（The Literati）。



格拉斯頓的學習興致相當高昂，他在古典學上的學習成果讓他能夠直接閱讀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經典。除了課業知識之外，他也大量閱讀散文、詩歌和政治論著。他常常請父親幫忙買書，甚至成為了家中藏書的薦購顧問。⁵⁹然而真正讓他發光發熱的是辯論社的活動。根據格拉斯頓的日記，他的第一次演講發表於 1825 年 10 月 29 日的最後一場辯論，題目是「弱勢教育整體而言是否有益？」（whether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 is on the whole beneficial），他擔任正方辯士，主張與可預期的回報相比，「投注其中的資源實在太少了」。⁶⁰稀奇的是，格拉斯頓似乎妥善地將講稿保存下來了，所以同時代的莫雷子爵（John Morley, 1st Viscount Morley of Blackburn, 1838-1923）能夠將部分內容收錄在傳記當中：

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在這個日益文明的時代，我們應當希望在上層階級中，很少有人（萬一真的有的話）會急於或樂意阻礙他們出身卑微的同胞，去修養道德和心靈。若有這樣的人，請讓他們記住，儘管沒能得到同樣的物質條件，但窮苦人家仍被賦予同樣的理性。讓他們承認（我想沒人能否認），他們位處高位，主要是為了造福同胞。那麼他們有什麼藉口和理由來推辭、逃避責任呢？⁶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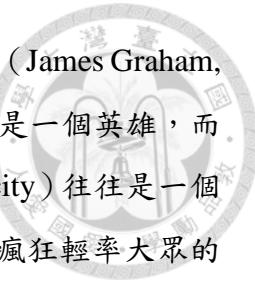
自由、文明、道德、理性，這是 15 歲的格拉斯頓認為像他一樣受良好教育的不列顛菁英，所享受的文化成果，以及肩上所負的社會責任。他展現出一種有別於先天優越論的啟蒙信念，相信理性是人人平等的，而讓一部分人沒辦法獲得應有教育的原因是物質條件的差異：

高尚之人的地位有穩固到足以拒絕卑微之人的渴求嗎？驕傲之人已經傲慢到學會蔑視權利與理性，拒絕接受人人本心之中天生的仁慈，並將自己的同胞視為人渣嗎？壓制勞工的勤奮與天份，捏熄他們燃起的希望，輾平他們蓬勃的活力，這是道德正義還是政治操作？窮苦人家心中求知若渴，讓他們用有益的養料來滿足這個渴望，並提防陷入絕望的可能。……我不需耗費多大

⁵⁹ Ruth Clayton Windscheffel, *Reading Gladston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85.

⁶⁰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1, 1825-1832, ed. M. R. D. Foo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16: “after 4 made my 1st or maiden Speech at the Society on education of poor; funced less than I thought I should—by much.” 從中可以看出他真的認為應該支持弱勢教育。

⁶¹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35.



心力就能闡述我投給〔托利黨政治人物〕詹姆斯·格雷厄姆 (James Graham, Marquess of Graham, 1799-1874) 的理由。因為我把他看作是一個英雄，而不僅是在逞匹夫之勇，可惜這種動物般的凶狠 (animal ferocity) 往往是一個人要從群眾中獲得英雄頭銜的唯一條件。如果他除了來自瘋狂輕率大眾的那些掌聲之外，沒有評價過自己的優點的話，我確實該感到遺憾。⁶²

從格拉斯頓的講辭中可以看出，他相當強調上流階級的道德，並將引領社會向善當作他們的職責。而與道德相隨的品格是正義、仁慈、勇氣和自省。格拉斯頓主張，雖然被譽為英雄的人往往是因為勇猛而受到群眾歡迎，但在獸性之上還能兼具知性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也是有識之士應當學習並支持的對象。

此時的格拉斯頓已經給人留下懂得打理外表的知性形象。據說他在伊頓的一位學弟 (fag) 對他的印象是「一位英俊、頗為清秀的青年，皮膚白皙，棕色捲髮，總是乾淨整潔、衣著得體」。⁶³而從 1839 年留下的肖像來看（圖二），格拉斯頓似乎長年都維持著這個形象。肖像中的他衣著樸素整齊，外表也打理得乾淨不花俏。

格拉斯頓在 1828 年和他將近一半的同學一起進入牛津大學就讀，他到了基督堂學院 (Christ Church)，並加入牛津辯論社 (Oxford Union)。學院志願是格拉斯頓父親的選擇，因為當時基督堂是全校最有勢力而且培養出最多政治菁英的一間學院。⁶⁴同樣到基督堂學院的伊頓學生中，或許就屬林肯伯爵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Clinton, Earl of Lincoln, 1811-1864) 對格拉斯頓的影響最大。林肯和格拉斯頓在伊頓時就是好友，據信他在 1831 年 5 月 17 日聽到格拉斯頓的辯論，尤其是其中批評改革議案 (Reform bill) 「威脅改變不列顛政府的形式，最終會打破整個社會的框架」之後，⁶⁵便向強烈反對選舉改革的父親紐卡斯爾公爵 (H. P. F. Pelham- Clinton, 4th Duke of Newcastle-under-Lyne, 1785-1851) 引薦格拉斯頓。紐卡斯爾公爵屬於當時所謂的「極端保守派」 (Ultra-Tories，反對解放天主教的政治派

⁶²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35-36. 格雷厄姆是托利黨政治人物，曾任宮廷副大臣 (Vice-Chamberlain of the Household) 並因此進入樞密院。他在格拉斯頓演講的那一年 (1825)，當選劍橋選區的國會議員，日後成為皮爾派的領導人。

⁶³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34.

⁶⁴ Travis L. Crosby, *The Two Mr. Gladstones: A Study in Psychology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8.

⁶⁵ 這段話來自格拉斯頓寄給哥哥的信中所描述的辯論內容概要。參考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73.



系）。在紐卡斯爾的支持下，格拉斯頓順利在 1832 年底當選國會議員，這年他 22 歲。其選區諾丁漢郡的紐瓦克（Newark, Nottinghamshire）正是紐卡斯爾公爵的勢力範圍。⁶⁶

然而多年之後，位居財相的格拉斯頓卻在推動第二次選舉改革。他在關於法案的二讀辯論中面對迪斯雷利的質疑，相當坦然地承認「我年輕的心靈和想像力曾對第一個改革法案產生過無用而徒勞的恐懼，這種恐懼現在仍然困擾著這位議員閣下〔指迪斯雷利〕的成熟心靈」。⁶⁷顯見格拉斯頓對選舉改革態度的轉變，很可能發生在他踏入政壇之後。

（二）格拉斯頓的宗教信仰

格拉斯頓的政治信念與價值觀離不開他的宗教信仰。格拉斯頓的父親曾贊助利物浦當地的教堂興建事務，也讓格拉斯頓從小時候開始就頻繁接觸聖公會的團契活動，但他也承認「我小時候並不虔誠。我不記得以前有過對神之家和服事的熱愛」。⁶⁸格拉斯頓對基督教義的興趣大概始於就讀伊頓公學的時候，當時「幾乎沒有實際在教基督教義了，但所幸沒有一個班級放棄〔自習〕」，⁶⁹他利用在課堂上學到的希臘文和拉丁文，自己研讀《聖經》和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的著作，⁷⁰每晚讀經、祈禱，並在 1825 年 7 月 16 日開始用日記記錄自己每天利用時間的狀況，以用來自我鞭策。⁷¹例如在同年 9 月 27 日，他就因為覺得自己沒有善加利用時間而在日記中寫下「願上帝使我能夠更好地利用未來」。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因為同樣使用古希臘文閱讀的關係，格拉斯頓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融入了古希臘哲學的思想，尤其是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觀點。⁷³這使

⁶⁶ Roy Jenkins, *Gladstone*, 24.

⁶⁷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illiam E. Gladstone], speaking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 on 27 April, 1866,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3, col. 129. 譯文經過刪修，原文如下：“...I grant my youthful mind and imagination were impressed with the same idle and futile fears which still bewilder and distract the mature mind of the right hon. Gentleman. I had conceived that very same fear, that ungovernable alarm at the first Reform Bill in the days of my undergraduate career at Oxford which the right hon. Gentleman now feels.”

⁶⁸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13.

⁶⁹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28.

⁷⁰ David Bebbington, *The Mind of Gladstone: Religion, Homer,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⁷¹ Richard Shannon, *Gladstone: God and Politic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7), 7

⁷²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 1, 11.

⁷³ Agatha Ramm, “Gladstone’s Religion,” *Historical Journal* 28, no. 2 (June 1985): 332.



得他的教義理解、宗教政策、政治信念三者之間密不可分。格拉斯頓年輕時的政治主張，讓他年僅 22 歲就當上國會議員。然而，他在政治生涯的早期，卻大多將精力放在宗教課題上：他在 1838 年出版《國家與教會關係》(*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1840 年又出版《教會原則成效研究》(*Church Principles Considered in Their Results*)。在《國家與教會關係》中，可以看出格拉斯頓反對政治去宗教化：

在宗教與政府的分離中，我們看到了一種變化……第一、它主張現實的無神論，因而是人類選擇蓄意、存心並且永久放棄尊重上帝。第二、它以最具說服力的形式主張無神論，即藉由將對立面（宗教）從人類之間最永久和最權威的事物（他們的公共政治）中去除。第三、這種主張不是由單獨個人、而是由大眾（masses）提出的，他們被賦予了政治權力，並在最可悲的一廂情願之下，聲稱這是一種自由的權利（a right of freedom），從而把自己從神聖的保護和尊重中放逐。⁷⁴

與他對弱勢教育的主張一樣，格拉斯頓認為政治權力應該由少數菁英掌握，而且最好是尊重上帝的虔誠信徒。若賦予大眾政治權力，他們可能會沉迷在「自由」的虛名中無法自拔，而自行放棄了超自然力量加諸自身的「保護」和「尊重」。而就個人而言，他也認為文雅和禮節若失去宗教信仰的內涵就只是一片虛無：

……當基督信仰的光芒退到僻靜的角落時，人類的自私自利會變得更加冷漠、粗魯、嚴酷，而如果沒有宗教，虛假的文雅或許會暫時呈現出光潔的外表，但很快就會崩解並消失。……慈善之流是否會湧進那些基督之名不被大眾所接受的社區中？……不，真理被否定，謬誤卻被接納。⁷⁵

而在《教會原則成效研究》中，格拉斯頓更進一步主張「聲稱真理在實踐和道德意義上已經失去超越人類領悟範圍的力量，正是反對真實人性的主要說法」。⁷⁶也就是說，格拉斯頓相信與其嚮往華麗優雅的外表，不如追求基督聖愛的真理與道

⁷⁴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 3r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307-308.

⁷⁵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 309-310.

⁷⁶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Church Principles Considered in Their Results* (London: John Murray, 1840), 42.



德，如此才能反映真實純粹而美好的人性。格拉斯頓的著述動機應該主要是為了呼應 1830 年代的「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也就是提倡在聖公會中重拾天主教教義和儀式的宗教復興運動。

然而，他的理論則吸收了當時牛津大學為了促進學生「男子氣概」所推行的改革方針：由於當時的大學是單一性別環境，比起將自己的男性身分與女性或陰柔氣質做出區隔，在同性之間建立評量標準才是重點。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的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為首倡者，他認為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的菁英學生正在開始承擔自治的權利和成年男子的諸多責任，因此最需要培育智力與德性的「成熟」（maturity）、「自律」（self-discipline），以及脫離「孩子氣」（boyish），成為照顧、保護、領導他人的角色。⁷⁷

相互比較之後，可以發現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所接收到的男性理想標準，其實源自於對「紳士」的不同理解。格拉斯頓學習到伊頓、牛津對政治菁英的期許和要求，並結合自身對古代經典的理解和詮釋，認為理想的男性應當追求真理、正義、自律和領導同胞。迪斯雷利則將自己的挫折與才華比附浪漫而有抱負的英雄，並透過對外貌、服裝和舉止的講究，追求成為表現傑出、感情豐沛、驕傲自信而優雅從容的理想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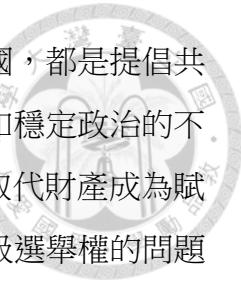
四、小結

當時社會對於理想男性標準的論辯，牽涉到了實際的政治課題。1848 年，歐陸爆發武裝革命浪潮，憲章運動參與者也發起大規模集會，在倫敦與曼徹斯特等地引起政府緊張。國會議員們認識到改革是棘手的課題：一方面必須安撫鼓譟的示威群眾，否則會有更多人傾向訴諸暴力；但另一方面又要斟酌改革的力度，避免選民的數量激增而衝擊到不列顛政治的穩定與和諧。儘管最後走向溫和漸進的改革路線，但在當時的政壇並沒辦法預見這樣的未來。⁷⁸

當時的一些思想家認為無論是推翻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 1830-1848）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共和（French Second Republic, 1848-1852），還是經過戰爭（American

⁷⁷ Heather Ellis, “‘Boys, Semi-Men and Bearded Scholars’: Maturity and Manline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Oxford,” in *What is Masculinity?*, ed. J. H. Arnold and S. Brady, 270-271.

⁷⁸ Jonathan Parry, *The Politics of Patriotism: English Liber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 1830-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9-220.



Revolutionary War, 1775-1783) 從大英帝國獨立出來的美利堅合眾國，都是提倡共和體制的「群眾統治」（democracy），並不適合有悠久階級傳統和穩定政治的不列顛；他們提倡以「體面可敬」（“respectability”）這個道德屬性取代財產成為賦予選舉特權的新標準。⁷⁹這個概念在實際應用上是為了處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而生，常以帶括號的片語：「『體面可敬的』工人階級」（“respectable” working-class）的形式出現。格拉斯頓稱其內涵可以概括為「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尊重秩序、忍受苦難、信賴法律、尊敬上級」。⁸⁰

透過駕馭自我以證明教養與自制力，其實就是男子氣概的一種表述方式，即男性個體的理想狀態；體現男子氣概的人會被視為「男子漢」（manhood）而受到同儕敬佩，更在長久以來被用於衡量領袖的適任與否。⁸¹托許也提到，除了格拉斯頓之外，同黨的布萊特（John Bright, 1811-1889）也是男子氣概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可以說男子氣概是自由黨相當重視的一項領袖特質。⁸²

然而這並不是維多利亞時代中期所推崇的陽剛特質的全貌。除了以男子氣概為代表的美德之外，紳士風度所代表的禮節也是在當時被重視的陽剛特質。⁸³迪斯雷利在他批判政治現況的小冊《英格蘭與法蘭西：內閣高盧狂熱的解方》（*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 1832）中，就將兩種陽剛特質的對比轉化到想像的外交場合中：

我們的外相〔帕默斯頓子爵〕收到了可靠的情報，指稱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吉耶米諾（Armand Charles Guilleminot, 1774-1840）正大力推行一項陰謀……。高貴的外交大臣立刻通知我國駐巴黎大使格蘭維爾伯爵（Granville Leveson-Gower, 1st Earl Granville, 1773-1846）不遺餘力查明情報的真假。……帶著令人敬佩的直率（frankness），以及在外交上即使不完美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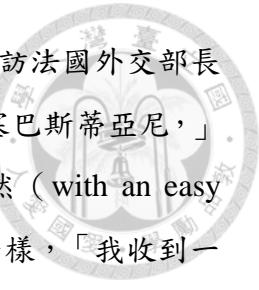
⁷⁹ Angus Hawkins, *Victorian Political Culture*, 224-249.

⁸⁰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illiam E. Gladstone], speaking for the Borough Franchise Bill, on 11 May, 1864,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75, col. 325: “What are the qualities which fit a man for the exercise of a privilege such as the franchise? Self-command, self-control, respect for order, patience under suffering, confidence in the law, regard for superiors.”

⁸¹ Herbert Sussman, *Victorian Masculinities: Manhood and Masculine Poetics in Early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25; Harvey C. Mansfield, *Manl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⁸² John Tosh, “Gentlemanly Politeness and Manly Simplicity in Victorian England,” 470-471.

⁸³ Stefa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113.



值得讚賞的高尚坦誠（noble candour），大使一早便直接拜訪法國外交部長塞巴斯蒂亞尼伯爵（Count Sebastiani, 1771-1851）。「親愛的塞巴斯蒂亞尼，」大使閣下說道，一邊從口袋拿出一張紙條，神情輕鬆淡然（with an easy indifference），就像只是在報紙上瞥見不重要的小道消息一樣，「我收到一條有點尷尬的訊息，你得看看。」法國的部長把目光投向那封有力的信。大家都知道塞巴斯蒂亞尼伯爵的男子儀態（manly bearing）、舉止直接（straightforward conduct）、頭腦簡單（direct mind）。對這樣不擅詭計的人來說，除了憤怒的否認之外還能期待什麼呢？「這是無恥的謊言！」塞巴斯蒂亞尼伯爵大喊。「我也是這麼想的。」英王陛下的代表回答。⁸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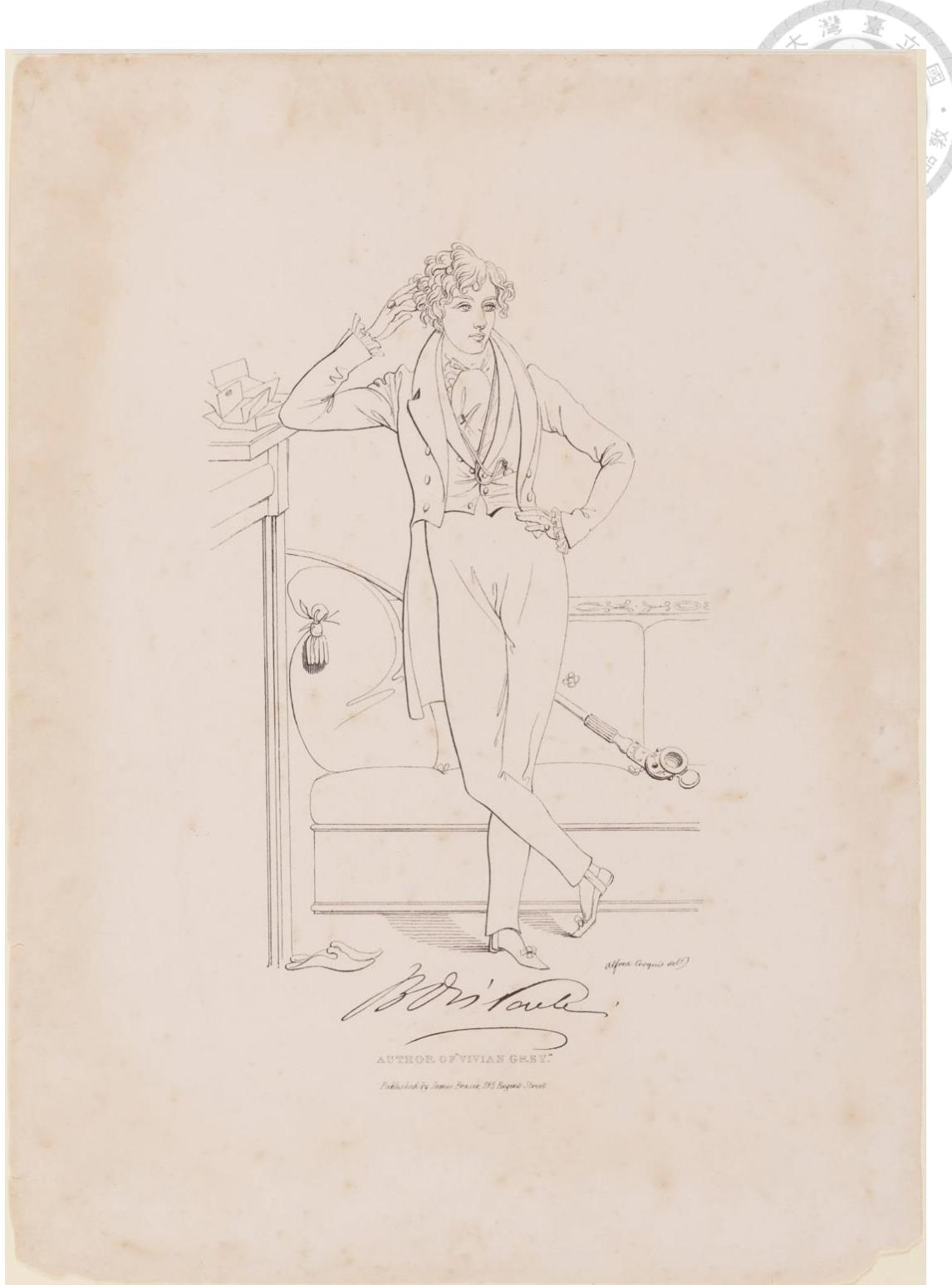
在這段迪斯雷利轉述或編造的軼事中，大使展現出從容、自信和尊嚴，優雅地從外交部長口中套出他需要知道的情報，順利完成大臣交代的任務。而法國的伯爵在這段故事中卻未經思考就給出否認的回答，沒有替他在鄂圖曼帝國的同事留下斡旋的空間。迪斯雷利在這裡將「男子儀態」和「舉止直接」、「頭腦簡單」並列，實在不是讚美或推崇的意義。

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早在 1830 年代就開始以有關於陽剛特質的規範與標準，發展各自心目中理想的政治領袖形象。而他們兩人其實在踏入政壇時，就嘗試將自己的形象打造成理想中的樣貌。我們可以從 1840 年留下的兩幅肖像得見端倪。這一年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都已經擁有國會議員的身份。從迪斯雷利的肖像（圖三）中可以看到，他身為「時髦公子哥」的標誌性捲髮和精緻的領帶和 1833 年的肖像相去不遠。另外，開襟的外套、斜視前方的眼神以及坐姿，也帶了幾分柔軟和優雅。對比之下，格拉斯頓的肖像（圖四）則採取站姿，右手微微藏在口袋內，讓手臂線條緊實；左手則拿著文件並墊著幾本書，在身後也可以看到書櫃。這是象徵勤於公事的符號。而格拉斯頓直視前方的眼神代表著自信，扣好鈕扣且平整的上衣，則展現出沉穩內斂的氣質。根據藝術史家克斯納（Ladislav Kesner）等人的研究，眼神直視觀眾的肖像畫更容易引起注意，觀眾的生理反應如同面對真人一般，眼球更常移向肖像人物的眼睛和嘴。⁸⁵

⁸⁴ Benjamin Disraeli, *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 (London: John Murray, 1832), 39-40.

⁸⁵ Ladislav Kesner, et al., “Perception of Direct vs. Averted Gaze in Portrait Paintings: A fMRI and Eye-Tracking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125 (August 2018): 88-99.

誠然，羅賓森（John Henry Robinson, 1796-1871）和莫特（William Henry Mote, 1803-1871）兩位肖像畫師，不一定是為了突顯兩人的特色才選擇如此呈現，但肖像主人本身的特色和個性確實得到了保留和發揮。而由於肖像繪製於第二次選舉改革（即 1867 年）之前的時代，大眾尚未成為政治人物博取關注和支持的目標，兩人此時也未身兼內閣要職，所以刻意展現出討好大眾形象的可能性並不高。然而，政治領袖真正的舞臺與表現機會，是國會殿堂的辯論和推行政策的手腕。下一章將關注保守黨與自由黨如何在兩位政治領袖的參與及帶領下，將他們各自理想的陽剛特質應用於政治場域，以及大眾媒體對政黨政策及核心理念的看法，如何透過變形的人物漫畫達到推崇或諷刺的效果。



圖一、《維維安·格雷》的作者

丹尼爾·麥克利斯（Daniel Maclise）繪，平版印刷，1833 年。

資料來源：*Benjamin Disraeli*.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1032.



圖二、年輕的格拉斯頓

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繪，粉筆畫，183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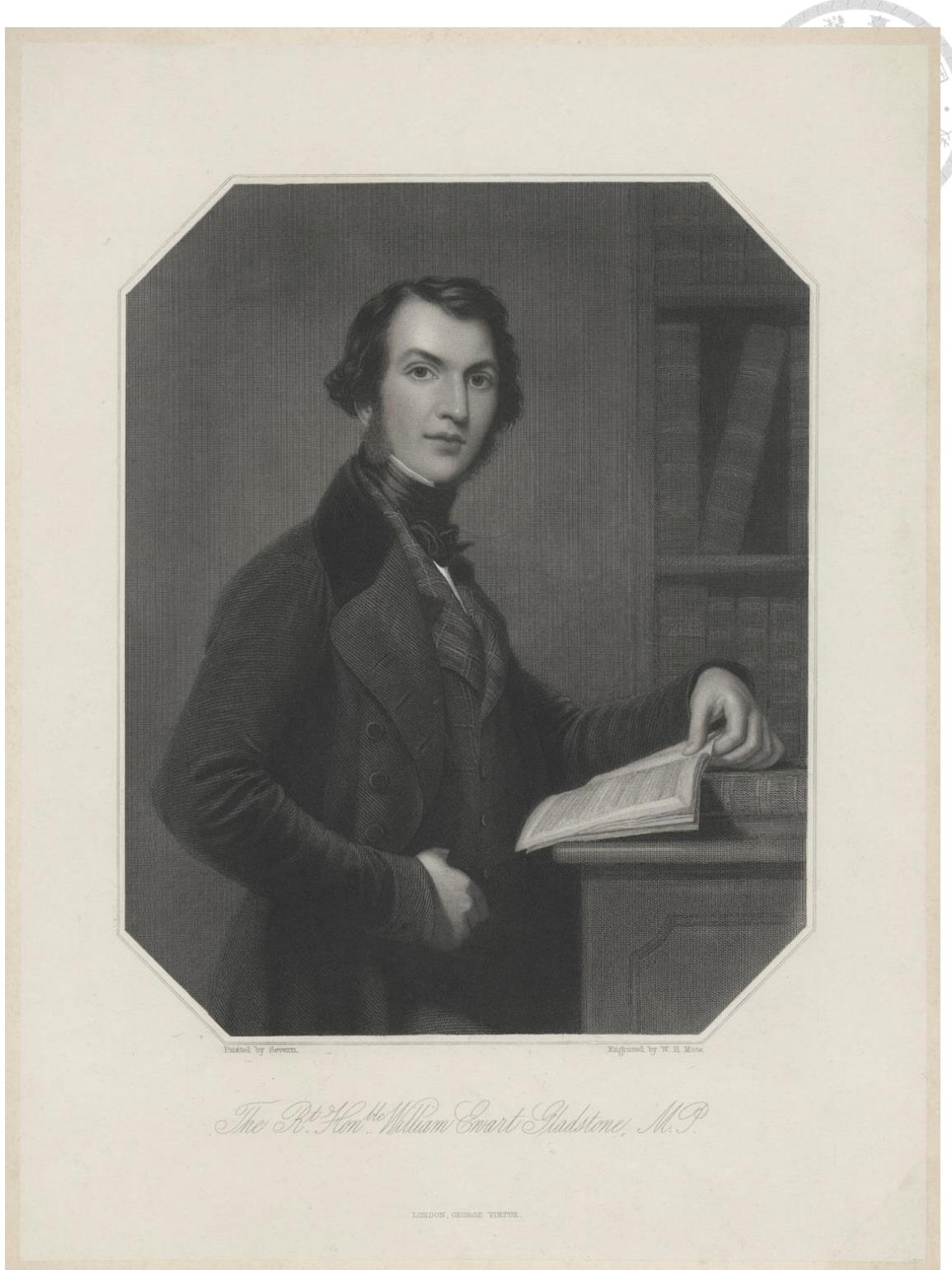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4034.



圖三、國會議員迪斯雷利

約翰·亨利·羅賓森（John Henry Robinson）刻，點刻雕版，1840 年。

資料來源：*Benjamin Disraeli*.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13928.



圖四、國會議員格拉斯頓

威廉·亨利·莫特（William Henry Mote）刻，線刻雕版，1840年。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8376.



第二章、明星對手：保守黨與自由黨的領袖身體與政治理念

若問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政治立場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立，那大概會是在 1830 年代，而且當時兩人在某種程度上還算是同一個政黨的成員。在上一章已經提過，格拉斯頓因為反對選舉改革的演講，而在紐卡斯爾公爵的幫助下，於 1832 年底當選國會議員，也因此加入當時的反對黨托利黨。迪斯雷利則在那場選舉中以激進派的立場落選，儘管他反對輝格黨，但卻相當支持選舉改革。而由於他的選區海維康（High Wycombe）沒有托利黨的參選人，所以開始有一些托利黨人為了不要讓輝格黨佔領國會席次，而寧願支持迪斯雷利。¹ 1837 年，迪斯雷利順利當選，自此成為托利黨的一份子。

1834 年 12 月 18 日，托利黨的羅伯特 · 皮爾在接下首相的職位後，發表《塔姆沃斯宣言》（*Tamworth Manifesto*），肯定了輝格黨通過的《1832 年改革法案》是「重大憲政問題最終且不可撤銷的解方」，但也重申黨內的保守主義原則，反對「生活在永恆的躁動漩渦中」。² 此後托利黨人更常以「保守黨」自稱。以後見之明而言，我們知道 1832 年的改革是一系列改革法案的開端而非結束。初出茅廬的兩人也在這段憲政史上的新篇章，逐步確立各自奉行一生的政治路線，不過卻與原本的情況大不相同。支持改革的迪斯雷利最後留在了保守黨，而反對改革的格拉斯頓則選擇和輝格黨站在一起，成為自由黨的創黨元老之一。這和皮爾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推行的政策有關。

1845 年 10 月 31 日，皮爾在收到飢荒報告後召開緊急內閣會議，並決定廢除《穀物法》的限制，以進口糧食救濟災民。³ 但這損害了本國農民與地主的生計，所以皮爾政府和保守黨內出現兩派意見。支持皮爾的保守黨成員被稱為「皮爾派」，贊成採取自由主義的貿易策略，也就是取消《穀物法》的關稅壁壘；反對皮爾的黨員則主張維持保護主義的貿易策略。反對的一派占了多數，皮爾最終因無法成功說服議員廢除《穀物法》而辭職。這也是日後皮爾派成員從保守黨出走，與輝格黨及激進派聯盟、組成自由黨，並與保守黨勢不兩立的嚆矢。格拉斯頓當時是皮爾內閣

¹ Robert Blake, *Disraeli*, 84-90.

² Robert Peel, *The Addres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Robert Peel to the Electors of the Borough of Tamworth* (London: W. Clowes, 1834), 7.

³ Cecil Blanche Woodham-Smith,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1849* (1962; repr., London: Penguin, 1991), 50.



的成員，因為支持自由主義政策而和皮爾站在一起。迪斯雷利則在 1841 年皮爾第二次當選首相之後，成為抨擊同黨首相最猛烈的一位旗手（他與皮爾皆否認與內閣人事任命有關）。⁴他除了在國會演講中斥責、甚至羞辱皮爾之外，更出版《科寧斯比》和《西碧爾：兩個國家》，從文學的角度描繪卡萊爾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點出的「不列顛現狀問題」（Condition-of-England question），即底層勞工貧乏的物質條件，以及他們的政治弱勢地位。⁵

一、保守黨與「兩個國家」

（一）保守主義與紳士

迪斯雷利受到憲章運動的啟發，在 1845 年出版的《西碧爾》中，讓自己在書中的化身「陌生人」和一位名叫埃格雷蒙（Charles Egremont）的年輕紳士有過一段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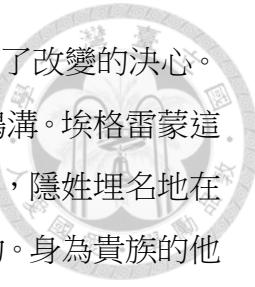
「確實，這個社會還處在起步階段，」埃格雷蒙微笑著說，「但無論如何，我們的女王統治著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國家」。「哪個國家？」年輕的陌生人〔迪斯雷利的化身〕問道，「她統治著兩個國家。」陌生人說到這就停了下來；埃格雷蒙也不開口，而是用眼神詢問。「你沒聽錯，」沉默片刻後，年輕的陌生人再次開口，「兩個國家。他們之間沒有來往、不會互相支持，他們對彼此的習慣、想法和感受一無所知，彷彿是住在不同地區或不同的星球上。他們由不同的教養形塑，用不同的飲食填飽肚子，以不同的禮儀約束，受不同的法律管轄。」「你說的是——」埃格雷蒙遲疑地問道。「富人和窮人。」（THE RICH AND THE POOR）〔陌生人回答道〕。⁶

女王治下的不列顛，富人與窮人的生活條件、居住區域、風俗文化，甚至連適用的法律都可能大不相同，宛如分屬「兩個國家」，社會被一分為二而無法互相理

⁴ Robert Peel, speaking for the Corn Importation Bill, on 15 May, 1846,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86, col. 689-690. Benjamin Disraeli's reply, col. 707-709.

⁵ Thomas Carlyle, *Chartism*, 2nd ed. (London: James Fraser, 1840), 1-8; 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rans. F. K. Wischnewetzk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891), 17.

⁶ Benjamin Disraeli,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3rd ed.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5), bk. 2, chap. 5, 149-150.



解。這是迪斯雷利筆下的不列顛現狀問題，而這也為他的角色提供了改變的決心。埃格雷蒙在陷入片刻沉思之後，如同獲得天啟一般決定打破這條鴻溝。埃格雷蒙這位「與同胞疏遠的」紳士，決定成為搭起「兩個國家」之間的橋樑，隱姓埋名地在平民的生活環境中蒐集情報，並試圖運用他的貴族地位發揮影響力。身為貴族的他以假名「富蘭克林」與主角西碧爾等人來往，並在真實身分曝光時說道：

「有人告訴我，」埃格雷蒙說道，「貧與富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有人告訴我，特權階級和平民百姓形成了兩個國家……若情況確實如此，我相信我們國家的毀滅已經迫在眉睫；我會盡力抵抗這種災難，或許力量微不足道，但熱情絕對足夠。我擁有地位，意味著我身負一定程度的責任：為了獲取讓我有資格採取有益行動的知識，我決定不引起懷疑地生活在與我疏遠的同胞之中。如果我被認出來，即使我毫無名氣，也一定會引起懷疑。他們會對我的階級和名銜感到厭惡……」⁷

迪斯雷利創造出這個角色，雖不像之前的傳記式小說一樣書寫自己的經歷與內心，卻展現出更明確的政治企圖和批判力道。他認為紳士的高貴與優雅來自先天的智慧和地位，以及後天的教養與環境，隨之而來的社會責任就是領導國家並解決社會問題。迪斯雷利強調紳士的誠意、熱情與信任，除了透過埃格雷蒙展現之外，也在國會演說上提及。1846年5月15日，在關於《穀物法》的休會辯論（adjourned debate）中，迪斯雷利指責皮爾立場轉變，背叛了保守黨的信任。他的措辭裡就聲明了紳士在政治上的職責：

……議長先生，這個國家的立國根基是自由討論。……但發生了什麼事？一群聰明能幹的紳士挺身而出，提出與這些新經濟學家相反的學說。他們領導著反對新思想的那個高人氣政黨〔指保守黨〕，並且透過宣揚自己的觀點得到信任，或更準確地說是熱切地尋求信任，以攀爬到權力之巔。由此可見，這些領袖所代表的團體相信他們不會反常地在座位上打盹，而會替團體的意見行動。我們這些代表或議院外的數百萬人，都沒有打算要出面組織一股勢力來對抗斯托克波特選區的議員閣下〔指輝格黨的科布登（Richard

⁷ Benjamin Disraeli, *Sybil*, bk. 4, chap. 8,



Cobden, 1804-1865)] 的敵對行動。不，我們信任其他人，信任那個藉由接受職位，或更確切地說是抓住這個職位，在這個國家中獲得最高地位，並在此時此刻統治英格蘭的人。您說，議長先生，發生了什麼事？尊貴的首席大臣閣下〔指皮爾〕告訴他同黨的議員朋友們，他已經向他們傳達了非常明顯的訊息，說他的見解有變。閣下說去年格雷勳爵 (Charles Grey, 2nd Earl Grey, 1764-1845) 就已經發現這件事，他很驚訝我們可以被他矇騙這麼久。……⁸

在迪斯雷利的用詞中，紳士並不專門指「議員閣下」(the honourable gentleman)，也包括了議會外的有識之士，其實就是享有投票權的人。而擁有議員身分的紳士則是這些人的代表。由於他們的權力與尊貴地位來自於眾人的信任，所以有責任為這份信任所承載的意志發聲。迪斯雷利將議員與選舉人的關係套用到黨魁和黨員的關係上，他認為皮爾的首相地位是立基於保守黨員的支持與信任，但皮爾卻沒有貫徹支持者的意志，出面對抗「科布登的敵對行動」，也就是他在 1838 年成立的壓力團體「反穀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反而被對方說服，改變了立場。迪斯雷利還提及輝格黨前首相格雷，意指皮爾早已背離保守黨的政治利益。

這段演講雖然沒有成功阻擋廢止《穀物法》的行動，但已經讓迪斯雷利一舉成名，成為黨內價值的捍衛者，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以及傳統紳士應有的政治認知、責任和品德。黨內與他立場接近的有史丹利男爵（德比伯爵）和本廷克勳爵，而因為這場演講的緣故，他們徹底與黨內的皮爾派決裂，包括格拉斯頓、帕默斯頓和亞伯丁等人皆改向輝格黨尋求合作機會。

(二) 迪斯雷利的崛起

1852 年 2 月，隨著德比伯爵就任為首相，迪斯雷利被任命為財相。到了 12 月，他面臨一個難題：預算案必須同時安撫自由貿易的提倡者和利益受損者。⁹而在相關法律修正案的討論會上，皮爾派議員赫伯特 (Sidney Herbert, 1810-1861) 對迪斯雷利感到不滿，認為他並不是個堅定的保護主義者，先前對皮爾的批評完全是出於政治鬥爭的目的。赫伯特認為迪斯雷利此舉打擊了紳士階級最重要的「使國家穩定

⁸ Benjamin Disraeli, speaking against the Corn Importation Bill, on 15 May, 1846,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86, col. 672-673.

⁹ Robert Blake, *Disraeli*, 328.



的政治聲譽」和「贏得公眾尊重的美德」，並出言諷刺他的預算案不會獲得支持，因為政治活動本質上是透過宣傳說服他人「改變立場」（make proselytes），而猶太人沒辦法說服任何人「改信」（convert）猶太教。赫伯特在這段話裡使用的「改變立場」，同時有「改信」的字義；他還揶揄猶太教的割禮儀式，稱「怎能指望任何人皈依一種得先接受外科手術的信仰」。¹⁰

無論迪斯雷利是否虔誠，他實際上就是聖公會信徒，而非猶太教徒。赫伯特是以這位財相的族裔和外貌當作人身攻擊的材料，換言之，在赫伯特眼中，迪斯雷利「依舊是」猶太人，而他的話中也帶有「猶太人無法取信於人」的意涵。若觀察當年報紙上的迪斯雷利肖像（圖五），便能發現他的衣著與年輕時相比已低調許多。領結不再花俏，但標誌性的捲髮和優雅的姿勢依舊引人注目。赫伯特的攻擊似乎沒有奏效，迪斯雷利「演講了五小時十五分鐘，在歡呼聲中回到座位上」。¹¹

由於保守黨與皮爾派的決裂，德比伯爵即使三度成為首相也只能組織少數政府，名義上屬於保守黨的皮爾派既不願入閣，也不願支持保守黨的提案。迪斯雷利在 1852 年、1858 年和 1866 年的德比內閣中皆擔任財相和下議院領袖，是政府決策實際上的頭號辯士。在德比內閣的油畫中，迪斯雷利是第二突出的人物（圖六）。值得一提的是，迪斯雷利對華麗、傳統和高貴的追求似乎只是變得低調收斂，而沒有完全消失：他在 1853 年辭官時，將本應依照慣例傳承給下一任財相的官袍（robe）留了下來。¹²這件官袍原本屬於前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所有，大多數肖像中他都只是把袍子擱在一旁，只有兩張穿上官袍的肖像留存下來。¹³官袍至今仍留在迪斯雷利的休根登莊園（Hughenden Manor）中（圖七）。不過迪斯雷利似乎沒有留下穿著官袍的肖像，反倒是格拉斯頓使用了當時最新（也是最早商業化）的攝影技術，留下了肖像名片（carte de visite），相片中的格拉斯頓西裝革履並穿著新的官袍，目光看向書桌上的小皮特胸像（圖八）。

1866 年的第三次德比內閣之所以成立，是因為當年 6 月，自由黨的羅素伯爵

¹⁰ Sidney Herbert, speaking for th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on Free Trade, on 26 November, 1852,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ed., vol. 123, col. 603-610.

¹¹ “Postscript: The Budget,”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ol. 21, July to Dec. 1852 (London: William Little, 1853), 3 December, 1852, 495.

¹² Simon Heffer, *High Minds: The Victorian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Britain* (London: Windmill, 2014), 276.

¹³ Paul Langford, “Politics and Manners from Sir Robert Walpole to Sir Robert Peel,” 110.

和格拉斯頓聯手推動第二次改革法案，遭黨內派系否決而使內閣倒臺的緣故。迪斯雷利嗅到機會，若改革勢在必行，那麼最明智的做法不是強行阻擋，而是盡可能為己方爭取更多利益。有關《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的辯論內容請見下章，在迪斯雷利的努力之下，法案的推行成了保守黨的政績。儘管內容在審議過程中被格拉斯頓大幅修改，但這無疑強化了保守黨溫和保守、漸進改革，體恤並為勞動階級爭取福利，誠懇而熱情地著手處理不列顛現狀問題的形象。布萊克男爵即稱，這讓新獲得投票權的勞工階級更願意投票給保守黨。¹⁴

(三) 「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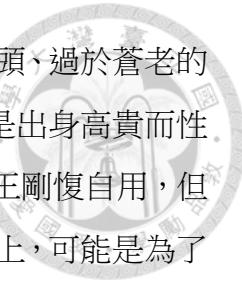
1868 年，德比伯爵因年邁而退休，迪斯雷利成為了首相，他在上任之後致力於改善貧窮和公共衛生等問題，並重組蘇格蘭法案落實監督委員會 (Scottish Board of Supervision)，指派官員斯克爾頓 (John Skelton, 1831-1897) 擔任委員會秘書。斯克爾頓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對迪斯雷利的印象：

那個強大的巫師，他有橄欖色的皮膚、煤黑色的眼睛和額頭上巨大的圓頂 (dome) ——我說的當然不是基督教堂 (no Christian temple, be sure) —— 他長得和人類見過的所有生物都不一樣。我先前從未在日光下見過他，而現在日光把他的陌生感 (strangeness) 變得更加明顯了。那張臉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像是一張面具，而他和凡間活人 (mere mortals) 之間的界線也越來越明顯。我瞬間以為我是在和哈姆雷特、李爾王或徘徊世間的猶太人 (Wandering Jew) 共桌。……人們貼切地說他是個相當出色的演員，但最終留下的印象是絕對的真誠和毫無保留。……他嚮往一個更強大的威尼斯，一個日不落的強盛國家。不列顛就是他心目中的以色列。¹⁵

斯克爾頓與迪斯雷利一家有交情，所以可推斷他並非像赫伯特一樣帶著敵意說這些話。可供證明的例子是，他開玩笑地稱迪斯雷利的夫人和貴婦朋友喝茶的樣子像是《馬克白》裡的老巫婆，其實是因為兩人先前曾預言迪斯雷利會當上首相；也是為了接續這個話題，他才稱迪斯雷利為巫師 (wizard 也有奇才的意思)。斯克

¹⁴ Robert Blake, *Disraeli*, 477.

¹⁵ John Skelton, *The Table-Talk of Shirley*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95), 257-258.



爾頓透過描寫迪斯雷利的臉孔來烘托出他的奇異，並接連用他的額頭、過於蒼老的臉孔和宏大的願望，來指涉他的猶太裔身分。哈姆雷特和李爾王都是出身高貴而性格複雜的莎劇角色。哈姆雷特有遠大的志向，但也憂鬱孤僻；李爾王剛愎自用，但也能同情底層人民的苦難。斯克爾頓將這些形象套用在迪斯雷利身上，可能是為了描述他複雜的個性，也可能是形容他如同主演一般在議會這個舞臺上的吸睛程度。

若觀察迪斯雷利在擔任首相期間留下的照片，或許可以幫助理解斯克爾頓所謂「像是面具」的臉是什麼意思。誠然，當時的攝影技術需要十五分鐘左右的曝光時間，會讓像中人物的表情偏僵硬，但迪斯雷利的情況更勝於此，幾乎無法從他的臉上看到任何情緒（圖九）。微垂的眼瞼和深邃的法令紋，使他看上去沉著而默然，這可能是他本人或藝術攝影師梅奧爾（John Jabez Edwin Mayall, 1813-1901）所安排的結果。因為到了 1876 年，他受封比康士菲伯爵（1st Earl of Beaconsfield）而必須離開下議院之後，已經遮掩不住衰老而疲憊的姿態，與圖九相比表情也不再僵硬（圖十）。這些照片是由梅奧爾的前助手，同樣也是著名攝影師的休斯（Cornelius Jabez Hughes, 1819-1884）在 1878 年 7 月 22 日所拍攝。兩組照片相距十年，可以用來比較迪斯雷利在兩任首相期間變與不變的特徵。他依然穿著同樣款式的禮服，而十年的身形變化使原本的俐落轉為歲月與經歷的沉重。

迪斯雷利第一任的首相任期不滿一年，而他的繼任者就是格拉斯頓。在卸下首相職務並成為反對黨領袖之後，迪斯雷利決定打造一個立場更加明確的保守黨，並藉由拉攏勞工階級的支持讓他重登首相之位。1872 年，他到了工業重鎮曼徹斯特，並在公眾面前演講三個半小時，據說 68 歲的他在演講期間像是平常喝水一樣輕鬆地喝光兩瓶白蘭地，或許是為了與勞工拉近關係：

……先生們，聲援、建設和頒獎都是些令人愉快的公務，如果生活中都是這樣的事情，那我們也沒有必要有怨言。但生活中還是有些男人該做的事（life has its masculine duties），我們今天聚首於此，是為了履行其中最重要的一些義務。身為自由國家的公民，我們聚集在一起，宣布我們堅決擁護、堅決捍衛憲政體制，因為我們認為憲政體制保障了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福祉。¹⁶

¹⁶ Benjamin Disraeli, speech on defend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n 3 April, 1872, to the People of Manchester,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Speeches*, ed. Houston Peters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555.



迪斯雷利在演講開頭便將捍衛憲政體制的行動定調為「男人該做的事」，並連結到男性傳統上被賦予的職責，也就是在自由和福祉受到威脅時挺身而出。接著，他將話鋒一轉，聲稱自由黨的所作所為，正在破壞這個國家長期保持穩定的基礎，以及在這個基礎之上茁壯成長的各項成就，無疑是在中飽私囊而罔顧社會公益。迪斯雷利將《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賦予男性工人選舉權一事，描述成保守黨對改善階級落差釋出的誠意，而現有的成果與榮耀，則是保守黨的守護目標：

……保守黨被指責沒有政策綱領。如果政策意味著洗劫教會、掠奪地主，那麼我承認我們沒有政策。如果綱領是指威脅或困擾這個國家的各行各業、各色人等，那麼我承認我們沒有綱領。……先生們，保守黨的綱領就是維護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先生們，兩個世紀以來沒有發生過革命的一個國家，想必各位已經清楚明白這件事的意義。……這表示持續不間斷的穩定秩序是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利的唯一根源。……先生們，我堅信立法機關和社會必須團結起來支持這些重要成果，這再如何強調都不為過。¹⁷

迪斯雷利為了解決導致「兩個國家」的不列顛現狀問題而提出的政策方針，在後世被稱為「一國保守主義」，¹⁸旨在透過推行福利政策，促進社會各階級的團結及和諧，以期將「兩個國家」合而為一。在迪斯雷利的言論中，國家裡的每一個人都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偉大共同體的一員，應該彼此扶持、互相信任。他認為憲政體制和「不列顛帝國」(the British Empire)的榮耀與輝煌來自「先祖們」(forefathers)的智慧，為古老的君主制提供了限制彼此權力的協調規則，也是不列顛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爆發階級革命的主要原因。迪斯雷利嘲笑格拉斯頓領導的政府就像是南美海岸上「一整排枯竭的火山，了無生氣的（pallid）山峰沒有一絲火焰。但依然危險，偶爾會有地震，在海上不時發出沉沉的轟隆聲（dark rumbling）」。¹⁹這句諷刺的精妙之處，不只在於生動地譬喻格拉斯頓內閣缺乏活力，還在於將這個譬喻進一步發揮，指稱自由黨對保守黨的批評具有危險性，是無能火山發出的「陰險謠言」（dark rumblings）。

¹⁷ Benjamin Disraeli, speech on 3 April, 1872,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Speeches*, 556-557.

¹⁸ Michael Lind, *Up from Conservat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44-45.

¹⁹ Benjamin Disraeli, speech on 3 April, 1872,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Speeches*, 558.



二、自由黨與「哈登崇拜」

自由黨雖然被迪斯雷利形容得如此不堪，但其實自從皮爾派和輝格黨、激進派等支持自由貿易的派系在 1852 年底組織起聯合政府之後，直至 1894 年都是不容小覷的一股政治勢力。他們信奉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賽伊 (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李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和老彌爾 (James Mill, 1773-1836) 等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認為政府不干涉貿易市場，使其自行運作、自我調節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政策，能夠創造最大利益。於是從廢除《穀物法》打響第一槍之後，這一派的政治人物們開始陸續推出許多鼓勵商業的法案和政策。

(一) 格拉斯頓的崛起

1852 年底，格拉斯頓入閣成為財相，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提出年度預算案，這其中包括政府歲出的統計和各項稅率的調整。隔年 4 月，他協調了黨內的分歧意見，確定整體預算將朝向稅務減免的路線前進。²⁰這算得上是一件創舉，因為聯合政府的勢力龐雜，其中包括帕默斯頓在內的多名政治人物，都是以強悍、激進的政治主張著稱。從當時內閣的肖像畫構圖也可看出端倪（圖十一）。圖中人物的眼神並非聚焦在領袖身上，反而呈現出談判會場般的對立形勢。位於中間的首相亞伯丁伯爵將畫面一分為二，位於右側的帕默斯頓子爵（手指地圖者）與左側的格拉斯頓（手持文件者）對視，其他閣員則分立左右。比較其他內閣肖像構圖，如圖六的德比內閣和圖十二的格拉斯頓內閣，都可以明顯看出所有閣員的目光都集中在首相身上。格拉斯頓在這十數年中，為這個團體取得了難得的共識。

1853 年 4 月 18 日晚間六點，格拉斯頓在下議院報告年度預算案，他起立並向議長致意，稱如此重要的報告「為負責準備陳述的人帶來了焦慮」。他提到人們圍繞著預算案在討論稅收的基本原則，甚至關聯到「人類能在文明社會中團結的首要原則」。格拉斯頓援引小皮特在對法戰爭期間開徵所得稅的成效，「在生死交關的時期，能使國家的收入足以負擔戰爭和內政的支出」，但也因此「不太適合成為平時金融體系的常駐項目」。他試圖說服議會重新考慮所得稅的稽徵辦法和比率，於是將收入粗分為土地和貿易兩種，並指出「對不穩定收入（貿易所得）和已實現收

²⁰ Roy Jenkins, *Gladstone*, 150-151.



入（地租、房租）都課徵一樣的稅率並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斯頓在這裡讓激進派議員休姆（Joseph Hume, 1777-1855）的論點為其背書時，提到了「議員閣下始終如一，總是充滿男子氣概（manful），面臨困難也不會打算迴避。他本能的公平感和對詭計的蔑視，使他在嘗試改革所得稅時遇到了困難」。因為主流意見認為應該依照階級平均收入制訂稅率，而休姆則呼籲「針對每一個人的收入多寡來評估稅率才公平」。²¹格拉斯頓讚揚的是休姆自認合乎義理而勇往直前的態度。

這是格拉斯頓為自由主義政策大展拳腳的一場演說，也是本文緒論引述格雷維爾大加讚賞的那場報告。在這場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中，儘管只有一小段，但格拉斯頓確實提及男子氣概在政治場合的表現。而在演講脈絡中，男子氣概被用來指稱捍衛公平正義的道德勇氣，以及積極嘗試解決問題的責任心與公共精神。或許正應驗了格雷維爾的話，格拉斯頓在十多年後，因為帕默斯頓逝世、羅素年事已高，接下了自由黨領袖的位子並成為首相，將各黨各派統率在自由主義的大旗，以及其他個人的男子氣概之下。

（二）自由主義與男子氣概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認為自由黨正是在格拉斯頓成為首相之後，出現權力集中至黨魁一人的現象。他觀察到格拉斯頓擁有高超的煽動技巧，充滿道德內涵的政策，以及具有領袖魅力（charisma）的人格特質。這些優勢使他成為「選舉戰場上的獨裁者」，能夠推行挾帶群眾基礎的專制政治。而所謂的領袖魅力並沒有固定的內涵，而是透過追隨者的主觀評價以及客觀的選票數量來確立。²²換言之，自從《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將大量男性群眾引入政治環境之後，政治領袖的個人特質便與群眾的偏好產生更密切的連結。儘管通過法案的功勞被歸於保守黨，但格拉斯頓和自由黨才是法案通過後首場大選的贏家。

在緒論已經提過，比亞季尼用「哈登崇拜」形容格拉斯頓卸任首相後，其形象經營所創造的個人崇拜風潮。「哈登崇拜」以 1877 年格拉斯頓在哈登城堡拍下的

²¹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William E. Gladstone], speaking for the Budget, on 18 April, 1853,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25, col. 1350-1427.

²²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The Vocation Lectures*, ed.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Indianapolis, IA: Hackett, 2004), 65-66;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trans. Ephraim Fischoff et 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41-242, 266-268.



一張生活照為中心（圖十三），這張照片是以書房肖像（cabinet card）的格式沖洗而成。與肖像名片類似，書房肖像同樣具有大量複製和流通的性質，而較大的尺寸使其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家庭常見的壁掛裝飾物。迪斯雷利在 1878 年拍下的照片同樣也是這個規格。若將圖十和圖十三相互比較，可以發現格拉斯頓明顯硬朗許多，甚至於拿十年後的相片（圖十四）來比較，也絲毫不見衰老的跡象。透過照片我們除了可以知道格拉斯頓長期保持著伐木的運動習慣之外，也浮現出一個問題：這個形象是如何形成的？格拉斯頓與其支持者們如何將象徵自由主義的「斧頭」和男子氣概的健碩身體連結在一起？

這或許可以追溯到 1862 年。當時格拉斯頓擔任帕默斯頓內閣的財相，他到紐卡斯爾（Newcastle upon Tyne）發表一篇關於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的演講，當時紐卡斯爾正苦於沒有棉花這項美國提供的原物料。格拉斯頓的演講向民眾說明棉花短缺的原因不在政府決策而在於戰爭，但也因為將南方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稱為國家，而一度令帕默斯頓政府的中立態度難堪。然而重點並不在於演講的內容，而在於格拉斯頓的身體表現為聽眾和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獲得紐卡斯爾居民的盛情歡迎，被稱為群眾的英雄，因為他的演講展現了對大眾的理解與關懷，這又可以歸功於他深厚的古典學素養。²³

格拉斯頓受歡迎的原因，主要在於他將自由主義的理念和個人的男子氣概，透過有古典學底蘊的演說技巧呈現給觀眾。我們可以藉由莫雷子爵對格拉斯頓的描寫，了解現場觀眾的評價：

格拉斯頓先生的身體優勢使他配得上演說家的頭銜。他的聲音奇特、飽滿、深邃、富變化而有節奏。他獵鷹般的眼睛閃爍著奇異而專橫的光芒。他的手勢靈活、活潑而生動，他擁有傑出演員對手勢的熟稔，一舉一動都剛勁、徹底、自然、不做作、不誇張，沒有一絲煽情（melodrama）的影子。他的儀態輕鬆、警醒而端莊。²⁴

從莫雷的敘述可以得知，格拉斯頓的演說魅力綜合了極具吸引力的聲音、眼神、手勢、節奏和情緒，他的身體表演老練、老成而不老氣。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的演

²³ Walter R. Fisher, “Gladstone’s Speech at Newcastle-on-Tyne,” *Speech Monographs* 26, no. 4 (1959): 257-258.

²⁴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vol. 1, 191.

講姿勢也透過插畫家弗尼斯（Harry Furniss, 1854-1925）的人物漫畫而留下紀錄，儘管多少有些誇大，但依然有參考價值（圖十五、十六）。由於素描應是脫胎自弗尼斯的一手觀察記錄，若從議事桌和旁聽席的方向推測，肖像臉龐向左時，該人物應該是身為反對黨。對照莫雷的敘述和弗尼斯的素描，可以看出格拉斯頓的眼睛確實比迪斯雷利有精神。如此有力的身體表現，被認為具有強大的煽動力和影響力，美國媒體更盛讚他「擁有巨人般的力量，是維多利亞時代男子氣概（most Victorian of traits, manliness）的具體展現」。²⁵比亞季尼指出 1875 年格拉斯頓辭去自由黨黨魁一事，是他將心力投入群眾政治的關鍵時刻，這也使他逐漸成為與迪斯雷利政府敵對的「煽動政治家」（demagogue-statesman）。²⁶

（三）「格拉斯頓自由主義」（Gladstonian Liberalism）

1876 年 9 月，格拉斯頓出版《保加利亞面臨的威脅與東方問題》（*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公開抨擊土耳其在保加利亞鎮壓起事的血腥行動，以及迪斯雷利的親土立場。他在書中呼籲國內輿論應向土耳其施壓，並讚譽自由黨在這方面的傑出表現：

我相信關於發生在保加利亞的暴行，《每日新聞》（*Daily News*）在 6 月 23 日拉響了第一個警報。我意識到自由開放的新聞媒體不斷為全體人類、為自由、為正義貢獻良多。我不是要低估《泰晤士報》的表現，《泰晤士報》是這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新聞的老前輩，也不是要低估《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以及我國其他重要的宣傳工具。但據我所知，在這些公共事業中，《每日新聞》以國際通信為材料報導的這起事件，我會說是最有份量、最為精彩的一篇。²⁷

《每日新聞》是自由黨的黨報，而《每日電訊》則是保守黨的黨報。格拉斯頓用這段話將自由黨和「全體人類、自由、正義」劃在同一陣線，並隱約批評保守黨對人道危機的顛頽態度和消息封鎖。由於此事與迪斯雷利政府對外政策有密切的

²⁵ Stephen J. Peterson, *Gladstone's Influence in Americ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60.

²⁶ Eugenio F. Biagini, *Liberty, Retrenchment and Reform*, 385.

²⁷ William E. Gladston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 (London: John Murray, 1876), 21.



關係，格拉斯頓遂明確且持續地向政府表達反對態度，並組織自由黨員推動拯救基督教同胞保加利亞的行動。1877年5月7日，格拉斯頓在下議院發表一場名為「東方問題」（“The Eastern Question”）的演講，指責保守黨優柔寡斷的外交聲明：

……我很遺憾，過去兩三個月在我看來，政府聲明的語氣和基調似乎陷入這樣一種立場：對土耳其政府的暴行表示深感遺憾，並給予空洞的口頭勸告；但政府要採取何種行動取決於他們認為符合國家利益的選擇。也就是說，以對自己最有利為宗旨的這種想法，歸根究柢是我們衡量世界各地好事與壞事的標準。我想知道這種矛盾是否仍然存在，我們是否依然清楚不應容忍不公不義之事，不能繼續向一個深受暴行罪孽浸染的政府，提供物質或道德上的支持。²⁸

格拉斯頓接著引殖民地事務大臣卡納封伯爵（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4th Earl of Carnarvon, 1831-1890）反對政府帝國主義行徑的意見：「即使削弱了政府的力量，民眾的憤怒依然對國家有益」，並稱「當時內閣成員為政府辯護的任何一句話，都沒能比卡納封充滿男子氣概的發言更值得稱讚」。²⁹格拉斯頓以男子氣概讚許卡納封的言論，認為卡納封即使身為政府團隊的一員，依然為了公義之事直言不諱，這表示他擁有凌駕其他保守黨閣員的道德與勇氣。不僅如此，格拉斯頓也希望透過演講，提倡高於國家利益的普世道德，以博得下議院各位議員的支持。事實上，格拉斯頓給予卡納封的「男子氣概」評價，同樣也被其他國會議員用來指稱支持保加利亞，並宣揚人道、正義價值的同僚。³⁰

格拉斯頓這套論述的高峰是在 1879 年的「中洛錫安競選活動」（Midlothian campaign）發表的數篇演講，他著重攻擊迪斯雷利政府的外交政策，認為他們在世界各地濫用不列顛的國際影響力，旨在激起國內的愛國情緒，而罔顧道德與正義：

²⁸ William E. Gladstone, speech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on 7 May, 1877,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Gladstone's Speeches*, ed. Arthur Tilney Bassett (London: Methuen, 1916), 477-478.

²⁹ William E. Gladstone, speech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478: “There is not a single utterance which has proceeded from the mouth of any Member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hat served the purposes of the Government better at the time than this manly speech of Lord Carnarvon.”

³⁰ Adjourned Debate o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on 10 May 1877,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34, col. 637, 676.



……一連串的驚奇、一系列的戲劇花招（theatrical expedients），蓄意煽動、蓄意驚動、蓄意鼓動人們的驕傲和激情，蓄意分裂世界，這種態度已經成為現任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賴以維生的養料。……當花招用罄後，就像一位劇場經理在展示過所有庫存的劇目（theatrical pieces）之後就得重新開始，這樣我們才會再次受到刺激（我會說是驚動）。……政府的重大職責，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上，應該是安撫和穩定人民的心，而不是樹立虛榮的幻影來勾引民眾陷入災禍，更不是奉承人民的羸弱（infirmities），引導他們以為自己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好，從而助長征服宰制他人的邪惡想法。政府應該要遵循原則去承認各國的手足情誼和平等地位，保障彼此之間的平等權利；最重要的是，政府應該致力於在國內輿論製造一種冷靜和審慎的情緒並維持，使其無人能夠擾亂。³¹

他延續先前批判政府處理「東方問題」的論點，指控保守黨政府是在用一些不切實際的外交「成就」，激起國內民眾的愛國心和國家自豪，從而讓他們支持宰制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熱情。格拉斯頓在這裡將政績宣傳比喻成戲劇，批評現任政府不再堅守「保守黨」之名所承載的保守主義，不再尋求穩定的政治秩序，反而試圖以接連不斷的「花招」創造虛假的帝國榮光，使人民陶醉其中而忽略國內問題和國際道義。《樂趣週刊》生動地諷刺了格拉斯頓的批判。在 1878 年 12 月 4 日的〈精益求精〉（‘Excelsior’）中（圖十七），格拉斯頓被畫成牧羊女，迪斯雷利則扛著聯合王國旗。這張圖的設計對白如下：

「噢，留下來吧！」少女說道，「把你托利黨的頭（Thy Tory head）靠在這個胸前！」他那雙明亮的藍眼睛眨了眨（A wink），但他還是以喊叫聲（with the cry）回答：「阿富汗！」——改編自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³²

諷刺畫改編朗費羅的同名詩歌〈精益求精〉，原版的內容是「把你疲倦的頭（Thy weary head）」，「藍眼睛滿是淚水（A tear）」，「以嘆息聲回答（with a sigh）」，

³¹ William E. Gladstone, “The Midlothian Campaign: Opening Speech,” on 25 November, 1879, to the People of Midlothian, *Gladstone’s Speeches*, 561-562.

³² *Fun*, vol. 29, 4 December 1878, 227: “‘O, stay!’ the maiden said, ‘and rest Thy Tory head upon this breast!’ A wink stood in his bright blue eye, But still he answered with the cry, ‘Afghanistan!’”

說出來的話則是詩作標題「精益求精」，代表被少女挽留的人心心念念的事。³³在《樂趣週刊》中被揶揄成迪斯雷利十分掛心阿富汗。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斯頓被揶揄的方式是穿上了女裝，表現出一副嬌弱的模樣。

儘管被漫畫揶揄成柔弱的牧羊女，格拉斯頓的批評顯然依舊奏效。自由黨在1880年大選中獲得勝利，而當時自由黨的領袖主動讓位，格拉斯頓遂就任為首相，是他人生中四次首相任期的第二次。格拉斯頓信奉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包括低稅收、自由貿易和減少政府干預；而對外則主張和平主義和國際人道主義。格拉斯頓的影響力之大，讓他的政治理想在後世被稱為「格拉斯頓自由主義」，甚至在他過世後仍持續影響不列顛數十年。³⁴

三、諷刺漫畫的變形肖像

任何置於聚光燈下的形象都會有陰暗的一面，部分來自反對聲音的傾軋，另一部分來自時人對政治影響的挖苦。若身處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社會，除了能從肖像和報章雜誌等媒體中，見識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身體表演，還有一種便利、有趣、較不嚴肅但可能更受歡迎的管道：諷刺漫畫。諷刺漫畫常以週刊形式發行，形式類似《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敘述中加入有解釋功能的視覺材料（visuals），著名的有保守派的《潘趣週刊》和自由派的《樂趣週刊》。³⁵由於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分別成為各自政黨及其意識形態的代表人，故常成為諷刺漫畫的揶揄對象。他們兩人的臉孔以變形的方式出現在特定的大眾媒體上，用引人發噱但經得起推敲的圖像，濃縮了當時的政治新鮮事，有時更可以提供文字無法企及的表現力道。值得一提的是，《潘趣週刊》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約翰·譚尼爾（John Tenniel, 1820-1914）所繪，他也為文學名著《愛麗絲夢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865）提供插畫。他在1893年受封爵士。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名字縮寫 JT。

1868年2月底，首相德比因為痛風而退休，迪斯雷利被舉薦為新首相，《潘

³³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Excelsior* (Boston: Houghton, 1880), 13: “‘Oh stay,’ the maiden said, ‘and rest Thy weary head upon this breast!’ A tear stood in his bright blue eye, But still he answered, with a sigh, Excelsior!”

³⁴ Christopher Harvie, “Gladstonianism, the Provinces, and Popular Political Culture, 1860-1906,” 152-174.

³⁵ 儘管如此，跨越黨派立場諷刺時事的案例並不少見。



趣週刊》隨即在 3 月 7 日刊出一幅題為〈新校長〉（“The New Head Master”）的全版版畫（圖十八）。畫中迪斯雷利身穿學位袍（academic dress），準備從德比手中接過上面有著「權力」（Power）字樣的教鞭，德比伯爵則身穿伯爵樣式的加冕禮袍（Coronation robe）和伯爵冠冕（coronet of an earl），而不是在議會開幕大典（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等重要場合會穿著的議會禮袍（Parliament robe）。德比身後的貴族也是類似的打扮。這是只有在君主加冕典禮等重大場合才會穿上的服飾。此時的他是按照正常身體比例描繪，沒有像德比一樣被畫成矮小而略顯滑稽的樣子。

同年，《潘趣週刊》在 3 月 14 日刊登的〈明星對手〉（“Rival Stars”），則將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兩人的競爭關係搬上檯面（圖十九）。漫畫中的「迪斯雷利」妝扮成哈姆雷特，也就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悲劇作品《哈姆雷特》（Hamlet）的同名主角。他正對著一面全身鏡，練習劇中第三幕第一景的著名臺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還清了一下喉嚨。³⁶一旁「未能參演」（out of engagement）的「格拉斯頓」雙手環抱在胸前，譏諷道：「『領銜主演』（Leading business，指首相），當然得是他了！畢竟他（哈姆雷特）的臺詞『怎麼說都對得上』（His line is ‘general utility’）！劇場經理瘋了嗎？但無論如何，時機終將到來（a time will come [斜體為原文所加]）」。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臺詞那一句話，也可以解讀成「他（迪斯雷利）的說詞在任何情況都適用」，諷刺迪斯雷利只會說華而不實的空話來迎合他人。另外，「格拉斯頓」也透露他對「領銜主演」的企圖：「時機終將到來」一句以格拉斯頓的名字——「威廉」（William）的縮略形式“Will”表示諧義雙關，所以這句也能解讀成「總有一天威廉會爬到這個位置」。

這種創作內容同樣出現在格拉斯頓於 1868 年 12 月 3 日成為首相之後的《潘趣週刊》。在 12 月 12 日刊登的〈被逐出天界的伊刻西翁〉（“Ixion out of Heaven”）中（圖二十），標題化用了迪斯雷利於 1833 年出版的小說《遊歷天界的伊刻西翁》（Ixion in Heaven），並將他描繪成瘦弱而穿著「丘尼卡」（tunica）的羅馬人。迪

³⁶ 原劇情脈絡是主角哈姆雷特正在思考生命與死亡，而因為“to be”可以有非常豐富的演繹方式，因此經常被置於其他文本脈絡中。此處或可譯為「當首相或不當首相，這是一個問題值得考慮的問題」。而配合畫中人物的表現一起看，這一句更帶有些許做作的色彩，因為姿態神氣的「班迪齊」顯然並未在苦惱這個問題。



斯雷利被綁在一個有著「服從天意」(*norit*)字樣的車輪上，由自由黨的布萊特(打扮成大力神赫丘利〔Hercules〕)一腳踹下天界。³⁷旁邊站著扮成天后朱諾(Juno)的不列坦尼亞(Brittannia)以及扮成天神朱比特(Jupiter)的格拉斯頓，天神手上代表正義力量的雷電寫著「多數」(Majority)。³⁸在前一章已經提過，格拉斯頓和布萊特是自由黨兩位標誌性的男子氣概代表人物，在這張圖中化為兩尊健壯而剛猛的神祇。而格拉斯頓所穿的「阿波刺」(abolla)，則是羅馬軍團的高級將領服飾。「天界」指的是掌握權柄的諸神所在之處，也就是指國會殿堂。格拉斯頓挾「多數」以為至尊天神的正義之力，並要迪斯雷利「服從天意」，這不僅揭示了選舉的結果，還同時呼應了輝格黨在十八世紀初使用的政治短語「民之聲乃神之聲」(*Vox Populi, Vox Dei*)。

其實《潘趣週刊》中描繪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漫畫高達上百張，有時不只是讓他們身穿不同的服裝，而是直接將他們的臉畫在動物身上，如爭鬥的公雞、競馳的賽馬或各據一方的雄獅，藉此來表達兩人的競爭關係。但由於篇幅有限，本章僅著重於討論藉由刻劃出兩人陽剛特質來反映時事的漫畫。除了上述三幅之外，還有三幅漫畫中的陽剛特質值得一談。1876年的〈舊冠換新冠〉(“New Crowns for Old Ones!”)中(圖廿一)，迪斯雷利扮成《阿拉丁》(Aladdin)故事中不懷好意的巫師，要用手上寫著「印度」的新皇冠，和維多利亞女王交換她手上寫著「英格蘭」的舊王冠。依據故事情節，舊的那個應該更有價值，而巫師是個騙子，並不會向對方透露這個訊息。這張圖將迪斯雷利畫成一個不真誠的異國說客，除了諷刺他的猶太血統和在「東方問題」的立場之外，也在批評他為女王帶來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稱號一事，是為了謀取個人在英格蘭的利益。另外，巫師的身分也削弱了畫中角色的陽剛特質，巴結、欺騙、算計、虛偽，這些行為都不符合紳士風度或男子氣概對男性的要求。這也是我們再一次看到將迪斯雷利比喻成巫師的例子，而且明顯是貶義。

在1877年的〈「樵夫，放過那棵樹！」〉(“Woodman, Spare that Tree!”)中

³⁷ 伊刻西翁是希臘色薩利(Thessaly)的國王，在小說中謀殺了他的岳父並逃到別的國家，但被天神朱比特帶到天界接受調查，他蠻橫而不受歡迎，並且打起天后朱諾的主意。朱比特發現此事並決定將伊刻西翁打入地獄。

³⁸ 最右側扮成智慧神密涅瓦(Minerva)的矮小老人應是《潘趣週刊》的吉祥物「潘趣先生」(Mr. Punch)。



(圖廿二)，可以看到身材健壯的格拉斯頓正拿起斧頭要砍向「土耳其統治」(Turkish rule)這棵大樹。樹上吊著屍體，樹下埋著骸骨，樹中還有毒蛇盤踞。旁邊的迪斯雷利穿著加冕禮袍，開口唱：「樵夫啊，放過那棵樹！我愛它的每一根枝枒，亞洲的謎團，一直存續至今」。這幅漫畫明顯是在諷刺迪斯雷利對「東方問題」的一廂情願，同時也畫出格拉斯頓的「自由主義之斧」和直面問題的男子氣概。不過，在迪斯雷利過世後，《潘趣週刊》也開始運用性別氣質的符號來嘲諷格拉斯頓。1883年的〈保姆格拉斯頓〉(Nurse Gladstone)就將他畫成一個執著的老保姆(圖廿三)，懷中抱著形似棺木、名為「埃及」的襁褓，說道：「噢！親親小寶貝！奶奶永遠不會走，直到你可以自己好好走為止，永遠不會走！」這裡的「自己好好走」(run quite alone)也有政府機關「獨立運作」的意思，而末句的「永遠不會走」(Never!)除了意味著格拉斯頓所代表的不列顛勢力永遠不想撤離之外，也有期望埃及永遠不能自行運作的意思。這是在諷刺1882年格拉斯頓下令攻打埃及(Anglo-Egyptian War, 1882)，並在取得實際控制權之後，就不打算遵照當初以鎮壓起義('Urabi revolt, 1879-1882)出兵的名義，將統治權歸還鄂圖曼帝國的埃及赫迪夫(Khedive, 埃及總督的頭銜)。不肯放手和背信的行為，都不是男子氣概的表現，反而像個癡心又執著的老嫗。

《樂趣週刊》在1878年的〈前往柏林會議〉("Going to the Congress")中(圖廿四)，同樣也揶揄格拉斯頓的外交態度。與圖十七的手法類似，都是挪用原典中女性的柔弱印象，並套在格拉斯頓身上。這張畫化用了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 1st Baronet, 1829-1896)於1852年完成的油畫《一個聖巴索羅謬節的胡格諾派》(A Huguenot, on St. Bartholomew's Day)。原作的意象是左側的天主教女子，試圖為他的胡格諾派戀人繫上代表天主教徒的白色臂章，而右側的戀人一邊扯下臂章，一邊緊緊擁抱愛人。在〈前往柏林會議〉中，格拉斯頓成了那個天主教女子，臂章上則寫了「和平」(Peace)；迪斯雷利則成了那位新教徒戀人，緊緊擁抱著格拉斯頓。這幅畫不只諷刺格拉斯頓的柔弱，也諷刺迪斯雷利的赴會並不是為了和平，更有可能是為了追求他心中的理想，也就是一個強盛的不列顛帝國。

四、 小結

本章探討了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這兩位維多利亞時期重要政治人物之間的競



爭關係，通過分析他們的政治理念、領導風格和個人形象，揭示了保守黨與自由黨之間的深刻分歧，也勾勒出兩人陽剛特質與政治主張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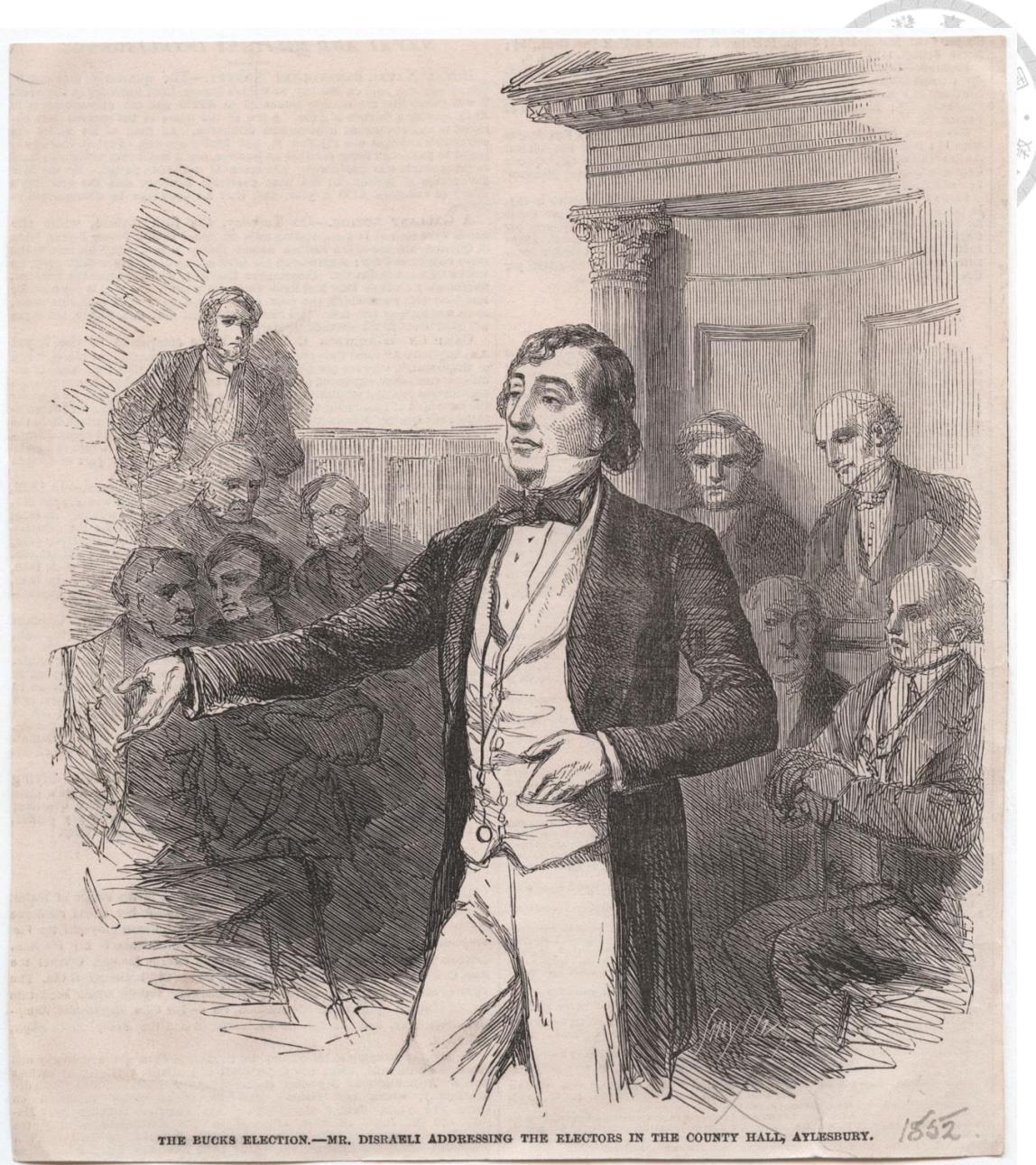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對立可追溯至 1830 年代，當時兩人都曾是托利黨的一員。格拉斯頓起初反對選舉改革，而迪斯雷利則以激進派的立場支持改革。隨著 1834 年托利黨領袖皮爾的《塔姆沃斯宣言》肯定了 1832 年改革法案的重要性，兩人在黨內的政治路線逐漸分道揚镳。最終，迪斯雷利留在了保守黨，而反對改革的格拉斯頓則成為自由黨的創黨元老之一。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對立在《穀物法》的廢除問題上尤為明顯。1845 年，皮爾因應愛爾蘭大饑荒而決定廢除《穀物法》，這一決定導致保守黨內部分裂。迪斯雷利堅決反對皮爾的自由貿易政策，並在國會演講中猛烈抨擊皮爾，逐漸崛起為保守黨的領袖之一。他主張貿易保護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紳士應有的政治責任和品德。這場鬥爭最終導致皮爾派成員出走，與輝格黨和激進派聯合組成自由黨。

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在政治領導風格上存在巨大差異。迪斯雷利以其演說才能和文學作品，批評不列顛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提倡「一國保守主義」，強調社會各階級的團結和和諧。相對地，格拉斯頓則以其道德勇氣和捍衛公平正義的男子氣概著稱。他抨擊保守黨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指責他們通過虛假的外交成就激起國內的愛國情緒，忽視國內民生問題和國際道義責任。

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之間的競爭在諷刺漫畫中也有所反映。1876 年的〈舊冠換新冠〉中，迪斯雷利被描繪成一個不真誠的巫師，試圖用印度的新皇冠換取維多利亞女王手中的舊王冠，諷刺他在東方問題上的立場和猶太血統。1877 年的〈樵夫，放過那棵樹！〉則描繪了格拉斯頓以「自由主義之斧」斬斷「土耳其統治」的毒樹，突顯其男子氣概和政治勇氣。相對地，諷刺漫畫也會藉由讓角色女性化來削弱其陽剛特質。在〈精益求精〉、〈保母格拉斯頓〉和〈前往柏林會議〉中，格拉斯頓都被穿上女裝，以表示他的政治訴求相當無力。

整體而言，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競爭，反映了保守黨與自由黨在 19 世紀不列顛政治中的深刻分歧。兩人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領導風格，通過他們的政治生涯和相互對立，揭示了維多利亞時期政治的複雜性和動態發展。這種競爭不僅塑造了他們個人的政治遺產，也對英國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圖五、財相迪斯雷利

弗烈德里克·史密斯（Frederick James Smyth）繪，木刻版畫，18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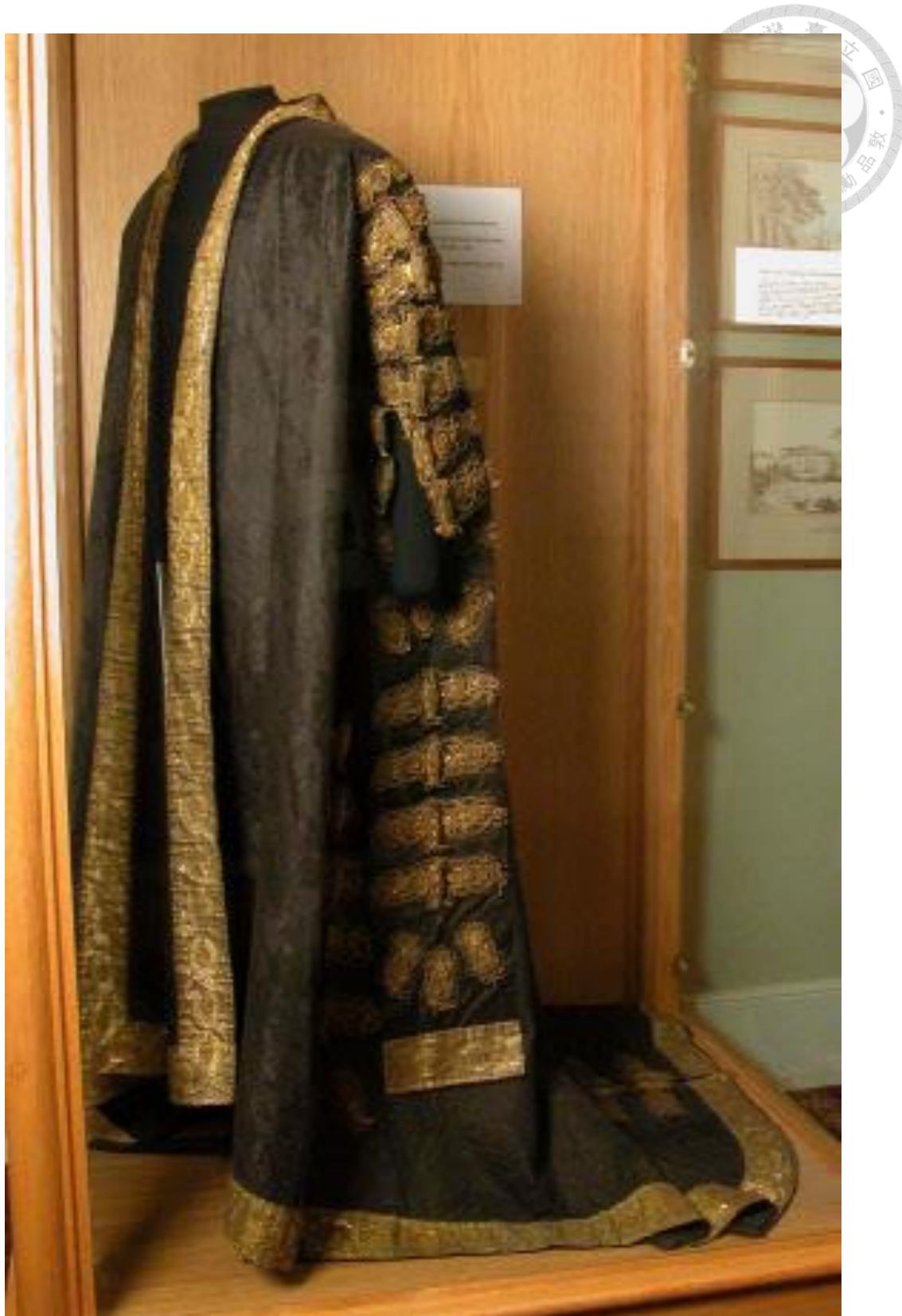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r Disraeli Addressing*.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4502.



圖六、1867 年德比內閣

亨利·蓋勒 (Henry Gales) 繪，水彩畫，1868 年。左五為迪斯雷利。

資料來源：*The Derby Cabinet of 1867*.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4893.



圖七、財相官袍

托馬斯·波吉斯（Thomas Boggis）攝，收藏於白金漢郡休根登莊園。

說明：黑色絲綢錦緞製成，飾有金色金屬線刺繡、鑲邊、花邊，帶有流蘇、亮片。

資料來源：*Robe of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National Trust, 429167.



圖八、財相格拉斯頓

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 & Sons）攝，蛋清印相肖像名片，1862年。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x29292.



圖九、首相迪斯雷利

約翰·梅奧爾（John Jabez Edwin Mayall）攝，蛋清印相肖像名片，1868年。

資料來源：*Benjamin Disraeli*.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x46496, Ax5061, x656, x137556.



圖十、首相比康士菲伯爵

康尼留斯·休斯 (Cornelius Jabez Hughes) 摄，碳素印相书房肖像，1878 年。

资料来源：*Earl of Beaconsfield*.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x665, x666, x668, x7740.



圖十一、聯合內閣

約翰·吉爾伯（Sir John Gilbert）繪，墨水畫，1855年。前排左二為格拉斯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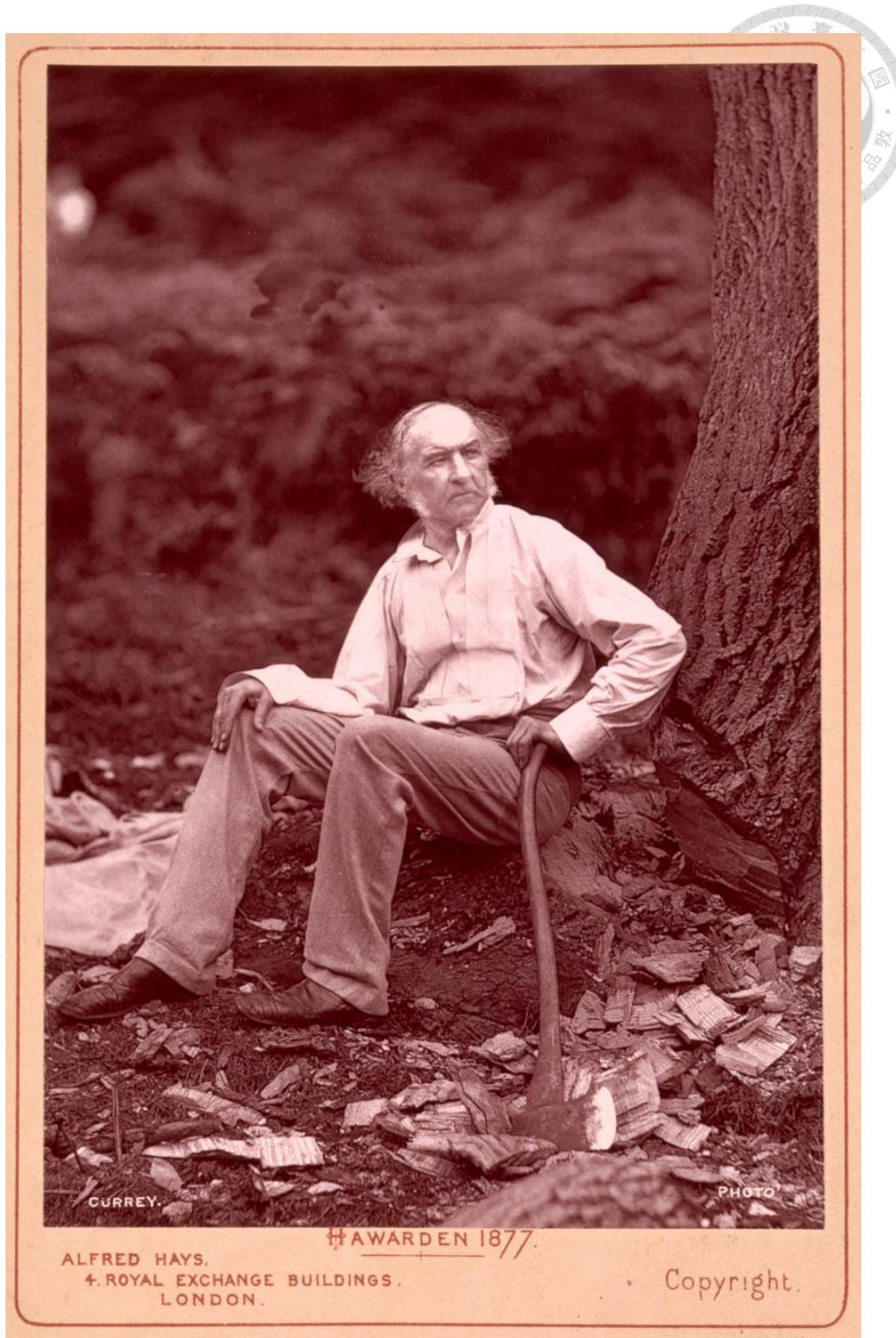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he Coalition Ministry, 1854*.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125.



圖十二、格拉斯頓內閣

勞斯·狄金森（Lowes Cato Dickinson）繪，油畫，1869年。背對者為格拉斯頓。

資料來源：*Gladstone's Cabinet of 1868*.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5116.



圖十三、格拉斯頓於哈登伐木，坐姿

威廉·柯瑞（William Currey）攝，碳素印相書房肖像，1877年。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x12503.



圖十四、格拉斯頓於哈登伐木，立姿

艾略特和弗萊（Elliott & Fry）攝，鹵化銀印相裝裱肖像，188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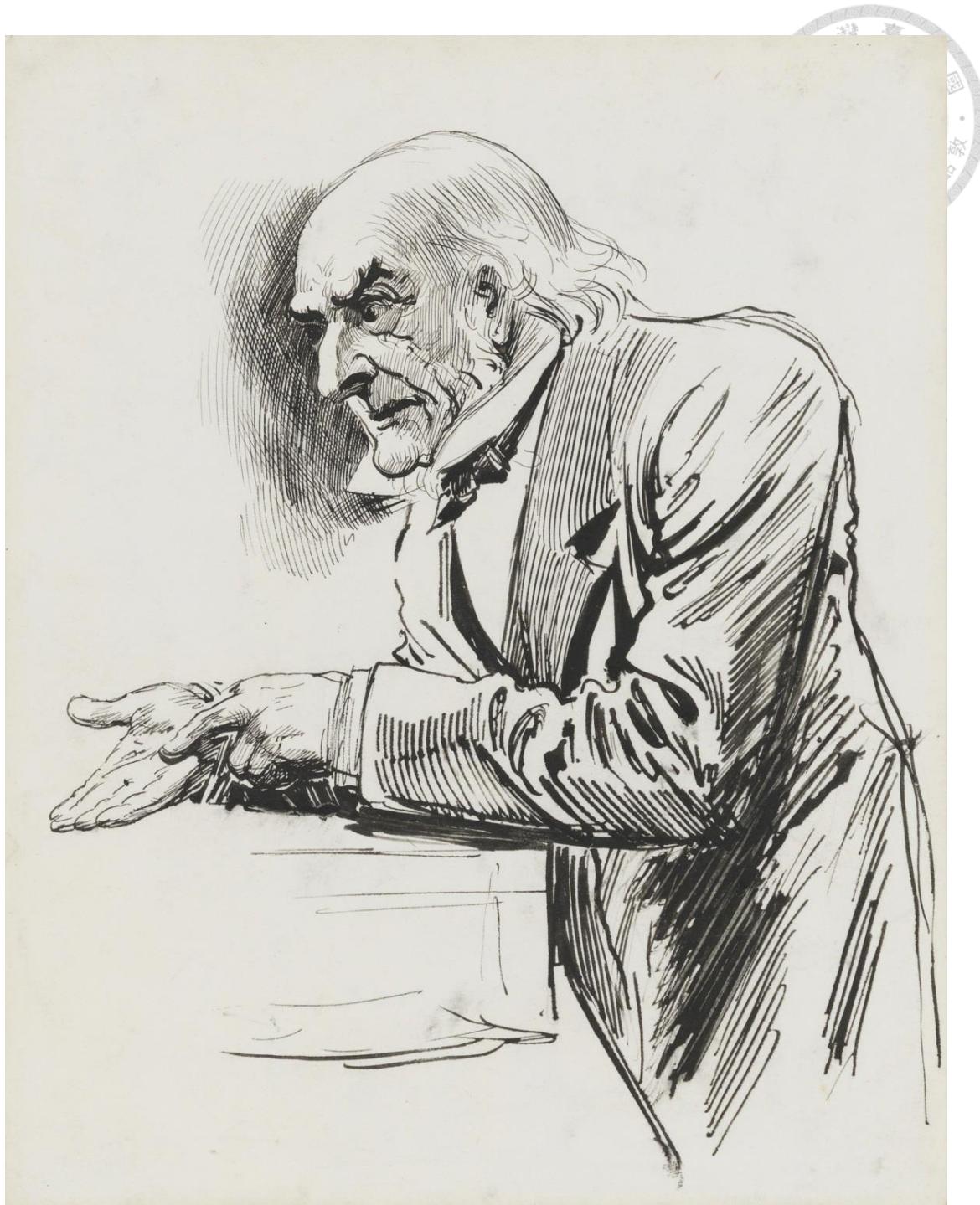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x127433.



圖十五、國會中的迪斯雷利

哈利·弗尼斯（Harry Furniss）繪，墨水素描，1880 年代。

資料來源：*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3339.



圖十六、國會中的格拉斯頓

哈利·弗尼斯繪，墨水素描，1880 年代。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3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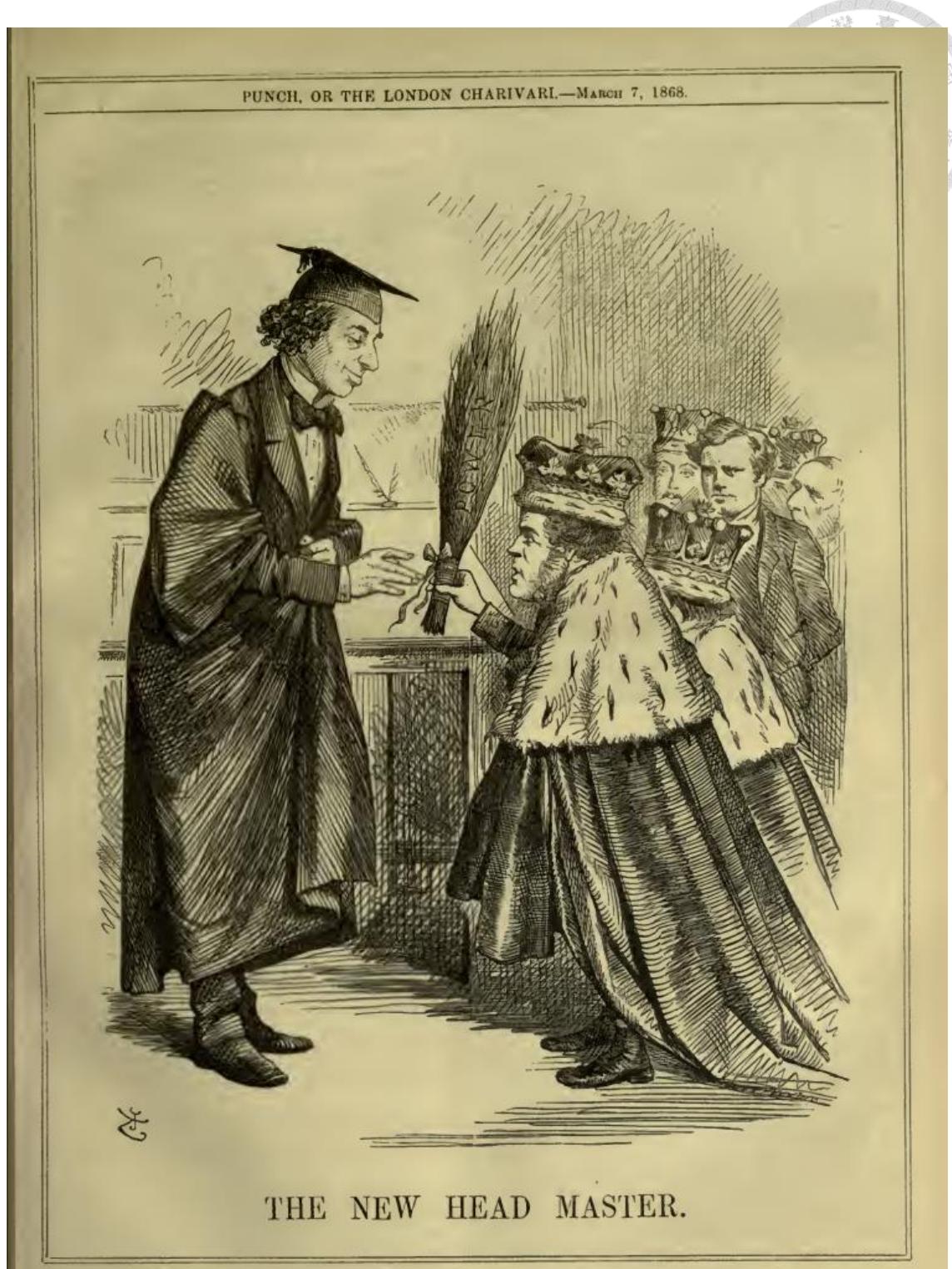


圖十七、精益求精

約翰·湯姆森（John G. Thomson）繪，版畫，刊於《樂趣週刊》29卷4頁，1878年12月4日。

資料來源：*Excelsior*. Hathi Digital Library Trust and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Victorian We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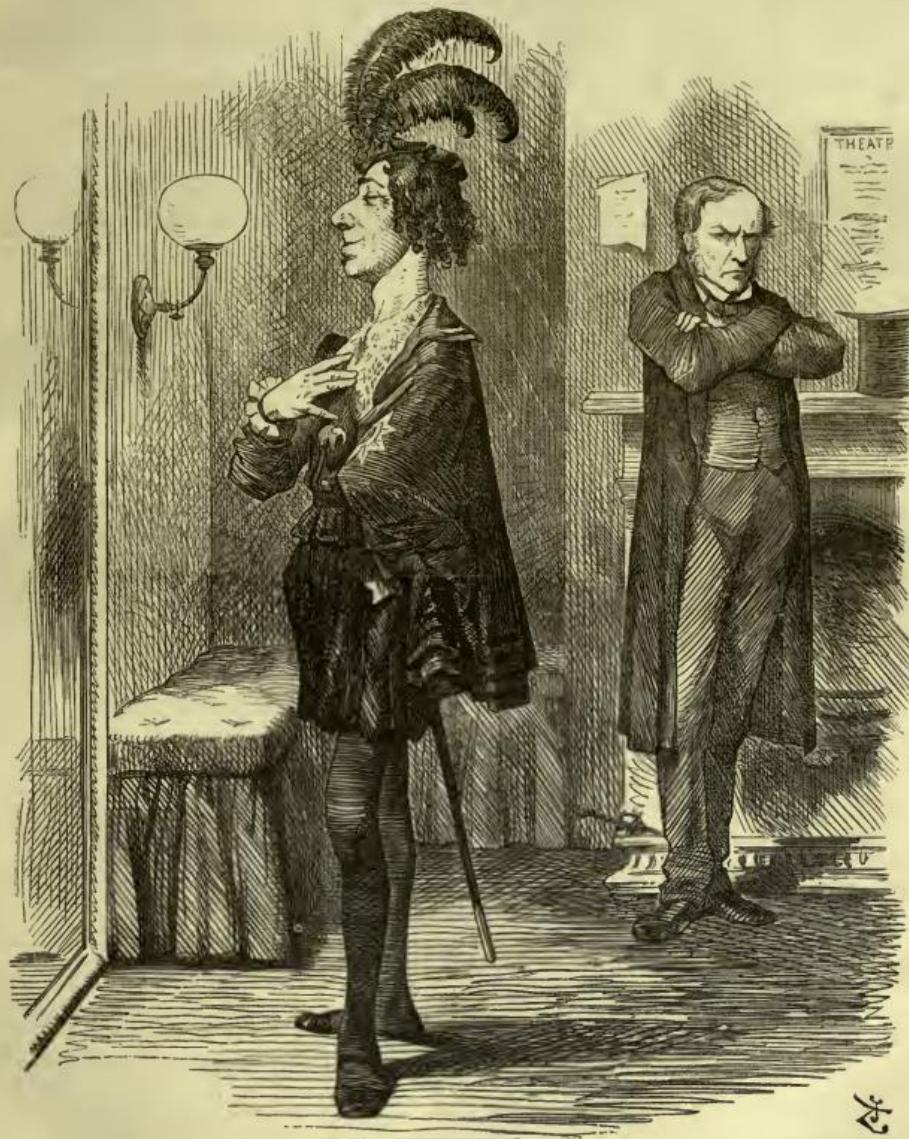
Fun, vol. 29, 4. <https://victorianweb.org/periodicals/fun/2pms/5.html>



圖十八、新校長

約翰·譚尼爾（John Tenniel）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4卷103頁，1868年3月7日。

資料來源：*The New Head Master*.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4,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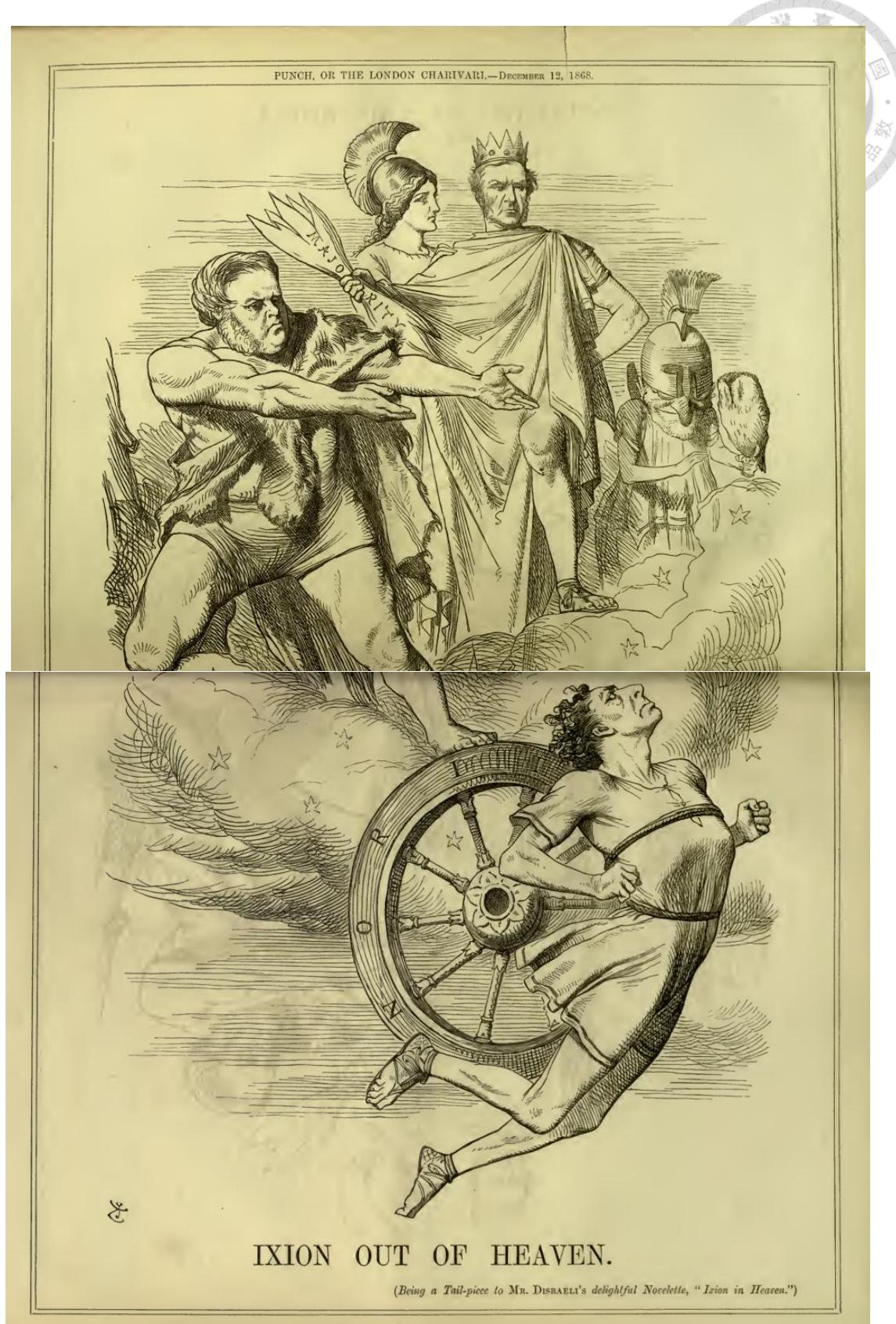
RIVAL STARS.

MR. BENDIZZY (HAMLET).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AHEM!"
MR. GLADSTONE (*out of an engagement*). [Aside.] "'LEADING BUSINESS,' FORSOOTH! HIS LINE IS 'GENERAL
UTILITY!' IS THE MANAGER MAD? BUT NO MATTER-RR—A TIME *WILL* COME—"

圖十九、明星對手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4卷115頁，1868年3月14日。

資料來源：*Rival Stars*.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4, 115.



圖二十、被逐出天界的伊刻西翁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4卷250、251頁，1868年12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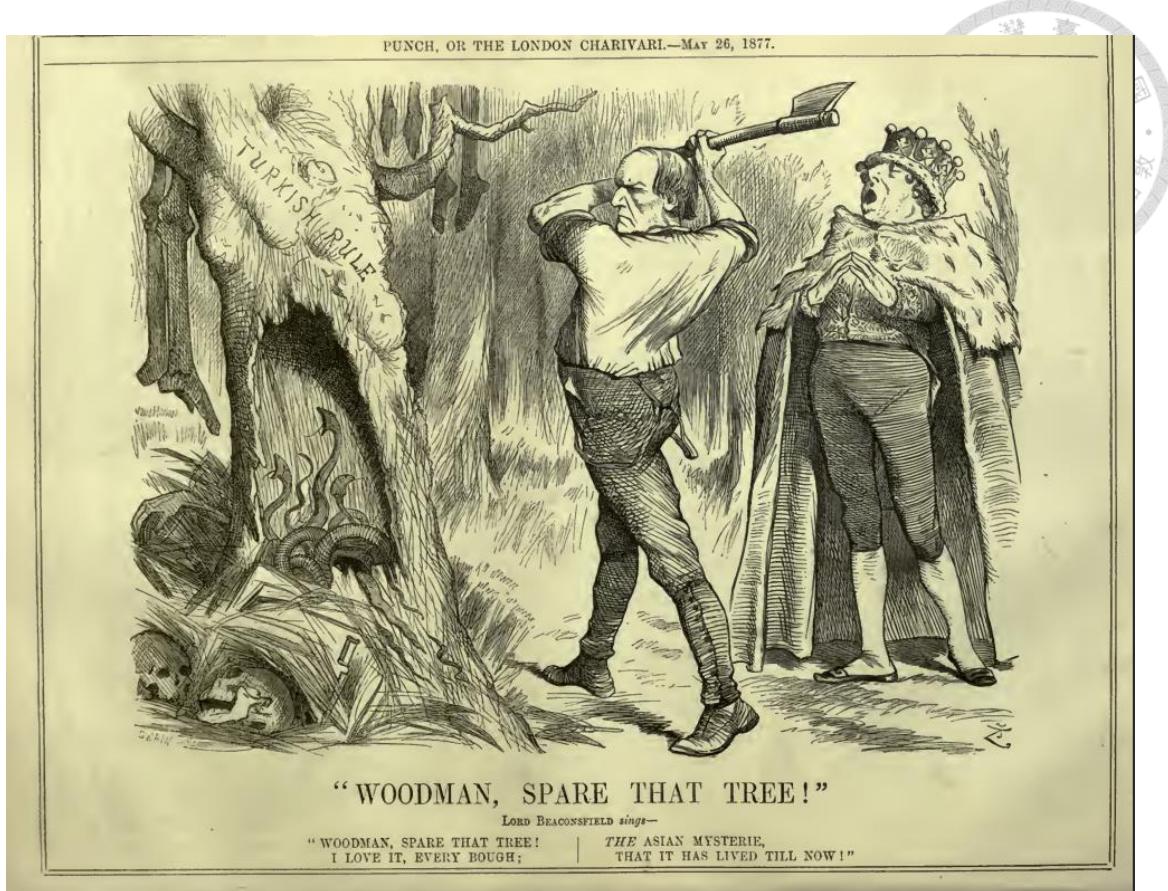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xion out of Heaven*.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4, 250-251.



圖廿一、「舊冠換新冠」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70卷147頁，1876年4月15日。

資料來源：*New Crowns for Old Ones!*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70, 147.



圖廿二、「樵夫，放過那棵樹！」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72卷235頁，1877年5月26日。

資料來源：*Woodman, Spare that Tre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72, 235.



NURSE GLADSTONE.

"OH, THE LITTLE DUCKY-WUCKY! NEVER WILL ITS NANA LEAVE IT TILL IT CAN RUN QUITE ALONE;—NEVER!!"

圖廿三、保姆格拉斯頓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85卷91頁，1883年8月25日。

資料來源：*Nurse Gladston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85, 91.



圖廿四、前往柏林會議

約翰·湯姆森繪，版畫，刊於《樂趣週刊》28卷5頁，1878年6月12日。

資料來源：*Going to the Congress*. Hathi Digital Library Trust and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Victorian Web, *Fun*, vol. 28, 5. <https://victorianweb.org/periodicals/fun/2pms/1.html>



第三章、男人注定鬥爭：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與改革

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競爭關係，經過漫畫的渲染和形象化（visualisation）之後，印象便會烙印在讀者心中。我們可以透過分析漫畫中的符號與脈絡，捕捉創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訊息。在上一章已舉出數張漫畫針砭時政的實例，然而，漫畫媒體在諷刺的同時，也發揮了摘要和濃縮時事的功能。它不必精確，目的只在於讓讀者明白兩個政黨各自在特定議題上的立場，也因為過度簡化而容易形成偏見。為此，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的身體，便成為政黨價值的具體呈現，如同不列塔尼亞代表聯合王國的精神一樣。

兩人之所以能夠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代表各自的政黨，除了本身都曾因擔任財相而活躍於媒體版面上，已經有足夠的知名度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 1868 年相繼成為首相之後，都展現出優異的領導才能，並完全掌握了黨組織的權力，使領袖的個人形象、政府的決策方向與政黨的意識形態三者結合為一體。迪斯雷利在《科寧斯比》中提到「少時注定犯錯，壯時注定鬥爭，老時注定抱憾」，¹本文以「壯〔年〕」（manhood）一詞也有「男子漢」的字義，用「男人注定鬥爭」來形容陽剛特質與政治競爭的關係。為了成為首相，迪斯雷利勢必要與格拉斯頓一較高下。陽剛特質在兩人競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並結合政黨價值和政策原則，為兩人博取支持和認同。陽剛特質的政治應用，以影響甚鉅的選舉改革最為明顯。以下將分三節論述政策原則、政黨競爭和政治弱勢中的男性身體以及陽剛特質，對維多利亞時代政治的意義與影響。

一、改革成為競爭的手段

1865 年，對選舉改革持保守態度的首相帕默斯頓於任內逝世，由支持改革的羅素繼任。長期與帕默斯頓意見相左的格拉斯頓，與羅素聯手在 1866 年 3 月推出擴大選舉權的議案，試圖降低選民的財產門檻。雖然在野的保守黨並不反對改革，但他們也不同意格拉斯頓擬定的草案，認為其中內容過於理想而激進。自由黨內的意見也不一致，以羅伯特·洛（Robert Lowe, 1811-1892）為首的亞杜蘭派（Adullamites）

¹ Benjamin Disraeli, *Coningsby*, 110: “for life in general there is but one decree. Youth is a blunder; Manhood a struggle; Old Age a regret.”



不希望工人取得選舉權。²這兩股勢力聯手反對提案，最終迫使羅素政府在同年⁶6月下臺。內閣總辭前夕，外交大臣克拉倫登伯爵（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 1800-1870）在寫給首相羅素的信中，指稱格拉斯頓是造成改革無法順利通過的主因，因為：

除了格拉斯頓之外，無論你〔羅素〕或你的任何同僚都不願意讓下議院難堪。〔你們〕準備在真心渴求妥協與和解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合理讓步；但他〔格拉斯頓〕想要戰勝絕不可能低頭的議員們，因此他打算在決議中加入一些超出了謀取改革真正利益所需要的內容（我毫不猶豫地說，已到了會影響我們榮譽的程度），他也知道和他同等地位的人不會接受這樣的內容。³

克拉倫登認為格拉斯頓不願意妥協於反對意見以換取多數支持，是將個人勝負欲置於群體榮譽之上的自私行為。在另一封信中，克拉倫登更指出格拉斯頓「傲慢的壞脾氣」（arrogant ill temper）分裂了自由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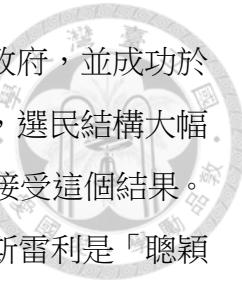
……這〔黨內分裂〕無法促進合理的改革事業，而當人們了解實情時，還會毀了格拉斯頓的政治生涯，如果他傲慢的壞脾氣沒有趕走領導人所仰賴的支持者，以他的歷練和才幹，其實足以勝任引領這個國家命運的角色。直至今日，我還是無法理解他在下議院給自己樹立的〔負面〕觀感。⁴

依照克拉倫登的說法，一位理想的政黨及國家領導者除了要具備經驗與能力，還必須能夠得到同儕支持；而格拉斯頓的問題在於他過度的進取心以及無法有效控制的情緒，已經危害到團體的和諧與利益。對於克拉倫登而言，無法自我控制的人並不適合從政，因為與他人齟齬不僅會阻礙原可順利推行的計畫，更可能對己方陣營造成傷害。在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男子氣概中的自我控制，對於政治領袖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屬性。

² Maurice Cowling, 1867: *Disraeli, Gladstone and Revolution*, 8-9, 104-105. 「亞杜蘭」典出《聖經·舊約·撒母耳記上》(1 Samuel 22:1) 和《聖經·舊約·彌迦書》(Micah 1:15)，是一處洞穴，大衛(David)在遭到掃羅王(Saul)追殺時，曾一度和許多苦難的人躲到這裡。而在《彌迦書》中，則稱來到亞杜蘭的人是「以色列的榮耀」，可參考《欽定版聖經》(KJV)原文：“...he shall come unto Adullam the glory of Israel.” 亞杜蘭派以此自許為正義之士。

³ Lord Clarendon to Lord Russell, 23 June 1866,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fourth Earl of Clarendon*, ed. Harbert Maxwell, vol. 2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3), 315-316.

⁴ Lord Clarendon to Lord Russell, 25 June 1866, 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ol. 2, 317.



1866 年羅素下臺後，保守黨的德比與迪斯雷利接手組織少數政府，並成功於隔年推出《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大量工人階級男性成為選民，選民結構大幅改變。儘管法案經過格拉斯頓大量修改，但自由黨支持者並不欣然接受這個結果。支持自由黨的藍道爾（Magnus C. Rendall）在一本小冊子中，稱迪斯雷利是「聰穎的流氓」（brilliant knave）和「出色的庸醫」（consummate charlatan），因為法案最終版本的改革力道比格拉斯頓的草案還要激進。⁵藍道爾還認為，迪斯雷利「搶走」理應屬於格拉斯頓的功勞，他宣稱迪斯雷利這位「政壇明星」雖然能夠藉著優異的口才與禮貌博得支持與關注，但因為缺乏追求真理和正義的美德，所以會在不久之後被具有那些美德的格拉斯頓取而代之。⁶

從藍道爾的修辭可以看出，注重禮貌的紳士風度，在這類支持自由黨的維多利亞人眼中很可能略顯過時，他們更青睞男子氣概。在藍道爾的價值排序中，格拉斯頓的男子氣概優先於迪斯雷利的紳士風度，被給予更高的期待。政治評論使用陽剛特質來當作標準，檢視並評價個人表現，而在選舉改革的時代，更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適合參與政治決策的方式，也就是選民的政治審美。⁷

《潘趣週刊》在引領政治審美方面花費了許多心力，透過描繪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身體，尤其是面部表情，可以讓讀者快速捕捉該人物在特定議題中的面貌。在 1866 年 5 月刊出的〈酌劑：改革：競爭：〉（“Tinct[ure]: Reform: Comp[etition]:”）中（圖廿五），打扮成藥劑師的「格拉斯頓」手上拿著一杯寫著「改革」（reform）的深色藥水，原型可能是止痛藥鴉片酊（opium tincture），遞給明顯指涉迪斯雷利的「D 先生」（Mr. D.）。格拉斯頓的另一隻手則放在兩個藥瓶上，上面的標籤分別寫著「擴大選舉權門檻」（extens[ion] of franchi[se]）和「重新分配議會席次」（redistri[bution] of seats），提示了改革的主要內容。「D 先生」雙眼瞪大，非常不甘願地接過藥水，格拉斯頓的設計對白則說道：「你最好立即服用，你看得越久

⁵ 格拉斯頓打算將城市選民的財產門檻從持有年租 10 銀鎊房產降至 7 銀鎊，鄉村選民則從承租年租 50 銀鎊財產降至 14 銀鎊。而根據《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城市選民的門檻是繳納濟貧稅（poor rate）並擁有住宅（包括自有及租用），或是年付 10 銀鎊租金的寄居者；鄉村選民則需承租年租 12 銀鎊財產，或持有年值 5 銀鎊的財產。參考 Chris Cook,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60-62.

⁶ Magnus C. Rendall, *Gladstone and Disraeli and the Whig and Tory Parties*, in *Lives of Victorian Political Figures, Part 1: Palmerston, Disraeli and Gladstone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vol. 2, Benjamin Disraeli, ed. Richard A. Ga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0-221.

⁷ Stefa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100-113.



就會越不喜歡它」。考慮到當時羅素政府因為力推改革議案而飽受抨擊，漫畫表達的內容便饒富涵義：改革被形容成藥劑師格拉斯頓為病人迪斯雷利開的止痛處方，而迪斯雷利的反對則被刻劃成一種情緒表現，類似於病人對酊劑特殊氣味和苦味的排斥。這幅畫將改革轉化成醫病關係中治療主導權的競爭：勸人服藥的格拉斯頓相信「改革」能夠解決問題，迪斯雷利也同意，但需要先克服自己的不願意。

藥劑師的專業、冷靜和堅定形象也表達了男子氣概，而且與藍道爾在迪斯雷利實現改革之後給予的評價——「高超的庸醫」巧妙地形成對比。但在其他幅漫畫中，格拉斯頓推動改革的形象更明顯地表現出了男子氣概。在 1866 年 6 月 23 日刊出的〈掃清路障〉（“Clearing the Barricade”）中，格拉斯頓成了手執改革大旗的自由領袖（圖廿六）。這張圖的結構來自德拉克羅瓦（F. V.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為法國七月革命（July Revolution, 1830）繪製的《自由領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格拉斯頓站在成堆的障礙物上，即《自由領導人民》中自由女神的位置。刊出的同一天也是羅素政府即將解散的日子，克拉倫登在這天寫信向羅素抱怨格拉斯頓的「不願妥協」。格拉斯頓不願妥協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腳邊的三個矮人，其中兩個有露臉的人是保守黨的德比伯爵和諾斯科特（Stafford Henry Northcote, later 1st Earl of Iddesleigh, 1818-1887），沒有露臉而背上扛著「維維安」字樣袋子的人可能是迪斯雷利，袋子上指的是他作品中的主角名字。還有一段題為〈長眠陰寒囚牢而不發一語〉的短文與漫畫相互搭配。短文諷刺「國會」（Parliament）的字源是「說」（*Parler*）和「謊」（*Mentir*），並一一點名阻擋各項改革的保守黨議員，其中迪斯雷利被形容成「擺弄高加索人的玄虛」；短文在最後承諾會繼續相信並督促格拉斯頓實現改革議案，並稱羅素政府的失敗是場意外，只是「蠢人的福音」（the gospel of fools）。⁸

從以上各例不難看出《潘趣週刊》支持格拉斯頓的立場。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頓代表自由黨的功能，似乎並不能同樣套用在其他自由黨員身上，儘管他們同樣也支持改革。在 1866 年 9 月刊出的〈伯明罕的弗蘭肯斯坦〉（“The Brummagem Frankenstein”）中，伯明罕選區的自由黨籍議員布萊特便被畫成擔心受怕的樣子（圖廿七）。這裡使用的典故是瑪麗·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7-1851）

⁸ *Punch*, vol. 50, 23 June 1866, 262. 短文標題典出莎士比亞戲劇《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 第三幕第一景關於死亡的討論。

在 1818 年創作的小說《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根據小說劇情，瘋狂科學家弗蘭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親手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怪物，但也因為懼怕怪物的力量，而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布萊特在畫中成為了弗蘭肯斯坦，用顫抖的聲音說：「我才不怕男性普選（manhood-suffrage）！」他身後抽著菸的巨大男性，是典型的男性工人形象，應該就是具體化的「男性普選」。儘管布萊特是工人普選的主要提倡者，依舊被揶揄他會擔心一旦推動了普選，喚醒了擁有巨大政治力量的工人群眾，就會動搖到他在工業大城伯明罕的國會議員寶座。

撇除創作者的偏好之外，個人形象和領袖地位也可能是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格拉斯頓是自由黨在下議院的領袖，也曾在擔任財相並推動改革時，展現出冷靜、堅毅的決心；甚至在同黨人眼中，他的信念似乎過於固執，以至於對群體利益造成了威脅。由此可知，在這套以諷刺為主的評價系統中，漫畫透過角色扮演和對原典的戲仿，將個人特色明顯地誇大。而透過漫畫對領袖身體的描繪與呈現，讀者也可以了解政治領袖的原則，以及與其個人乃至黨派切身相關的利益關係。這當然是經過媒體折射之後的印象，不一定是本人的立場，但也是確實進入群眾視野和輿論中的形象。在「政治」這場表演中，只有少部分的人是評論家，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觀眾，他們不必也不會知道所有關於舞臺上演員的細節，而只會基於他們所看見的表演內容，去選擇關注、支持、評價他們在意的角色。

二、 改革成為競爭的目標

格拉斯頓在 1866 年已經在自由黨中具有不可取代的象徵地位。而迪斯雷利此時也已躍居保守黨要角，他常和德比伯爵成對出現在漫畫中，一搭一唱。在 1866 年 7 月 7 日刊出的〈首要問題〉（“The First Question”）中，便可看到剛組建第三次少數內閣的兩人，被描繪成對勞工問題頗為冷漠的態度（圖廿八）。圖中的「勞工」向兩人提問：「您會為我做些什麼？（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me? [斜體為原文所加]）」而兩人似乎將這句話聽成「您待會要對我做什麼？」所以德比的反應有些錯愕，他的回答是：「啊！假如你是匹賽馬的話」，表示德比的心思正放在賽馬上；迪斯雷利則接著說：「或是一個亞洲謎題的話」。這張圖表現出兩人只關心各自的個人興趣，並不在乎勞工的權益。另外，漫畫再一次強化了迪斯雷利與



東方異國神秘玄虛之間的連結。

儘管總體而言《潘趣週刊》的立場偏向保守黨，但依然相當明顯地表現出對保守黨政府的嘲諷，創作者並不相信新政府有意真誠地推動改革。在同年 12 月 1 日刊出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中，「劇場經理」德比向「道具師」（property-man）迪斯雷利詢問他們能拿什麼道具出演，而迪斯雷利拿起一根寫著「1859 年改革議案」的旗幟，說「稍加修飾就能跟全新的一樣」（圖廿九）。地上還有一面已經裂開的盾牌，寫著「保護政策」。這暗示保守黨在當時已經打算放棄原本的保護政策，改為利用改革議案「登臺演出」。這幅漫畫再一次呼應了在緒論提過的比喻：「政治是表演」，政黨是戲班，議員是班底，首相是時常兼任主演的經理，而財相也就成了道具師。這幅漫畫的標題則在嘲諷保守黨的思想基礎是投機和節省擬定新政策的精力。

儘管如此，迪斯雷利依然打算演好這齣戲，並相信這會為保守黨帶來豐厚的報酬。1867 年 2 月 11 日，迪斯雷利在下議院宣告「議會改革不應再成為攸關政府命運的問題」，正式開啟了有關《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的辯論。他聲稱從 1832 年起，數十年來不列顛社會條件和公民道德的巨大進步，使「勞動變得高貴」，因此勞動階級正在群起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迪斯雷利接著細數歷次改革議案的失敗，並指控自由黨的羅素伯爵讓這件事變成一個政黨問題。他巧妙地將自由黨塑造成阻礙改革的元兇，並稱保守黨會「擔負起責任」推動改革。在「擴大選舉權」的問題上，迪斯雷利從憲政體制開始談起，「只有在下議院裡，人們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和財產」；而由於均勢原則和為了維持下議院組成的階級多樣性，「選舉權必須被視為是一種普及的特權（popular privilege），而非一種大眾的權利（democratic right）」。由於基本上和自由黨的版本沒有太多出入，因此布萊特出聲表示不屑。迪斯雷利則回應道：「幫助實現我們認為有利於公共權益的事情，比提出明知黨意不會放行的可笑議案更受歡迎」。換言之，迪斯雷利一方面在保守黨的框架中勾勒出支持改革的理由，另一方面則試圖將其昇華成超越黨派成見的正義之舉。⁹

格拉斯頓在聽完迪斯雷利的演講後，回應了他在開頭時提出的宣告，認為這是

⁹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Benjamin Disraeli], speaking for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n 11 February, 1867,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5, col. 215, 219, 229-231, 241-242.



事先為德比內閣打的預防針，目的是避免他們重蹈自由黨的覆轍，也就是因推動改革議案失敗而面臨解散的下場。格拉斯頓認為迪斯雷利將改革議案的責任從政府轉嫁到了議會身上，並表示雖然他不同意迪斯雷利的做法，但仍願意支持著手處理議會改革的問題，「直到這個問題從爭論清單中剔除為止，我們才有望看到不列顛的人民團結為一體，他們過去是如此，而且我們會希望他們之後依然是如此」。¹⁰

格拉斯頓似乎同意了迪斯雷利的理由，也不願再一次因為顧慮到政黨利益而拖延本應完成的重大議案。而對於民眾來說，更具話題性的或許不是保守黨決定推動改革，而是迪斯雷利的那句宣言，表明了保守黨不會因為貪戀權位而阻止議會改革。《潘趣週刊》在 1867 年 2 月 23 日刊出的〈「正面我贏，反面你輸」〉（“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中，便嘲諷迪斯雷利是在和格拉斯頓玩一場絕不會輸的賭注（圖三十）。圖中保守黨和自由黨的領袖們分立兩側，迪斯雷利一手蓋著另一隻手的手背，即是拋擲硬幣賭正反面時會有的動作。漫畫中的對白節錄了迪斯雷利 11 日在下議院發表的那段宣言，並模仿《國會議事錄》紀錄議場聲音的格式，加上「這個笑話令全場大笑」的標示。顯然《潘趣週刊》並沒有像格拉斯頓一樣認真看待迪斯雷利的宣言，而認為這是他一貫擅長的伎倆，也就是利用言辭讓自己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在兩週後的討論中，迪斯雷利主張《1832 年改革法案》事實上取消了工人階級「本就擁有」的政治權利，而現在（1867 年）所討論的議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恢復」這項權利。迪斯雷利舉出賦予選舉權的三大標準：財力、智力、勞動力（capital, intelligence, and labour），並依據這個標準新增了四種獲得選舉權的條件：擁有大學文憑或學術聲望，長期持有 30 倫敦鎊的存款或 50 倫敦鎊的國債，以及每年繳納的直接稅超過 20 先令。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年收入大約就是 50 英鎊。格拉斯頓則回應：「在沒有更加明確規則的情況下，我們很樂意將傑出的工人階級（superior por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納入範圍」。¹¹他們在討論的選舉權標準，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其實也是判定一個男性能在社會上獨立負責的客觀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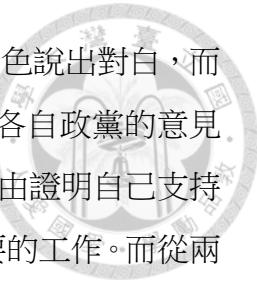
¹⁰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speaking for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n 11 February, 1867,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5, col. 244-248.

¹¹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Benjamin Disraeli], speaking for the Parliamentary Reform: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n 25 February, 1867,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5, col. 939-940; William Ewart Gladstone's address on it, col. 984.



在 1867 年的不列顛，無論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大都不認為男性普選是可行的方案，因為這相當於摧毀不列顛長久以來「賴以穩定」的階級社會。前面討論過的〈伯明罕的弗蘭肯斯坦〉便將其刻劃成一種恐懼。格拉斯頓是屬於議會同儕中較為激進的少數，他相信比起財產，個人的內在涵養才是獨立負責的基礎。1866 年 12 月 15 日刊出的〈男性普選權〉（Manhood Suffrage）即是在調侃格拉斯頓的這種想法（圖卅一），畫中人物指著右側一個抽菸、酗酒（Cream of the Valley 指琴酒〔gin〕，是英格蘭最流行的一種烈酒），可能還讓身旁女性哭泣的頹廢男子，向格拉斯頓問道：「這就是你希望與之有所牽連的那種男人（the sort of manhood）嗎？」本研究在緒論已經討論過，Manhood 一詞也有成年男性和男子氣概的意思，不僅是界定男人與男孩的標準，也是在成年男性之間區分高低位階的尺度。這幅漫畫表現出了不願讓「那種男人」衝擊男子氣概規範和價值的抵禦心態。格拉斯頓應該清楚他無法在 1867 年的議案中一步到位，去強行推動男性普選權，所以才在演說中強調納入範圍的是「傑出的」工人階級。當時流行的詞彙是已在第一章討論過的「體面可敬的」工人階級，用來表示有資格享有選舉權的群體，應該是工人階級中的技術菁英，而非所有工人階級。

雖然迪斯雷利提出了改革議案，但格拉斯頓才是決定議案是否能順利通過的關鍵人物，如果他不同意議案內容，保守黨就沒辦法取得足夠的同意票。1867 年 3 月 2 日的〈軌道的阻礙〉（“A Block on the Line”）將「改革」描繪成火車頭（圖卅二），而這條鐵路（改革進程）似乎遇到了一些障礙。英格蘭的化身「約翰·布爾」（John Bull）在這幅漫畫中扮演一位督工，要求工人們將軌道清理乾淨，以便讓這條「沒有終點的火車」開下去。就在羅素和布萊特爭取這份工作的時候，迪斯雷利手持「決議」向格拉斯頓說道：「如果您願意伸出援手，我們那幫人會搞定它」。這證明了在公眾的解讀中，格拉斯頓是否點頭會決定改革成敗。而對格拉斯頓來說，棘手的事並不是放下政黨競爭，而是即使自己願意和迪斯雷利合作，也要讓通過的內容符合自由黨的價值觀。在 1867 年 3 月 9 日刊出的〈開庭之前〉（“Before the Trial”）中，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被畫成兩造律師（圖卅三），迪斯雷利手上拿著「改革議案」，地上則有一疊「決議」。一旁手拿不明文件的格拉斯頓說道：「其實我們可以在五分鐘內解決它〔指改革議案〕」，而迪斯雷利則附和：「沒錯，只要『雙方當事人』（parties）都能講道理的話」。若是抽離法庭情境，「雙方當事



人」應該被翻譯成「雙方政黨」，表示這幅漫畫是為了引出兩個角色說出對白，而利用詞義雙關將兩人畫成律師。儘管格拉斯頓和迪斯雷利已經是各自政黨的意見領袖，雙方黨員也相當於聽從領袖指揮的投票機器，但選民需要理由證明自己支持的政黨沒有背叛他們的利益，所以說服選民成為了推動議案最重要的工作。而從兩位「律師」的話來推敲，說服的難處不在於說理，而在於讓選民們的情緒和利益跟隨兩位領導人的安排。也就是說，領袖不只需要具備闡釋義理和協調各方利益的能力，還需要讓選民願意跟隨。而在選舉改革這個議題上，因為需要分配與界定選舉權的緣故，還牽涉到了政黨領袖、國會議員乃至選民的陽剛特質。

三、競爭成為改革的標準

《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的辯論焦點主要在於「重新劃定選區」和「擴大選舉權」，前者是為了配合各地區人口增長的現況，需要推算出該地人口與代議士的合理比例，並考量雙方政黨在該地的勢力分布的談判工作。真正的問題是在後者。擴大選舉權實際上意味著與更多人分享政治權力，大量的新選民勢必會稀釋舊選民的選票占比，進而改變原本的階級影響力。對於十九世紀中期的不列顛來說，這是幾乎動搖國本的事情，所以需要審慎的安排。迪斯雷利把這個棘手的問題攬在這屆政府上，並成功取得在野黨領袖格拉斯頓的支持。迪斯雷利相信改革能夠拉攏新選民，也就是「體面可敬的」工人階級，讓他們因為感念保守黨的貢獻，而協助扭轉保守黨長期只能組織少數政府的頹勢，以便更加順利地推動各項政策。然而，格拉斯頓曾經因為推動改革議案而使羅素政府不得不解散，並於在野期間依然堅持改革，實際上也為法案的誕生貢獻良多。這使得迪斯雷利無法獨佔這份政治成就，自由黨的支持者甚至會認為他「搶走」了格拉斯頓的功勞。事實上，選情沒有往迪斯雷利所想的方向發展。格拉斯頓在法案通過後的第一次大選中，獲得勝利並坐上首相之位。

在改革議案商議期間，大量的圖像承載著兩人的身體形象以及帶有評價功能的符號，持續播報給不列顛的閱聽大眾。擴大選舉權的課題，實際上是在重塑「公民」的標準，並將參與政治的權力賦予原本處於弱勢的社會群體。這個標準在當時是與成年男性（manhood）的定義緊密相連的概念，故同時牽涉到階級與性別的社會差異，並衍生出「投票方式」和「女性選舉權」等議題。有關這兩個議題的討論，



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陽剛特質是選舉改革的重要因素。

(一) 1872 年秘密投票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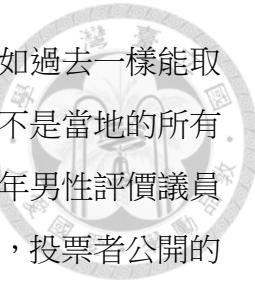
《1872 年秘密投票法》(Ballot Act 1872) 是格拉斯頓政府為《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打上的補丁。迪斯雷利在構思改革法案時，之所以會將財力視為選舉權的其中一道門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當時大多數人相信，下議院議員的職責是捍衛選民的財產和權利；而沒有足夠財產的人，與政治事務的利益關係就不深厚，也容易受到金錢利誘，而無法做出獨立判斷並為其負責。這也是為何要強調擴大的選舉權是開放給「體面可敬的」或「傑出的」工人階級。因為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或許收入沒有中產階級來得優渥，但他們對不列顛社會的經濟貢獻，以及個人生活上的修養與自律，都足以證明他們獨立負責的能力。故提倡者主張讓這個群體在議會中擁有保護他們財產和權利的代表，是完全合乎正義和憲政傳統的決定。

然而，對於廣大的工人階級來說，中產階級不僅常站在他們政治立場的對立面，還是勞動關係中的頂頭上司。這個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使得工人階級的政治表態多了一層隱憂。在修法以前，投票方式是投票權人到指定的投票站 (polling-place)，對著計票人員大聲喊出投票目標候選人的名字，也就是記名投票。這種投票方式的隱憂在於投票者的個人資訊完全公開。租客、員工、小販的投票意願，若是和那些中產階級的大老闆們不同陣營，就很可能被報復，包括肢體暴力或經濟壓力。也因此常有賄賂或勒索等干擾個人意志的事情發生。候選人透過酒精收買選民，以及選民互相鬥毆的情況，是號稱政治和平穩定的維多利亞時代最諷刺的一幕景象。¹²

而無記名投票的缺點，首先是議員的「名望」(prestige) 可能會大打折扣。保守黨議員紐德蓋特 (Charles Newdigate Newdegate, 1816-1887) 認為不能期待「各郡的成年男性 (adult male) 會滿意代表他們的議員，是由房租每年十二鎊的戶主選出來的，他們對這些戶主在選舉時的行為一無所知」。¹³紐德蓋特的意思是，原本的投票權人都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他們的人品與道德 (理論上) 可以替候選人背書支持；然而 1867 年改革之後投票權人大幅增加，新選民是在社會中「沒

¹² Donald Richter, "The Role of Mob Riot in Victorian Elections, 1865-1885," *Victorian Studies* 15, no. 1 (September 1971): 19-28.

¹³ Charles Newdigate Newdegate, speaking against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8 Februar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09, col. 176.



有臉孔」的普通人，若再給他們匿名投票的話，選出來的議員就如過去一樣能取信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紐德蓋特的話中，議員名望的評價者並不是當地的所有居民，而是成年男性，其中包含大量未享有選舉權的普通勞工。成年男性評價議員名望的基準，是該議員的「保證人」們是否願意公開身分。換言之，投票者公開的政治表態除了展現勇氣之外，也能夠獲得成年男性的肯定，是一種具備男子氣概的負責表現。

無記名投票的第二個缺點是，它被認為與不列顛人的習慣和個性相悖。這個論點得到不少保守黨議員附和。里德爾（Henry George Liddell, 1821-1903）聲明「違背人民習慣、不顧人民感受而制定的法律，必然會飽受惡評而被淘汰」。¹⁴希克斯 - 比奇 (Michael Hicks-Beach, 1837-1916) 認為這是「為了讓一小部分懦弱 (cowardly) 的選民過著虛偽的生活，而去剝奪絕大多數人公開支持候選人的特權」。¹⁵試圖讓選票無法追蹤，被希克斯 - 比奇形容成是有損男子氣概的懦弱決策。查利 (William Thomas Charley, 1833-1904) 則進一步將其斥為剝奪選舉權的議案，因為採用秘密投票制意味著需要識字才能投票。查利引用格拉斯頓和自由黨曾在 1866 年表達過的意見，稱這樣的設計「在原則上不健全，在實踐上沒效果，甚至令人反感」。¹⁶對此，愛爾蘭律政司長理查 · 道斯 (Richard Dowse, 1824-1890) 則主張，只要通過法案這就不會是問題；一旦制度上軌道，不列顛的民眾自然能學會如何投票，而民情也會隨之潛移默化，「屆時不列顛的紳士若向他人行賄，將被視為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為」。¹⁷在道斯的這一句話中，「紳士」指的是那些有參政資格的成年男性；反過來說，若不是擁有參政資格的成年男性，就不會被劃進紳士的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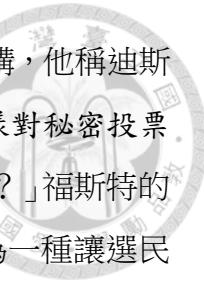
1872 年 5 月 30 日，經過了數個月的辯論之後，自由黨議員福斯特 (William Edward Forster, 1818-1886) 在三讀會議上的結辯演講指出，對於秘密投票無法解決賄賂的疑慮，「沒有什麼比讓買家非常不確定花錢能收到想要的商品，更能阻斷非

¹⁴ Henry George Liddell, speaking against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15 Februar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09, col. 475.

¹⁵ Sir Michael Hicks-Beach, speaking against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15 Februar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09, col. 511.

¹⁶ William Thomas Charley, speaking against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2 Ma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11, col. 109.

¹⁷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Ireland [Richard Dowse], speaking for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15 Februar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09, col. 483.



法交易」；除此之外，福斯特也提到了迪斯雷利在曼徹斯特的公開演講，他稱迪斯雷利雖然早已表態反對，但「如果全國各地的保守黨人都像兩年前一樣對秘密投票懷有敵意，尊敬的議員閣下難道不會利用這個機會團結眾人支持他嗎？」福斯特的話表明政治領袖會利用公開集會號召支持，而參與公開集會也不失為一種讓選民公開表達支持的管道。議案最終以 274 票對 216 票的些微差距通過。¹⁸

（二）女性投票權

在《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付梓之前，曾出現過一個「問題」：女性是否在選舉權的擴大範圍內？迪斯雷利的《西碧爾》中曾有這樣一段對話，幾位女士聚在一起喝下午茶，並談論「憲章運動」的五點原則（男子普選權、無記名投票、議員薪俸、年度選舉、取消參政財產限制）：

卡洛琳說：「我永遠不會嫁給任何不符合五點原則的男人」。哈麗埃特接著說：「我該為嫁給一個沒有選舉權的人感到羞恥」。朱麗雅說：「那不比嫁給奴隸好到哪去」。寡婦凱莉搖搖頭，說：「我不喜歡這些政治的東西，那不是我們性別該做的事（they bayn't in a manner business for our sex）。」朱麗雅問道：「我想知道這是為什麼？我們難道不像男人一樣關心優良政府的來由嗎？我們還了解得不夠多嗎？我相信那些時髦公子哥（Dandy）絕不會沒有諮詢過我就貿然行事」。卡洛琳接著說：「在這麼熱的天氣裡，聽到別人說我們沒法理解女王當朝的政治，還真是好消息。」……朱麗雅說：「……如果我們不能擁有自己的人選（our own man），那我會完全支持貴族去對抗中產階級」。¹⁹

這段對話直接點出一個頗為諷刺的事實，身在一個由女性君主統治的國家之中，這個社會卻認為女性不會、也不該去理解或談論政治。固然有許多人，不論男女，都抱持著像凱莉一樣的想法，認為不同性別有各自被分配的任務，而且這樣的

¹⁸ William Edward Forster, speaking for the Parliamentary and Municipal Elections Bill, on 30 May, 1872,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11, col. 880-881. 秘密投票議案的首倡者為自由黨議員利瑟姆（Edward Adam Leatham, 1828-1900），他在 1870 年即提出此案，而未能在當年通過。福斯特於 1872 年 2 月 8 日將改版後的議案交付一讀，故稱辯論時長為數月而非數年。

¹⁹ Benjamin Disraeli, *Sybil*, bk. 6, chap. 8.



人可能佔了社會上的多數；但也有不少人會問出朱麗雅的問題。他提到的「時髦公子哥」會和女性保持良好互動，如同在第一章已經論述過的那樣，擁有傳統的紳士風度，但這類人在維多利亞中期似乎已經式微。

那年輕時自居為時髦公子哥，又素來以與女王互動良好著稱的紳士迪斯雷利，對於女性選舉權的態度又是如何？1867年3月25日，自由黨議員登曼（George Denman, 1819-1896）向迪斯雷利提問，是否因為改革議案的第三條，也就是給符合資格的人投票權的條文中，使用「（男）人」（man）一詞而不是使用「男性」（male person），²⁰故適用《1850年法規簡化法》（*Interpretation Act 1850*）中第四條的規定：「除非另有明確說明，否則所有法案中只要指涉男性（masculine gender）的詞彙都應被視為包含女性（feminine gender）」。²¹也就是說，根據這條法律，若將議案條文的「男人」理解為「人」，就能賦予符合資格的女性投票權。迪斯雷利的回答是，這個議案就是「另有明確說明」的那種（But that is, I believe, provided in this instance）。²²迪斯雷利回答得相當簡短，並且未再多做解釋。他的態度相當明確，即女性選舉權不是這次議案的主題，保守黨也沒有往這方向推行的打算。

五天後，也就是1867年3月30日，《潘趣週刊》刊登了〈彌爾的邏輯：女性公民權〉（“Mill’s Logic; or, Franchise for Females”），也將這個問題搬上檯面（圖卅四）。圖中央是身後跟著一群婦人的自由黨議員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他對著前方擠在投票所的男性們，用非常強烈的語氣說道：「先生們，請讓條路給這些……呃，人士（persons）」。從設計對白讓彌爾一度語塞可以推斷，《潘趣週刊》應該是以相對戲謔的態度看待此事，也證明「女性」一詞在當時意味著與政治絕緣。

在前一頁的文章〈女性選舉權〉（“Womanhood Suffrage”）中，則設計了兩位學者在「進步研究所」（the Progressive Institute）的對談，一位是「波傑斯教授」

²⁰ Act 30 & 31 Vict. c. 102, s. 3: “Every Man shall in and after the Year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eight, be entitled to be registered as a Voter, and, when registered, to vote for a Member or Members to serve in Parliament for a Borough, who is qualified as follows....”

²¹ Act 13 & 14 Vict. c. 21, s. 4: “In all Acts words importing the masculine gender shall be deemed and taken to include females, and the singular to include the plural, and the plural the singular, unless the contrary as to gender or number is expressly provided.”

²² George Denman, questioning to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Benjamin Disraeli] ab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 on 25 March, 1867,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6, col. 467.

(Professor Podgers)，另一位是「哈麗埃特·布朗博士」(Dr. Harriet Brown)，後者的名字與彌爾的妻子哈麗埃特·彌爾(Harriet Taylor Mill, 1807-1858)一樣。波傑斯和哈麗埃特從改革議案開始談起，哈麗埃特提到由於彌爾關於女性選舉權的修正案被駁回，所以所謂的「人民代表法」已經名不符實了。人民中有一半是女性，而他們卻沒有代議士在下議院中。波傑斯則認為這是彌爾的邏輯在鑽牛角尖，他主張女性已經由其丈夫代表了，所以是「更好的那一半人民」(the better half of the people)。話題接著延展到稅賦貢獻、多數意志和勞動產出，哈麗埃特認為女性沒有哪一項落後於男性，主張「沒有代表的課稅就是暴政」(來自美國獨立革命爆發時的抗議內容)。波傑斯則舉出數項女性「不用做的」公民義務，包括陪審團、服兵役、擔任政教要員等，但都被哈麗埃塔一一駁回。對於波傑斯「女性被排除於下議院之外」的問題，哈麗埃塔則說可以建一座「女議院」(House of Ladies)，負責把關所有與女性權益有關的法令。最後則提到彌爾或許會提倡這件事，因為他被認為是「代表女性的議員」(the Ladies' Member)。²³《潘趣週刊》這篇文章諷刺的對象會因為讀者立場而有差異，而無論如何，兩人的討論中概括了政治弱勢的現況，以及賦與選舉權的衡量標準，除了理想之外，還有諸多社會文化層面的因素要納入考量。

四、小結

本章討論了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兩人的競爭與選舉改革。兩人的競爭不僅反映在他們個人的政治主張中，也深刻影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政黨改革進程。漫畫的形象化和符號運用，更將這一競爭直觀地呈現在大眾面前，透過誇張和諷刺，幫助讀者理解兩人及其所屬政黨在各個議題上的立場。在分析這些漫畫時，我們可以看到創作者們透過對身體語言和面部表情的描繪，將政治人物的特質具象化。例如，格拉斯頓常被塑造成冷靜堅定的改革者，而迪斯雷利則被描繪成狡猾的投機者。這種形象不僅突顯了格拉斯頓的專業和堅持，也諷刺了迪斯雷利的保守和抗拒，進一步強化了兩人在改革議題上的立場和形象。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之所以能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代表各自的政黨，不僅因為他們曾擔任財相，擁有足夠的知名度，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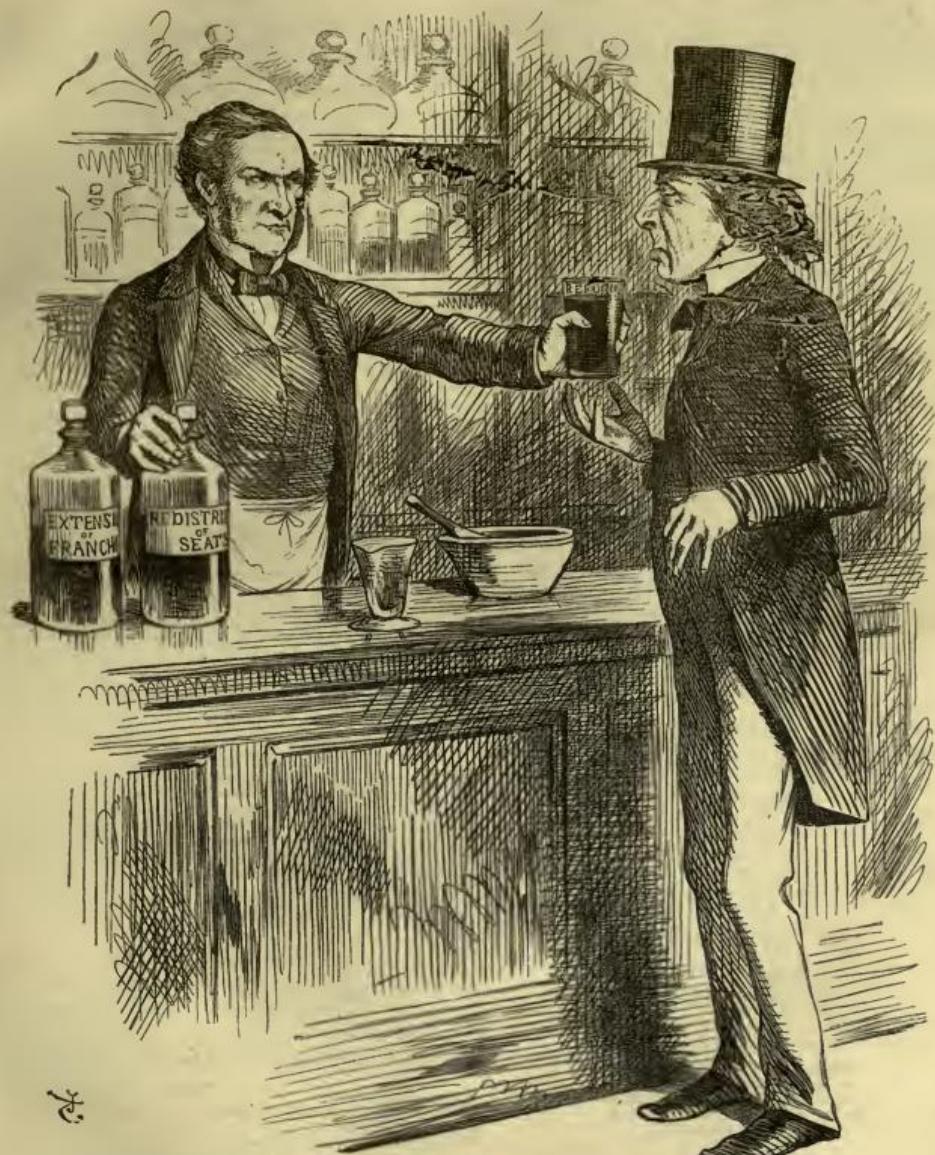
²³ *Punch*, 30 March, 1867, vol. 52, 128.



重要的是，他們在成為首相後，展現了卓越的領導才能，並完全掌握了黨組織的權力。他們的個人形象、政府決策方向與政黨意識形態三者合而為一，本文以「男人注定鬥爭」指出兩人的政治競爭牽涉到了陽剛特質的表現。

選舉改革是兩人競爭中最為明顯的一個例子。1866 年，支持選舉改革的格拉斯頓與羅素推出了擴大選舉權的議案，雖然最終因自由黨內部及保守黨的反對而未能通過，但卻揭示了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深刻分歧。迪斯雷利在 1867 年成功推出的《人民代表權法》則標誌著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儘管其內容在格拉斯頓及自由黨的推動下有所修訂，但依然代表了保守黨在選舉改革方面的立場。政治評論家如藍道爾對兩人的評價，也顯示了不同價值觀的碰撞。格拉斯頓的男子氣概和堅持，被自由黨支持者視為優越於迪斯雷利的紳士風度。這種評價標準不僅體現了當時社會對男性領袖特質的期待，也影響了政治審美的取向。諷刺漫畫通過描繪兩人的形象，不僅是對時政的針砭，更是對政治人物和政黨價值的濃縮表達。透過這些漫畫，我們能夠更直觀地理解當時的政治局勢和社會價值觀，尤其是如何通過形象化的表現手法，影響和引導讀者對兩位政治領袖及其政策的認識和態度。

總之，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的競爭，不僅推動了不列顛選舉改革的進程，更在政治文化和大眾媒體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們的形象和事蹟，通過漫畫和文字，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史的重要部分，也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透過對這些素材的分析，我們能更全面地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動態與文化氛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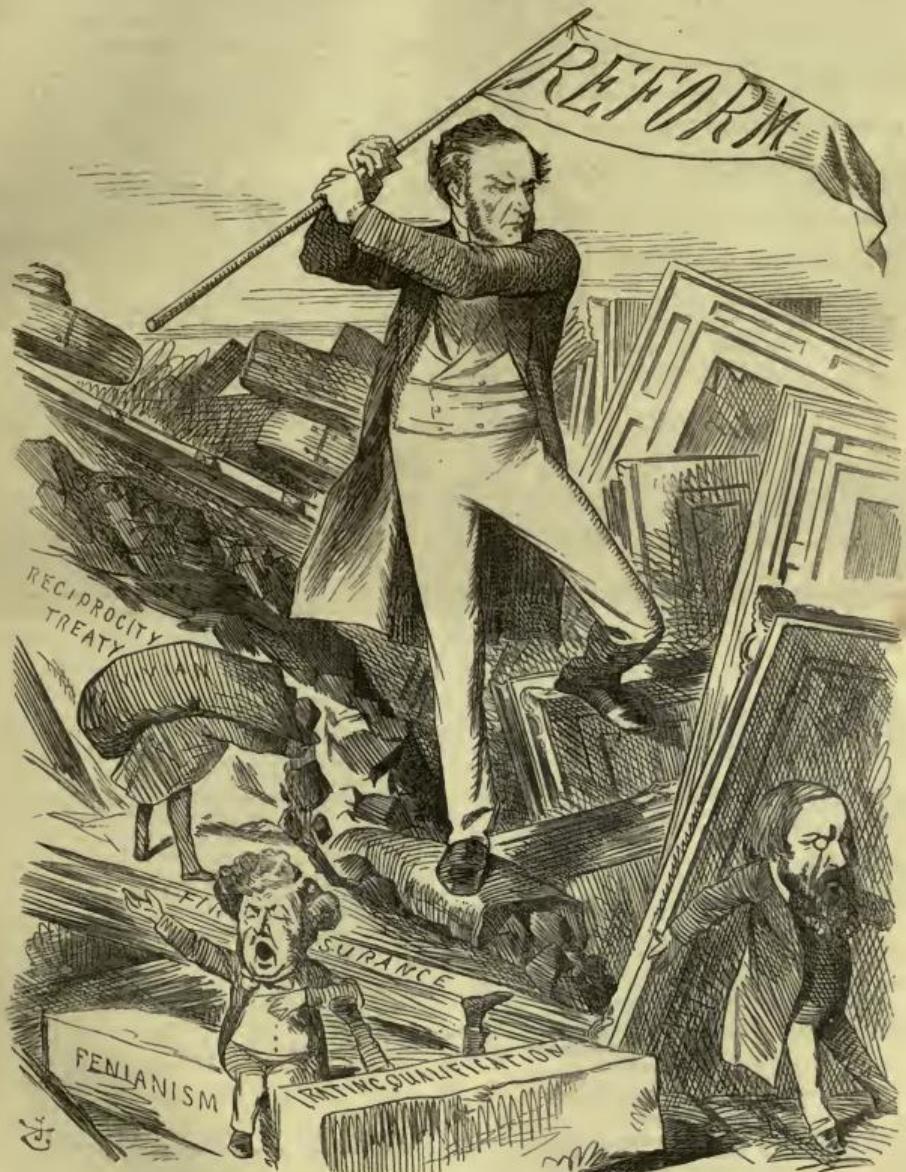
TINCT: REFORM: COMP:

MR. GLADSTONE. "THERE, MR. D.! YOU'D BETTER TAKE IT AT ONCE; THE MORE YOU LOOK AT IT, THE WORSE YOU'LL LIKE IT."

圖廿五、酌劑：改革：競爭：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0卷221頁，1866年5月26日。

資料來源：*Tinct: Reform: Comp*: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0,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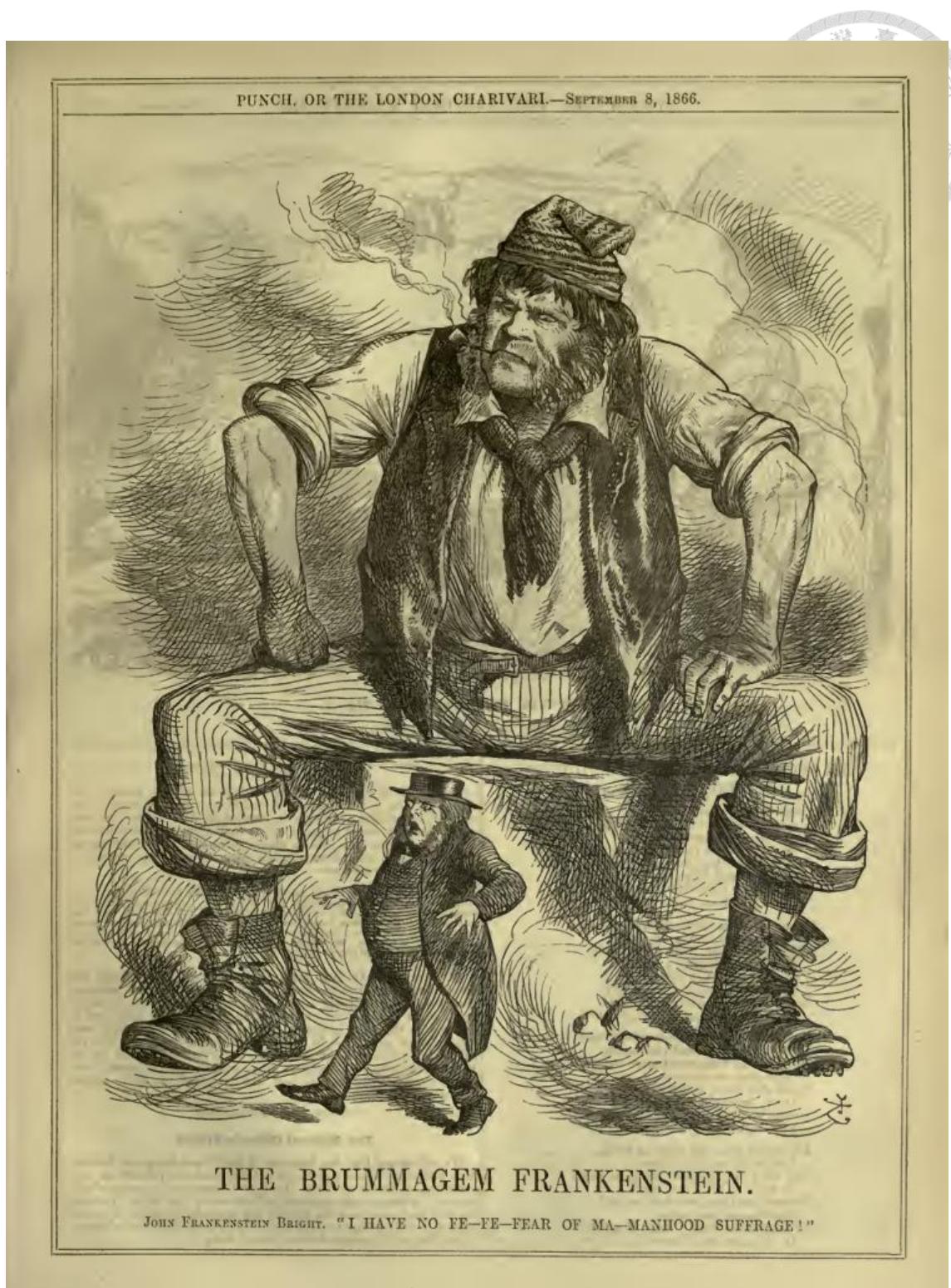
CLEARING THE BARRICADE.

(See "TO LIE IN COLD OBSTRUCTION, AND TALK NOT.")

圖廿六、掃清路障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0卷263頁，1866年6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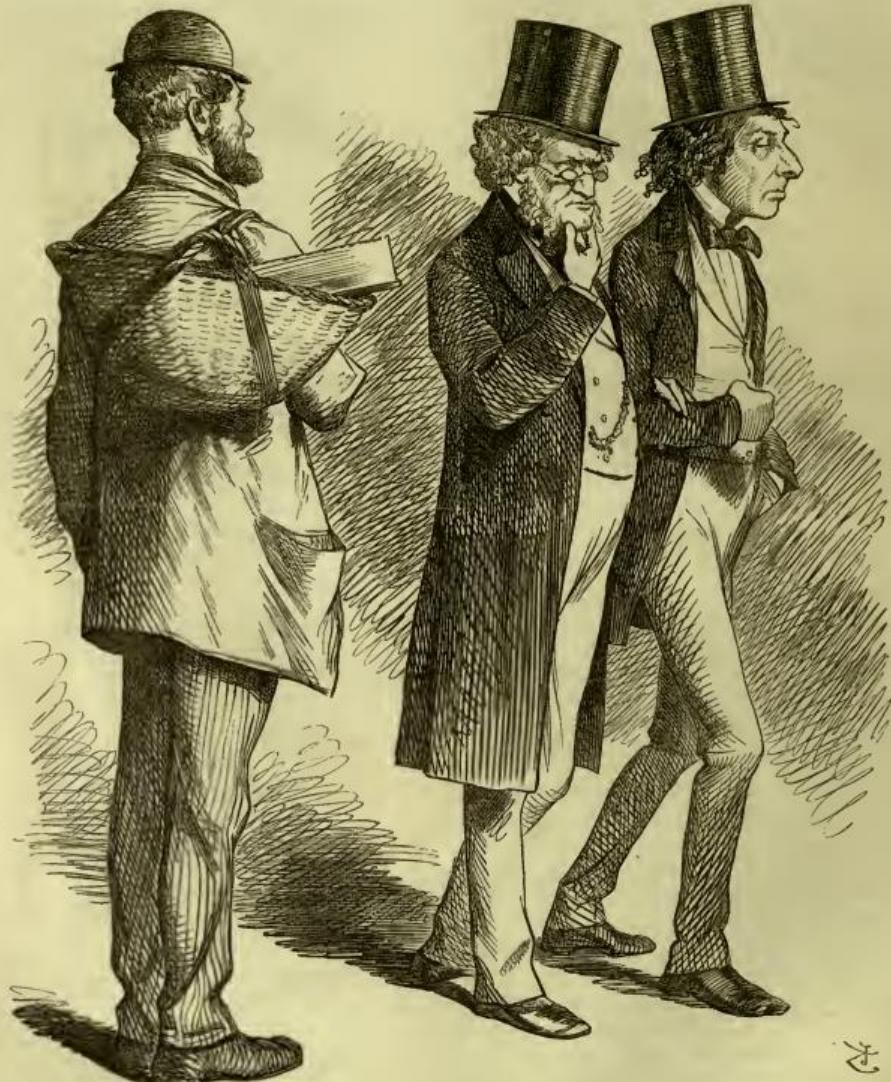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learing the Barricad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0, 263.



圖廿七、伯明罕的弗蘭肯斯坦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1卷103頁，1866年9月8日。

資料來源：*The Brummagem Frankenstein*.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1,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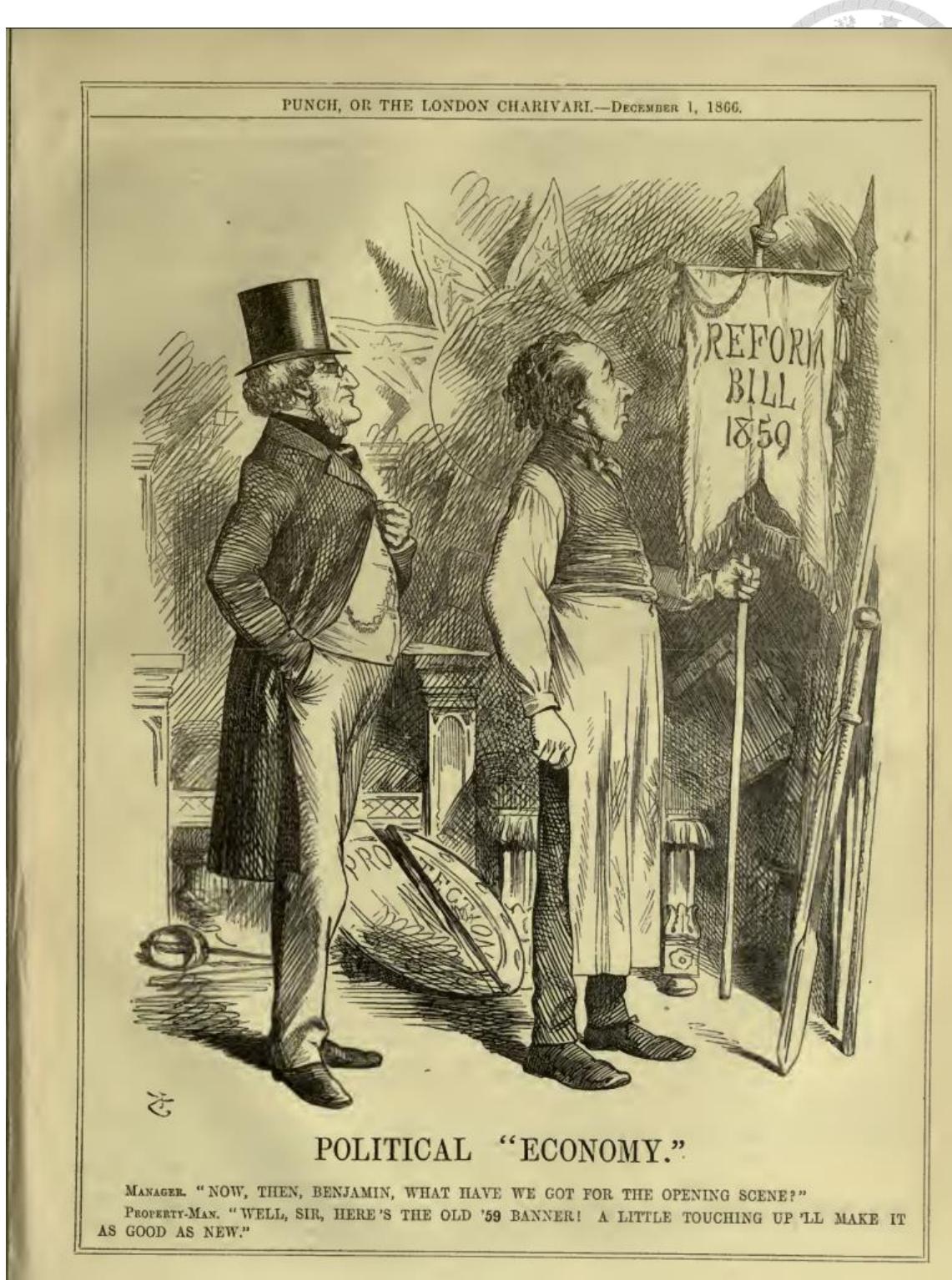
THE FIRST QUESTION.

WORKING-MAN. "WELL, GENTLEM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ME?"
LORD DERBY (*aside to Dizzy*). "AH! IF HE WERE ONLY A RACEHORSE NOW—"
DISRAEILI. "OR AN ASIAN MYSTERY—"

圖廿八、首要問題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1卷6頁，1866年7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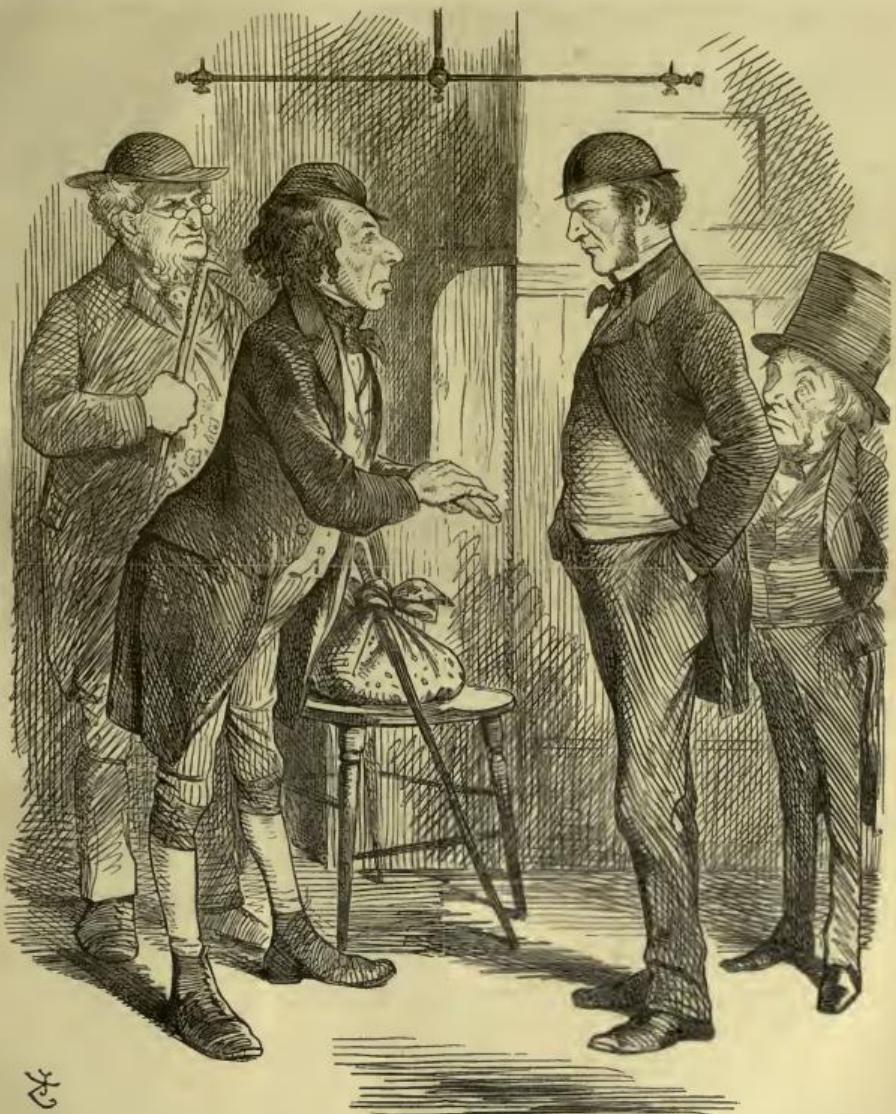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he First Question*.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1, 6.



圖廿九、政治「經濟學」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1卷223頁，1866年12月1日。

資料來源：*Political "Economy."*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1,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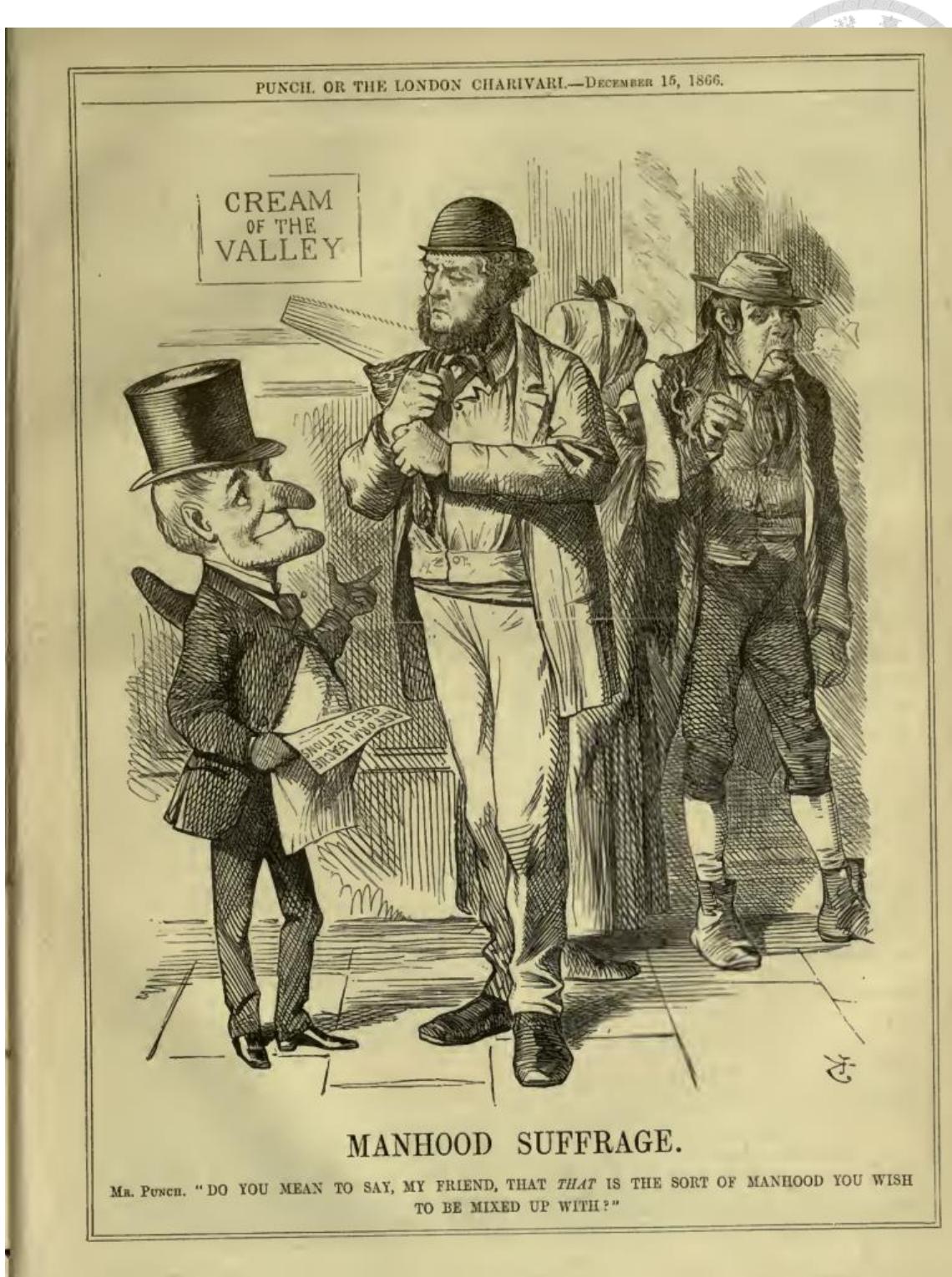
“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

“SIR, THE MEANING THAT WE ATTRIBUTE TO THE WORDS I HAVE JUST READ IS,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HOUSE FINDS ITSELF, IT IS IN OUR OPINION EXPEDIENT THAT PARLIAMENTARY REFORM SHOULD NO LONGER BE A QUESTION THAT SHOULD DECIDE THE FATE OF MINISTRIES.” (*Loud laughter at this capital joke.*)—*Vide Speech of Chancellor of Exchequer, Feb. 11, 1867.*

圖三十、「正面我贏，反面你輸」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2卷77頁，1867年2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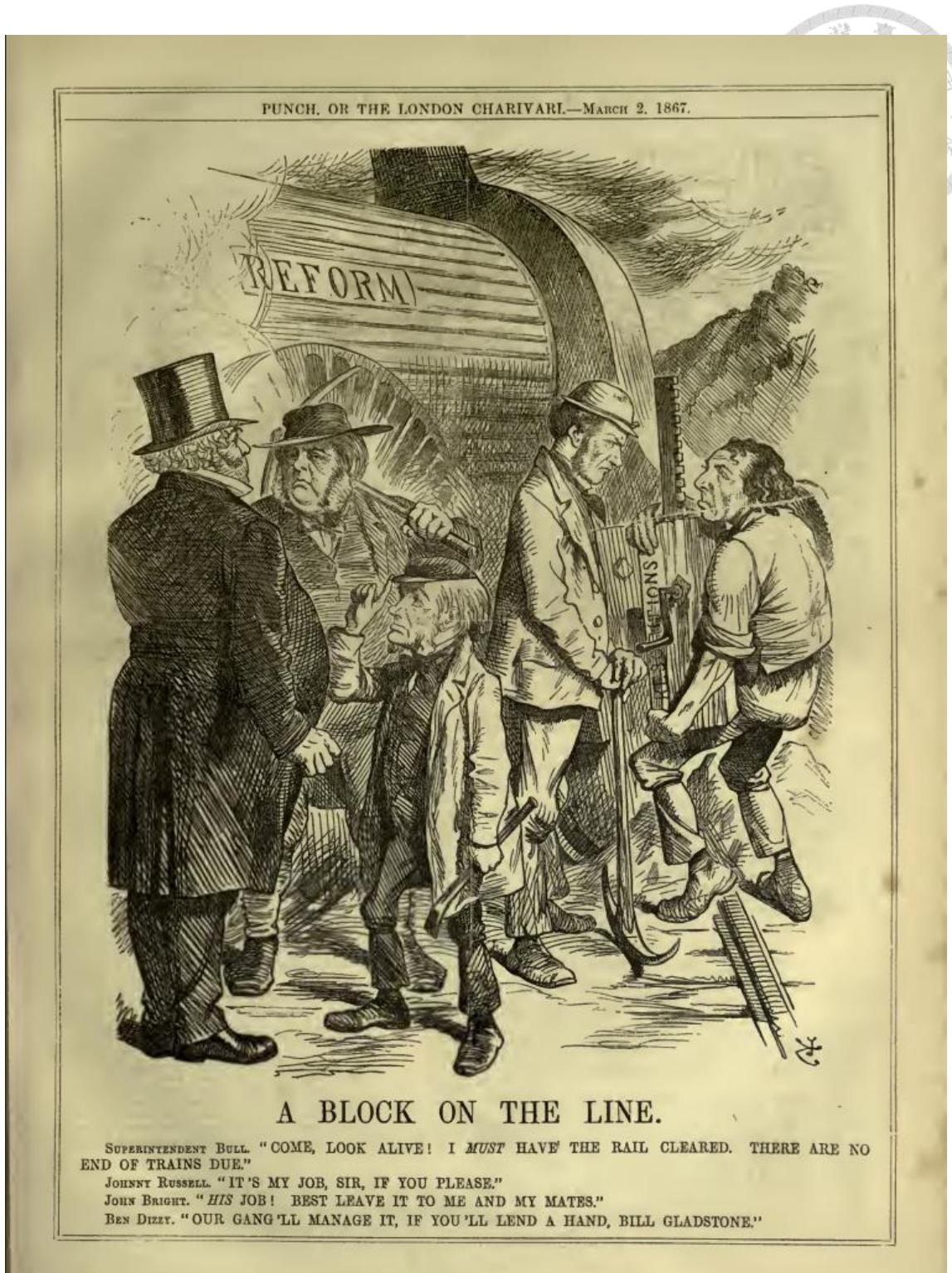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eads I Win, Tails You Los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2, 77.



圖卅一、男性普選權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1卷243頁，1866年12月15日。

資料來源：*Manhood Suffrag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1, 243.



圖卅二、軌道的阻礙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2卷87頁，1867年3月2日。

資料來源：*A Block on the Line*.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2, 87.



BEFORE THE TRIAL.

MR. GLADSTONE. "WE COULD SETTLE IT IN FIVE MINUTES, YOU KNOW, IF—"
MR. DISRAELI. "YES, IF THE 'PARTIES' WOULD ONLY LISTEN TO REASON."

圖卅三、開庭之前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2卷97頁，1867年3月9日。

資料來源：*Before the Trial*.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2, 97.



圖卅四、彌爾的邏輯：女性公民權

約翰·譚尼爾繪。版畫，刊於《潘趣週刊》52卷129頁，1867年3月30日。

資料來源：*Mill's Logic; or, Franchise for Females.* Internet Archive, 297227663. *Punch*, vol. 52, 129.





結論

本研究概述維多利亞時代男性身體研究的歷史學課題及其參考的理論沿革，承繼該領域呼籲投入的研究方向，並將此一方法應用在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人物研究上。本研究關注的問題為維多利亞社會對於兩人形象的理解與詮釋，採用的分析視角為文化符號中的性別因素。透過聚焦於政治人物身體活動和形象中的表現方式及其性別涵義，本研究所得之結果可分為兩部分：第一是從陽剛特質切入探討政治領袖的身體展演，從身體在其成長過程中的意義開始，論及兩人如何在投入政壇、評論時事、掌握權力、推行政策的從政之路上，受到當時政治運動的影響與啟發，並使各自擁抱的政治價值體系化，逐漸成為政黨的代表人物。第二是在選舉改革的脈絡中，呈現出政治人物身體表演的重要性。兩人的形象透過媒體的複製和傳播，進入各階層民眾的視野中；諷刺漫畫也會巧妙地運用陽剛特質的視覺元素，誇大兩人的身體，藉此達到褒揚或貶抑的效果。

一、 政治領袖的身體展演

維多利亞時代的陽剛特質並非均質且單一的概念，「理想男性」在當時已有多種標準，本文比較其中兩種影響層面最廣且相互競爭的概念：「紳士風度」和「男子氣概」。本文認為迪斯雷利、紳士風度、保守黨三者的關係，相當於格拉斯頓、男子氣概、自由黨三者的關係，都是政治領袖所表現出的個人特質與政黨價值相互結合，用以指導各自政黨政策的意識形態。而為了釐清政治領袖的理想男性標準，本研究遂從兩人的個人生平開始考察。

迪斯雷利自豪於自身的猶太血統，並將拜倫勳爵視為楷模，精於打扮、工於文學創作。而因為家庭升學安排和個人生涯志向有出入，又於青年時期遭遇財務問題，遂投入寫作以賺取稿費，其中包括自傳性小說和政治性小冊。迪斯雷利個人的生涯規劃受到拜倫勳爵和憲章運動的影響。迪斯雷利打扮成「時髦公子哥」，目的是模仿和繼承拜倫的精神，以及為了和他認為「平庸」的同僚有所區隔。迪斯雷利選擇接受猶太身分，成為英格蘭社會的「局外人」，而「時髦公子哥」除了具有局外人的性質之外，也有將外在呈現視為己任的特點，其中包括講究的服裝和精巧的言辭。另一方面，十九世紀初的紳士逐漸與「時髦公子哥」畫上等號，因此迪斯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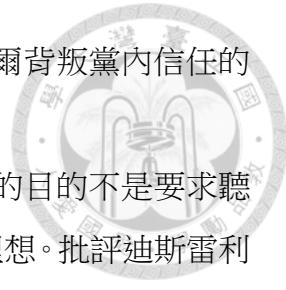
利在外表上的經營也是為了他躋身上流社會的野心。

格拉斯頓身為家中四兄弟的么子，在富商父親的安排下進入貴族學校就讀，並由於學業表現優異，融入菁英學生的辯論社團，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在就學期間，格拉斯頓培養了陪伴他一生的古典學知識及興趣，並將之應用於辯論活動中。古代希臘羅馬的修辭學，尤其是雄辯術和演說術，使格拉斯頓的演說增色不少。格拉斯頓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接受菁英教育的他同時也受基督信仰的薰陶，帶有普世平等的理想和民胞物與的博愛。格拉斯頓相信如他一般享受不列顛繁榮果實的上流階級，應該勇於站出來領導群眾，因為這是自己能力所及之事，也是統治階級的社會職責。

這種英雄式的道德觀念，與他自身的宗教關懷融合為一體。格拉斯頓早年並不崇尚將政治權力以「自由」之名開放給「無知的」大眾，認為這樣只會讓他們徒然失去社會體制的保護。他認為宗教應該成為政府和個人精神的核心，因此格拉斯頓並不追求外表的華麗，而是要求自己保持整潔莊重。當時牛津、劍橋兩校也在提倡未來的領導者們應該要自律、成熟、強身健體。格拉斯頓在學校得到了同儕和後輩的敬重，他在學校累積的人脈也為他創造了從政的機遇。由於得到貴族賞識，格拉斯頓得以在完成學業後隨即踏入政壇。

比較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成長背景，兩人所學習的男性理想標準並不相同：迪斯雷利從文學和時尚圈中找到不甘平凡的寄託，而將自己的才華與人生挫折轉化為「時髦公子哥」與溫文儒雅的紳士風度；格拉斯頓則從古典和菁英社群中繼承當時對政治領袖的期望，並將宗教信仰和學術知識融合成自律、勇敢、追求正義與真理的男子氣概。紳士風度與男子氣概都是維多利亞時代所重視的陽剛特質，然而卻有此消彼長的趨勢。紳士風度所展現出的優雅、婉轉、工於言辭和取悅他人，並不受逐漸崛起的中產階級歡迎；他們更歡迎強調生產力、支配、自律、內在道德的男子氣概。而經過分析兩人留下的早期肖像和著作，可以得知兩人早在 1830 年代便開始往各自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形象經營。兩人對自身早年表現的回顧與檢討，也足以證明刻意經營形象的說法。

另外，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都在投入政治工作之後，改變他們最初的立場。迪斯雷利原本是激進派，但在皮爾與穀物法的問題上選擇站在保守派發聲；格拉斯頓原本是保守派，而在同一項議題上選擇支持皮爾和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兩人的選



擇恰處於保守黨與自由黨逐漸成形的時期，而迪斯雷利指控皮爾背叛黨內信任的那番演講，使皮爾派從此與保守黨分道揚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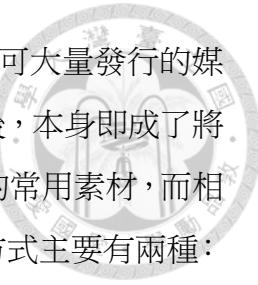
迪斯雷利的演講特色是充滿精妙的諷刺與生動的比喻，他的目的不是要求聽眾接受新價值，而是希望喚起他們心中本就存在的傳統美德與理想。批評迪斯雷利的人則常常攻擊他的猶太身分，將他形容成玩弄東方神秘與玄虛的異國老巫師，擅長用言語來蠱惑人心，並且以他紳士的外表和舉止取信於人。而格拉斯頓嶄露頭角的契機則是 1853 年擔任財相時的預算案報告。他說服議會考慮取消所得稅，並為自由主義貿易政策提供連敵對者也讚賞的辯護演說。他在這場演說中證明了自己擁有領導各派勢力的魅力與才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兩人的演說中，男性理想皆被納入政策的修辭之中。迪斯雷利主張真誠聰明而深孚眾望的紳士，應當捍衛其支持者的意見，以及長久以來保障眾人利益和安全的體制。格拉斯頓則主張捍衛公平和正義之理需要擁有男子氣概，而一個擁有男子氣概的政治人物會積極解決問題，為公共福祉承擔質疑與挑戰。這也同樣適用於政府的政策，格拉斯頓主張政府的存在目的不是譁眾取寵，而是原則的捍衛者、人民心靈的安撫者。格拉斯頓老當益壯的體態和剛勁的手勢，自然而流暢地散發令人信服的威嚴，也成為學者描述領袖魅力的典範。

綜上所述，政治領袖的身體表演除了在個人演說上展現魅力和風采，也在「男人注定鬥爭」的時代裡，為各自政黨樹立鮮明的政治立場和形象。身體表演的目的不只是透過不斷操演同樣的元素來確立陽剛特質，也是為了表現陽剛特質。由於維多利亞時代的陽剛特質中，紳士風度與男子氣概正在爭奪主導地位，因而取得政治領袖的地位，也會與何種陽剛特質成為顯學有所關聯。

二、身體表演與選舉改革

在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開始從政的時代，政黨價值和選舉改革分別是政治場域內部和外部亟需處理的課題。在政黨價值方面，無論是迪斯雷利還是格拉斯頓，都透過頗具特色和才華的演說贏得讚賞。儘管兩人的演說風格大相逕庭，但都獲得觀眾的好評，並形容為精彩深刻的演出。兩人的言辭，以及旁人對其身體姿態的描述，都與陽剛特質息息相關。另外，維多利亞時代中期也是照相、沖洗技術開始商業化和普及的年代，兩人留下的沖洗照片，保留了彰顯各自陽剛特質的視覺元素。



以週刊形式發行的諷刺漫畫是除了商業照片之外，另外一種可大量發行的媒體。格拉斯頓與迪斯雷利的身體形象，經過漫畫家的演繹和扭曲後，本身即成了將時事編碼展現的政治評論。政治領袖的身體在當時是評價和諷刺的常用素材，而相關評價也蘊含了陽剛特質的元素。漫畫戲謔政治人物陽剛特質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刻意誇大該人物陽剛特質的滑稽面，比如將迪斯雷利描繪成自戀的演員、諂媚的商人、袖手旁觀的貴族，或是將布萊特畫成故作勇猛的莽漢；另一種是將該人物扮成女性，如將格拉斯頓刻劃成情緒化的保姆或天主教女子。

諷刺漫畫除了緊跟政治時事之外，也會跨越其黨派偏好給與褒貶。大多時候格拉斯頓的形象都是冷靜堅定的男子，而迪斯雷利則時常駝背、面露奸笑，其他政治人物在改革期間只能充當漫畫中的配角。一方面這證明了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至少在媒體版面上是迪斯雷利與格拉斯頓的時代，兩人臉孔的出現頻率遠遠高過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在內的其他人物。另一方面，這也證明了「政治是場表演」的比喻，不僅是個別學者的評論修辭，同時也是維多利亞人對政治的其中一種想像方式。「表演」實際上充斥在迪斯雷利、格拉斯頓、諷刺漫畫以及諸多評論人的言談和實際行動中。

對於權力和名望都盛極一時的兩位政黨領袖，在推動政治改革時，身體展演成為話題焦點以及拉攏支持的手段。不列顛政治文化中的公開演講與競選，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現。迪斯雷利在曼徹斯特的公開演講，或是格拉斯頓在中洛錫安的競選演說，都是當時政治界的創舉，除了讓政治領袖走出下議院與民眾面對面互動之外，也讓選民聚集在一處有了實際的意義。選民的聚集與造勢是《1867 年人民代表權法案》賦予大量人民選舉權的直接結果，也是《1872 年秘密投票法》限制公開表態支持之後的替代行動。這兩條法案也都和陽剛特質的定義有著密切關係。前者涉及何謂有能力負擔政治責任的男性，後者則涉及公開表態政治立場是男子氣概的展現。由於政治改革的相關討論圍繞著陽剛特質的界定標準，因此兩人乃至兩黨的競爭，可以有效反應出當時社會的陽剛特質內容與權重。這除了能在已有豐厚成果的政治史中提供新的視角，也有助深入認識維多利亞時代「性別」在政治中的意義。

迪斯雷利過世之後，格拉斯頓在國會上說自己是「比康士非伯爵一位老而活躍



的對手（an old and keen opponent）」。¹而迪斯雷利遺留在病榻上的未完稿《法爾科內》（*Falconet*），小說主人公的形象則是以格拉斯頓為原型。或許可以說，他們的競爭並未隨著政治生命的結束而黯淡，反而愈加鮮明。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印象深入人心，插畫家弗尼斯用速寫留下他們在國會的身影。相較於格拉斯頓誇張且的肢體表現，迪斯雷利則顯得內斂而沉穩（見附錄二）。每年 4 月 19 日，迪斯雷利去世的這一天，懷念迪斯雷利的民眾會在他的墓地和雕像前聚集（圖卅五），留下一朵他生前最喜歡的報春花（primrose）。報春花的花語是「不能沒有你」（I can't live without you）。1905 年，雕塑家桑尼克羅夫特（William Hamo Thornycroft, 1850-1925）為格拉斯頓在王家司法院（Royal Court of Justice）附近立了一座銅像，至今仍用那雙獵鷹般的銳利眼睛注視著泰晤士河。事實上，格拉斯頓也會以鷹隼的形象，出現在 1890 年代的諷刺畫中（圖卅六）。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的神采，依舊留在不列顛人的心中，彷彿絲毫未沾染上歷史的塵埃。

¹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speaking for Monument to the Earl of Beaconsfield, Kg, on 9 May, 1881, to the House of Common,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61, col. 39.



PRIMROSE DAY.—[SEE PAGE 319.]

圖卅五、報春花節

W·所羅（W. Saull）繪，版畫，刊於《哈潑時尚》（*Harper's Bazaar*），1886年。

資料來源：*Primrose Day*.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21540.



圖卅六、如鷹隼的格拉斯頓

法蘭西斯・卡拉瑟斯・古爾德（Francis Carruthers Gould）繪，玻璃幻燈片，1892-95年。

資料來源：*William Ewart Gladston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D4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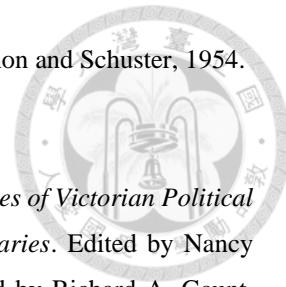


徵引書目



一、一手史料

- Carlyle, Thomas. *Chartism*. 2nd ed. London: James Fraser, 1840.
- . *Sartor Resartus: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Herr Teufelsdröckh*. 1831. Reprint,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98.
- Disraeli, Benjamin. *An Inquiry into the Plans, Progress, and Policy of the American Mining Compan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 . *Benjamin Disraeli Letters*. Edited by J. A. W. Gunn, John Matthews, Donald M. Schurman, and M. G. Wiebe. 10 Vo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2014.
- . *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Leipzig: Bernhard Tauchnitz, 1844.
- . *Contarini Fleming: A Psychological Auto-Bi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1832.
- . *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 London: John Murray, 1832.
- . *Lawyers and Legislators, or Notes on the American Mining Compan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 .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3rd ed.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5.
- . *The Present State of Mexico*. London: John Murray, 1825.
- . *The Young Duke: A Moral Tale, though Gay*.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1.
- . *Vivian Grey*. 1853. Reprint, Tokyo: Hon-no-Tomosha, 2002.
- Edgeworth, Richard Lovell. *Essay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ondon: J. Johnson, 1809.
- Engels, Friedri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zk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891.
- Fun* (London).
- Furniss, Harry. *Some Victorian Men*. London: Bodley Head, 1924.
-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 London: John Murray, 1876.
- . *Church Principles Considered in Their Results*. London: John Murray, 1840.
- . *Gladstone's Speeches*. Edited by Arthur Tilney Bassett. London: Methuen, 1916.
- . *The Gladstone Diaries*. Edited by Michael Richard Daniell Foot and Henry Colin Gray Matthew. 14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1994.
- .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 3rd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39.
- Greville, Charles C. F. *The Greville Memoirs, 3rd part*. 2 vols. London: Longmans, 1887. Project Gutenberg.
- Hughes, Thomas. *Tom Brown's School-Days*. 6th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6.
-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vol. 21, July to Dec. 1852. London: William Little, 1853.
- Lemoinne, John. "Brummell." *Revue des Deux Mondes* 7, no. 3 (August 1844): 467-484.
- Locke, John.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1693. Repri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0.
- 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Excelsior*. Boston: Houghton, 1880.
- Peel, Robert. *The Addres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Robert Peel to the Electors of the Borough of Tamworth*. London: W. Clowes, 1834.



- Peterson, Houston, ed.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Great Speech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4.
- Potteries Examiner* (Staffordshire).
- 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 (London).
- Rendall, Magnus C. *Gladstone and Disraeli and the Whig and Tory Parties*. In *Lives of Victorian Political Figures, Part 1: Palmerston, Disraeli and Gladstone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Edited by Nancy LoPatin-Lummis and Michael Partridge. Vol. 2, *Benjamin Disraeli*, edited by Richard A. Ga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kelton, John. *The Table-Talk of Shirley: Reminiscences of and Letters from Froude, Thackeray, Disraeli, Browning, Rossetti, Kingsley, Baynes, Huxley, Tyndall, and Others*.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95.
- Smiles, Samuel. *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 Rev. ed. London: John Murray, 1897.
- Smith, Goldwin. *My Memory of Gladstone*.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4.
- Stanhope, Philip Dormer. *Letters to His Son by the Earl of Chesterfield on the Fine Art of Becoming a Man of the World and a Gentleman*. 2 Vols. 1774. Reprint. London: M. Walter Dunne, 1901.
- United Kingdom.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86 (1846).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23 (1852).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25 (1853).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75 (1864).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3 (1866).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185 (1867).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09 (1872).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11 (1872).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34 (1877).
- .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 vol. 261 (1881).
- Villiers,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fourth Earl of Clarendon*. Edited by Harbert Maxwell. 2 Vol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3.

二、二手文献

(一) 專書

- Adams, James Eli. *Dandies and Desert Saints: Styles of Victorian Manho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Arnold, John H., and Sean Brady, eds. *What is Masculinity? 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Bebbington, David. *The Mind of Gladstone: Religion, Homer,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egiato, Joanne. *Manliness in Britain, 1760-1900: Bodies, Emot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 Bellamy, Richard, ed. *Victorian Liberalism: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London:



- Routledge, 1990.
- Biagini, Eugenio F. *Gladstone*. London: Macmillan, 2000.
- . *Liberty, Retrenchment and Reform: Popular Liberalism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1860-18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lake, Robert. *Disraeli*. 1966. Reprint, London: Methuen, 1978.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7.
-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0.
- Cannon, John Asht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esarani, David. *Disraeli: The Novel Politici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Collini, Stefan.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1930*. 1991. Repri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6.
-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 Cook, Chri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5.
- Cowling, Maurice. *1867: Disraeli, Gladstone and Revolution: The Passing of the Second Reform Bi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rosby, Travis L. *The Two Mr. Gladstones: A Study in Psychology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rowcroft, Robert, and John Cannon,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Davidoff, Leonore,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Dudink, Stefan, Karen Hagemann, and John Tosh, eds. *Masculinities in Politics and War: Gendering Moder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 Endelman, Todd M. *Radical Assimilation in English Jewish History, 1656-194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The Jews in Georgian England, 1714-1830: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 Liberal Socie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
- Fletcher, Christopher, Sean Brady, Rachel E. Moss, and Lucy Rial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sculi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Froude, James Anthony. *Lord Beaconsfield*. 2nd ed. In *The Queen's Prime Ministers: A Series of Political Biographies*, edited by Stuart J. Rei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90.
- Ghosh, Peter, and Lawrence Goldman, ed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Victorian Britain: Essays in Memory of Colin Matth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rieg, Hannah, Jane Hamlett, and Leonie Hannan, eds. *Gende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60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Griffin, Ben. *The Politics of Gender in Victorian Britain: Masculini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Strugg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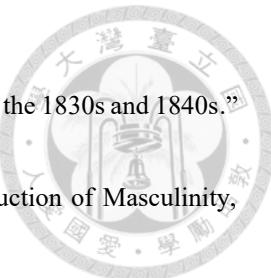
- for Women's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Hall, Donald Eugene, ed. *Muscular Christianity: Embodying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wkins, Angus. *Victorian Political Culture: 'Habits of Heart and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Hay, Daisy. *Mr. and Mrs. Disraeli: A Strange Romanc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 Heffer, Simon. *High Minds: The Victorian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Britain*. London: Windmill, 2014.
- Hibbert, Christopher. *Disraeli: The Victorian Dandy Who Became Prime Minister*.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Abacus, 1977.
- Hurd, Douglas, and Edward Young. *Disraeli: or The Two Lives*.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13.
- Janes, Dominic. *Oscar Wilde Prefigured: Queer Fashioning and British Caricature, 1750-1900*.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16.
- Jenkins, Roy. *Gladstone: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 Joyce, Patrick.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Kavanagh, Declan. *Effeminate Years: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 Lawrence, Jon. *Speaking for the People: Party, Language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England, 1867-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Lind, Michael. *Up from Conservat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Mangan, J. A. *Athleticism in th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Public School: The Emergence and Consolidation of an Educational Ideology*. 1981. Repri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Mangan, J. A., and James Walvin, eds.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 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1987. Repri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nsfield, Harvey C. *Manlines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Marcus, Steven.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Transaction, 2009.
- Mason, Roger. *Disraeli v Gladstone: Westminster's Most Bitter Feud*. London: Fonthill Media, 2020. Kindle.
- McCormack, Matthew, ed. *Public Men: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 *Embodying the Militia in Georgia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onypenny, William Flavelle, and George Earle Buckl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ield*. Rev. ed. 2 vols. London: J. Murray, 1929.
- Morley, John. *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03.
- Newsome, David. *Godliness and Good Learning: Four Studies on a Victorian Ideal*. London: Cassell, 1961.
- O'Kell, Robert. *Disraeli: The Romance of Polit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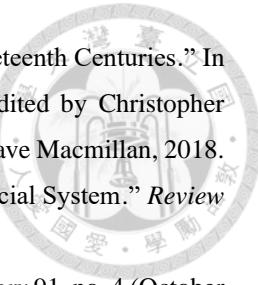
- Parry, Jonathan. *The Politics of Patriotism: English Liber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Europe, 1830-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arsons, Joanne Ella, and Ruth Heholt, eds. *The Victorian Male Bod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 Peterson, Stephen J. *Gladstone's Influence in America: Reactions in the Press to Modern Religion an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Richmond, Charles, and Paul Smith, eds. *The Self-Fashioning of Disraeli. 1818-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Roper, Michael, and John Tosh, eds. *Manful Assertions: Masculinities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outledge, 1991.
- Scott, Joan Wallach.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Rev.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hannon, Richard. *Gladstone: God and Politics*.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7.
- Sussman, Herbert. *Victorian Masculinities: Manhood and Masculine Poetics in Early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homas, Keith.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Thompson, Edward Palmer.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66.
- Thompson, Francis Michael Longstreth.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Tombs, Robert.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 Tosh, John.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1861-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Vance, Norman. *The Sinews of the Spirit: The Ideal of Christian Manlines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Thought 1885*. Repri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Watson, Foster. *The Old Grammar Scho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6.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choff et 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 *The Vocation Lectures*. Edited by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Translated by Rodney Livingstone. Indianapolis, IA: Hackett, 2004.
- Windscheffel, Ruth Clayton. *Reading Gladston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Winstanley, Michael J. *Gladstone and the Liberal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Woodham-Smith, Cecil Blanche. *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1849*. 1962. Reprint, London: Penguin, 1991.
- Young, Linda. *Middle-Class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ustralia and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二)論文

- Barclay, Katie. "Performing Emotion and Reading the Male Body in the Irish Court, c. 1800-1845." *Journal* 123



- of Social History* 51, no. 2 (Winter 2017): 293-312.
- Clark, Anna. "The Rhetoric of Chartist Domesticity: Gender, Language, and Class in the 1830s and 1840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31, no. 1 (January 1992): 62-88.
- Cohen, Michèle. "'Manners' Make the Man: Politeness, Chival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1750-183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312-329.
- Curtin, Michael. "A Question of Manners: Status and Gender in Etiquette and Courtes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no. 3 (September 1985): 395-423.
- Ellis, Heather. "'Boys, Semi-Men and Bearded Scholars': Maturity and Manline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Oxford." In *What is Masculinity? 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ited by John H. Arnold and Sean Brady, 263-282.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Fisher, Walter R. "Gladstone's Speech at Newcastle-on-Tyne." *Speech Monographs* 26, no. 4 (1959): 255-262.
- Godfrey, Sima. "The Dandy as Ironic Figure." *SubStance* 11, no. 3 (1982): 21-33.
- Goldman, Lawrence. "The Defe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Endowed Schools Act, the Liberal Party, and the 1874 Election."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Victorian Britain: Essays in Memory of Colin Matthew*, edited by Peter Ghosh and Lawrence Goldman, 118-1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Hamer, D. A. "Gladstone: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Myth." *Victorian Studies* 22, no. 1 (Autumn 1978): 29-50.
- Harvey, Karen, and Alexandra Shepard. "What Have Historians Done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Five Centuries of British History, circa 1500-1950."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274-280.
- Harvey, Karen. "Craftmen in Common: Objects, Skill and Masculinity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Gende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600*, edited by Hannah Grieg, Jane Hamlett, and Leonie Hannan, 68-8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 Harvie, Christopher. "Gladstonianism, the Provinces, and Popular Political Culture, 1860-1906." In *Victorian Liberalism: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edited by Richard Bellamy, 152-174. London: Routledge, 1990.
- Heholt, Ruth, and Joanne Ella Parsons. "Visible and Invisible Bodies." In *The Victorian Male Body*, edited by Joanne Ella Parsons and Ruth Heholt, 1-21.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 Kesner, Ladislav, et al. "Perception of Direct vs. Averted Gaze in Portrait Paintings: A fMRI and Eye-Tracking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125 (August 2018): 88-99.
- Langford, Paul. "Politics and Manners from Sir Robert Walpole to Sir Robert Peel."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94 (1997): 103-125.
- Matthew, H. C. G. "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Politics of Mid-Victorian Budgets." *Historical Journal* 22, no. 3 (September 1979): 615-643.
- McCormack, Matthew, and Matthew Roberts. "Chronologies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Masculinities, c. 1700-2000." In *Public Men: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Matthew McCormack, 187-202.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McCormack, Matthew. "A Man's Sphere?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sculi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urope*, edited by Christopher Fletcher, Sean Brady, Rachel E. Moss, and Lucy Riall, 247-26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 Neal, Larry.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825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British Financial System." *Review* 80 (1998): 53-76.
- Quinault, Roland. "Gladstone and Disraeli: A Reappraisal of their Relationship." *History* 91, no. 4 (October 2006): 557-576.
- Richter, Donald. "The Role of Mob Riot in Victorian Elections, 1865-1885." *Victorian Studies* 15, no. 1 (September 1971): 19-28.
- Scott, Joan Wallach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December 1986): 1053-1075.
- Scully, Richard Joseph. "The Origins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s Nickname, 'The Grand Old Man'." *Notes and Queries* 61, no. 1 (March 2014): 95-100.
- Sicherman, Harvey. "Disraeli's Secre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7 (Spring 2002): 46-57.
- Stafford, William. "Gentlemanly Masculinities as Represented by the Late Georgian 'Gentleman's Magazine.'" *History* 93, no. 1 (January 2008): 47-68.
- Tosh, John. "Gentlemanly Politeness and Manly Simplicity in Victorian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12 (2002): 455-472.
- . "Masculinities in an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Britain, 1800-1914."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 no. 2 (April 2005): 330-342.
- . "Public History, Civic Engagement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Britain." *History* 99, no. 2 (April 2014): 191-212.
- .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An Outdated Concept?" In *What is Masculinity? 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Antiquity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ited by John H. Arnold and Sean Brady, 17-34.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 "What Should Historians Do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History Workshop*, no. 38 (1994): 179-202.
- Windscheffel, Ruth Clayton. "Politics, Portraiture and Power: Reassessing the Public Imag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In *Public Men: Masculini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Matthew McCormack, 93-122.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Wohl, Anthony S. "'Ben JuJu': Representations of Disraeli's Jewishness in the Victorian Political Cartoon." *Jewish History* 10, no. 2 (Fall 1996): 89-134.





附錄

一、 迪斯雷利、格拉斯頓與聯合王國政治事件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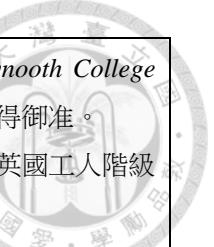
年份	迪斯雷利	格拉斯頓	聯合王國政治事件
1804	12月21日，出生於倫敦霍本區貝德福街國王路6號 (6 King's Road, Bedford Row, Holborn) 。		5月10日，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
1805			10月21日，特拉法爾加海戰。
1809	胞弟雷夫 (Ralph Disraeli, 1809-1898) 出生。	12月29日，出生於利物浦羅德尼街62號 (62 Rodney Street, Liverpool) 。	10月4日，史賓塞·珀西瓦爾出任首相。
1811			議會通過《攝政法案》 (<i>Regency Act 1811</i>), 威爾斯親王喬治成為攝政王。
1813	胞弟詹姆斯 (James Disraeli, 1809-1868) 出生。		
1815			6月18日，滑鐵盧戰役。
1817	在霍本區聖安德魯斯教堂 (St. Andrew's, Holborn) 受洗成為聖公會基督徒。就讀希根會堂 (Higham Hall) 。	長兄托馬斯 (Thomas Gladstone, 1804-1889) 進入伊頓公學就讀	1月，抗議《禁言法案》 (<i>Gagging Acts</i>) 的未審查激進刊物《黑矮星》 (<i>The Black Dwarf</i>) 出版。
1819	離開學校，在家自學。		8月16日，彼得盧屠殺。 12月，議會通過《六項法案》 (<i>Six Acts</i>)，限制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
1820			1月29日，久病的喬治三世駕崩，由攝政王喬治繼任，為喬治四世。
1821	成為倫敦市老猶太路弗雷德里克廣場 (Frederick's Place, Old Jewry) 一間著名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	就讀伊頓公學 (Eton College, 至 1827 年) 。	《曼徹斯特衛報》 (<i>The Manchester Guardian</i>) 發行。 承認墨西哥帝國於 9 月 28 日簽署的《獨立宣言》。
1822	12月13日，姓氏從 D'Israeli		

	改為 Disraeli 。		
1823	7 月至 8 月，家族旅遊，至溫莎。		10 月 10 日，與祕魯互設大使館。 12 月 15 日，承認《南美聯合省（阿根廷前身）獨立宣言》。
1824	7 月至 9 月，與父親、好友梅雷迪思（William George Meredith, 1804-1831）共遊低地諸國。 10 月，辭職事務所工作。		3 月 5 日，第一次英緬戰爭（First Burma War）爆發。
1825	3 月，撰寫數本小冊，鼓吹投資美洲礦業公司。 6 月，股票操作導致擔負鉅額（6000 銀）債務。 秋天，與默里、波爾斯合夥創辦日報《捍衛者》（ <i>The Representative</i> ）。	10 月 29 日，發表人生第一場演講，主題關於弱勢教育的補助與否。	4 月 18 日，與大哥倫比亞共和國互設大使館。 「金融危機」：4 月，股市泡沫破裂；8 月，大量銀行倒閉。
1826	1 月 25 日，《捍衛者》發行 4 月 22 日，《維維安·格雷》（ <i>Vivian Grey</i> ）第一卷匿名出版。 5 月，神經衰弱。 7 月 29 日，《捍衛者》停刊		在利物浦伯爵的領導下，托利黨以大幅增加（87 席）的多數贏得大選。
1828	6 月 3 日，《波帕尼拉船長奇航記》（ <i>The Voyage of Captain Popanilla</i> ）出版。	就讀牛津大學基督堂學院（Christ Church, Oxford University）。	
1829	迪斯雷利一家搬至海維康（High Wycombe）附近。		
1830	5 月 28 日，啟程和梅雷迪思至西班牙等地旅行。 8 月，於馬爾他遇見克雷（James Clay, 1804-1873）並同行，乘坐遊艇途經科孚島（Corfu）、雅尼那城（Yanina）、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卓、開羅等地。		6 月 26 日，喬治四世駕崩，由克拉倫斯公爵威廉繼位，為威廉四世。 11 月，輝格黨的格雷伯爵就任首相。

1831	<p>4月，《年少公爵》出版。</p> <p>7月19日，梅雷迪思在開羅因感染天花而過世，結束壯遊。</p> <p>10月23日，返回英格蘭。</p>	<p>5月17日，發表反對改革議案的演講。</p> <p>自牛津大學畢業。</p>	
1832	<p>4月16日，小冊《英格蘭與法蘭西：內閣高盧狂熱的解方》(<i>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i>)出版。</p> <p>5月15日，《孔塔里尼·弗萊明》(<i>Contarini Fleming</i>)出版。</p> <p>6月及12月，兩次代表激進派在海維康選區競選，皆失敗。</p>	<p>造訪義大利。</p> <p>12月，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紐瓦克(Newark)。</p>	<p>6月7日，《1832年改革法案》獲得御准。</p>
1833	<p>《阿爾羅伊奇譚》(<i>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i>)、《伊斯坎德爾的崛起》(<i>The Rise of Iskander</i>)、《遊歷天界的伊刻西翁》(<i>Ixion in Heaven</i>)、小冊《他所做為何？》(<i>What Is He?</i>)出版。</p> <p>透過亨麗埃塔·賽克斯介紹，接觸托利黨社群。</p> <p>撰寫《亨利埃塔·坦普爾》(<i>Henrietta Temple</i>)。</p>		
1834	<p>《冥界婚禮》(<i>The Infernal Marriage</i>)、《革命史詩》(<i>Revolutionary Epick</i>)出版</p> <p>3月15日，《選戰：在哈特伯里的一年》(<i>A Year at Hartlebury: or The Election</i>)出版，此書為迪斯雷利與胞姊 Sarah Disraeli [1802-1859] 合著。</p> <p>12月，最後一次代表激進派</p>	<p>12月，就任助理財政大臣(Junior Lord of the Treasury)。</p>	<p>7月，輝格黨的墨爾本子爵繼任首相。</p> <p>11月，托利黨的威靈頓公爵就任首相，組織少數政府。</p> <p>12月，托利黨的皮爾繼任首相，發表《塔姆沃斯宣言》(<i>Tamworth Manifesto</i>)，正式以「保守黨」取代「托利黨」。</p>



	在海維康選區競選，失敗。 競選演講《針砭時弊》(<i>The Crisis Examined</i>) 出版。		
1835	小冊《為英國憲政辯護》(<i>A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i>) 出版。	1月，辭任財政委員，就任戰爭與殖民地政務次官 (Under-Secretary for War and the Colonies) 。 4月，辭任政務次官。 姓氏由 Gladstones 改為 Gladstone 。	4月，墨爾本子爵就任首相
1837	《亨利埃塔·坦普爾》、《威尼斯》(<i>Venetia</i>) 出版。 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梅德斯通 (Maidstone) 。		6月20日，威廉四世駕崩，由肯特的亞歷山德麗娜·維多利亞郡主繼位，為維多利亞女王。
1838		出版《國家與教會關係》(<i>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urch</i>) 再次造訪義大利。	《人民憲章》(<i>People's Charter</i>) 出版
1839	8月28日，與瑪莉·路易斯 (Mary Anne Lewis, 1792-1872) 結婚。	7月25日，與凱瑟琳·格林 (Catherine Glynne, 1812-1900) 結婚。	
1840		出版《教會原則成效研究》(<i>Church Principles Considered in Their Results</i>)	2月10日，女王與薩克森-科堡-哥達的阿爾伯特王子結婚，為阿爾伯特親王。
1841	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什魯斯伯里 (Shrewsbury) 。和皮爾請求政府職位，未果。	進入皮爾內閣，擔任貿易局副主席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皮爾贏得大選，繼任首相。
1842	成為「青年英格蘭」(Young England) 領袖。		
1843		升任貿易局主席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1844	出版《科寧斯比：新世代》(<i>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i>) 。	推動《鐵路議案》(<i>Railways Bill</i>) 。	
1845	出版《西碧爾：兩個國家》(<i>Sybil: or The Two</i>)	2月，因個人立場反對《梅努斯議案》而辭職，但因黨	愛爾蘭大饑荒 6月30日，《梅努斯學院



	<i>Nations</i>)。反對《梅努斯議案》(Maynooth Bill)，該議案提議撥款資助愛爾蘭的一間天主教神學院。因此事件而與青年英格蘭決裂。	派立場而投票支持皮爾。12月，就任殖民地大臣(Colonial Secretary)。	法案》(Maynooth College Act 1845)獲得御准。恩格斯出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皮爾提議廢除《穀物法》
1846	5月15日，發表演講攻擊首相，稱其為「他人智慧的竊賊」(a burglar of others' intellect)。		皮爾政府垮臺。 6月30日，輝格黨的羅素勳爵就任首相。
1847	出版《坦克雷德：新十字軍》(Tancred: or The New Crusade)。 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白金漢(Buckingham)。	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牛津大學。	
1848	1月19日，父親去世。 買下位於海維康的休根登莊園(Hughenden Manor)		本廷克勳爵辭去下議院保守黨領袖職務。
1849	成為保守黨下議院領袖。		
1850		造訪那不勒斯。 與亞伯丁伯爵通信。	皮爾逝世。
1851	出版本廷克勳爵的傳記。		5月1日，萬國工業博覽會在倫敦水晶宮舉辦。
1852	2月27日，被任命為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12月17日，卸任財政大臣。表示「英格蘭不愛聯盟」("England does not love coalitions")	12月，發表針對迪斯雷利預算案的演講。 12月28日，被任命為財政大臣。	2月，保守黨的德比伯爵就任首相，組織第一次少數政府。 12月，皮爾派的亞伯丁勳爵就任首相，組織聯合政府
1853		首次提出預算案	
1854		5月，提出克里米亞戰爭預算案。	克里米亞戰爭爆發。 通過《1854年腐敗行為防治法》(Corrupt Practices Act 1854)
1855		2月28日，卸任財政大臣	皮爾派的帕默斯頓子爵繼任首相。
1856		聲援鄂圖曼帝國附庸下的	



		多瑙河公國（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應擁有「基督徒自決」（Christian liberty）。	
1858	2月26日，第二次被任命為財政大臣	愛奧尼亞群島特命高級專員(Lord High Commissioner Extraordinary for the Ionian Islands)	德比伯爵就任首相，組織第二次少數政府。
1859	6月11日，卸任財政大臣。	6月18日，第二次被任命為財政大臣	自由黨成立 6月，自由黨的帕默斯頓子爵就任首相。
1860		提出預算案。	1月23日，與法蘭西第二帝國簽訂《科布登－舍瓦利埃條約》(Cobden-Chevalier Treaty)，取消雙方主要貿易項目的關稅。
1861		提出預算案。	5月17日，《郵政存款法案》(Post Office Savings Banks Act 1861) 獲得御准。 12月14日，阿爾伯特親王去世。
1862		10月，至紐卡斯特等地舉行首次公開巡迴演講。	
1864		關於選舉權「憲政的蒼白」（“pale of the constitution”）演講	
1865		7月，競選牛津大學選區議員，落敗。 8月，在補選中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南蘭開夏(South Lancashire)。	10月，帕默斯頓子爵去世，自由黨的羅素伯爵繼任首相。
1866	7月6日，第三次被任命為財政大臣	5月，和羅素聯手推動改革議案，因黨內的亞杜蘭派拒絕支持而遭否決。 6月26日，卸任財政大臣	6月，羅素率內閣總辭，保守黨的德比伯爵就任首相，組織第三次少數政府
1867	推動通過《1867年人民代表權法案》。		8月15日，《1867年人民代表權法案》獲得御准。
1868	2月27日，成為首相，稱	競選西南蘭開夏選區議員，	2月，保守黨的迪斯雷利繼



	「我已攀上油桿頂」(I have climbed to the top of the greasy pole)。 12月1日，卸任首相職務，成為反對黨領袖。	落敗。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格林威治(Greenwich)。 12月3日，成為首相。	任首相。 7月31日，《1868年議會選舉法案》(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 1868)獲得御准。 12月，自由黨的格拉斯頓就任首相。
1869		推動《已婚婦女財產權法案》(Married Women Property Act)、《愛爾蘭教會廢除法案》(Irish Church Disestablishment Act)、《工會經費保障法案》(Trades Unions' Fund Protection Act) 8月，出版《世界青年》(Juventus Mundi)	
1870	出版《洛泰爾》(Lothair)。	推動《1870年愛爾蘭土地法案》(Irish Land Act 1870)、《基礎教育法案》(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發表〈日耳曼、法蘭西與英格蘭〉("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1872	稱格拉斯頓政府為「枯竭的火山山脈」("a range of exhausted volcanoes") 妻子去世。	推動《秘密投票法》(Secret Ballot Act)、《1872年公共衛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 1872)、《1872年基礎教育法案》(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2)	
1873		8月11日，兼任財政大臣	
1874	2月20日，再次成為首相。 推動《1874年工廠法》(Factory Act 1874)	2月17日，卸任首相及財政大臣職務。	2月，保守黨在選舉大勝，黨魁迪斯雷利就任首相。
1875	推動《食藥銷售法案》(Sale of Medicines Act)	自政壇引退，返回位於威爾斯伊士運河股份。	買進蘇伊士運河股份。



	<p><i>of Food and Drugs Act</i>) 、 《工會運動及財產保護法案》(<i>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i>)、 《勞動關係法》(<i>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i>)、《勞工住宅改善法案》(<i>Artisans' and Labourers' Dwellings Improvement Act</i>)、《1875 年公共衛生法案》(<i>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5</i>)。</p>	斯的哈登城堡。	
1876	<p>駁斥格拉斯頓的言論為「咖啡館裡的蠢話」(coffee house babble) 。</p> <p>推動《1876 年基礎教育法案》(<i>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6</i>)</p> <p>受封比康士非伯爵 (Earl of Beaconsfield) 。</p>	<p>9 月，出版《保加利亞面臨的威脅與東方問題》(<i>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i>)，譴責土耳其在保加利亞的暴行和迪斯雷利的親土立場。</p>	維多利亞女王成為印度女皇 (Empress of India) 。
1878	出席柏林會議，表示此行保證了「榮譽的和平」(peace with honour)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柏林會議，聯合王國獲得賽普勒斯。
1879		中洛錫安競選 (Midlothian campaign) ，巡迴公開演講	
1880	<p>4 月 21 日，卸任首相職務，成為反對黨領袖。</p> <p>《恩底彌翁》(<i>Endymion</i>) 出版。</p>	<p>當選國會議員，選區為中洛錫安 (Midlothian) 。</p> <p>4 月 23 日，再次成為首相。</p> <p>4 月 28 日，兼任財政大臣。</p>	4 月，自由黨在選舉大勝，自由黨的格拉斯頓就任首相。
1881	4 月 19 日，逝於居所柯松街 19 號 (19 Curzon Street)，留下未完稿《法爾科內》(<i>Falconet</i>) 。	推動《1881 年愛爾蘭土地法案》(<i>Irish Land Act 1881</i>) 為迪斯雷利逝世發表演講。	
1882		12 月 16 日，將財政大臣職務交予同黨的柴爾德斯 (H. C. E. Childers, 1827-1896) 。	
1883		推動《1883 年腐敗行為防治	



		法》（ <i>Corrupt Practices Act 1883</i> ）	
1884		推動通過《1884年人民代表權法案》	12月6日，《1884年人民代表權法案》獲得御准。
1885		推動《議會席次重分配法案》（ <i>Redistribution of Seats Act 1885</i> ） 6月9日，卸任首相職務。 12月，支持愛爾蘭地方自治	保守黨的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
1886		2月1日，第三次成為首相。 推動《佃農法案》（ <i>Crofters Holdings Act 1886</i> ）。 7月21日，卸任首相職務。	2月，自由黨的格拉斯頓就任首相。 因自由黨支持地方自治的立場而在大選落敗。 7月，保守黨的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
1892		8月15日，第四次成為首相。	8月，自由黨的格拉斯頓就任首相。
1894		3月2日，卸任首相職務並引退。	3月，自由黨的羅斯柏里伯爵繼任首相。
1895			6月，保守黨的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
1898		5月19日，逝於居所哈登城堡。	
1901			1月22日，維多利亞女王駕崩，由威爾斯親王愛德華繼任，為愛德華七世。
1902			7月，保守黨的貝爾福繼任首相。

資料來源：整理自 Douglas Hurd and Edward Young, *Disraeli: or The Two Lives*, xi-xiv; Michael J. Winstanley, *Gladstone and the Liberal Party*, ix-xi; Eugenio F. Biagini, *Gladstone*, 132-134; Chris Cook,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3-24.



二、 弗尼斯的素描

(一) 迪斯雷利

本節及下節所收錄圖片若未另外標註，則皆來自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為漫畫家、插畫家弗尼斯（Harry Furniss, 1854-1925）的作品，媒材為鋼筆和墨水。弗尼斯曾為《倫敦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及《潘趣週刊》（Punch）供稿，故與本研究採用材料具有相似性。素描可能脫胎自弗尼斯的一手觀察記錄，故人物的方向可納入參考：面容向左時為反對黨，面向右時為執政黨。

1. 編號 3339，半身像，站姿，向左，右手托起，左手劍指按桌。



2. 編號 3340，全身像，站姿，向右，右手微彎，左手托起。



3. 編號 3341，全身像，站姿，向右，上身前傾，雙手置於議事桌上。



4. 編號 6251(4)，半身像，坐姿，上身前傾，右手執筆書寫。

下方文字：「早年的班傑明·迪斯雷利」（B. Disraeli in his younger days.）
此作應為弗尼斯根據想像描繪而成。





5. 編號 3342，半身像，坐姿，上身微傾，背部靠在椅子上，呈睡眠狀。

下方文字：「迪斯雷利，地鐵上的素描」（Disraeli, A sketch from tube.）
並附有作者完整簽名。





6. 全身像，站姿，向左，上身前傾，右手置胸前，左臂及食指中指伸直。

此圖姿勢與正文圖五，弗烈德里克·史密斯描繪的迪斯雷利頗為類似。

來源：Harry Furniss, *Some Victorian Men* (London: Bodley Head, 1924), 219.



DISRAELI ADDRESSING THE HOUSE



(二) 格拉斯頓

本節所收錄圖片皆為弗尼斯於 1893 年創作的作品，風格分為寫實風和漫畫風，可透過比較兩種風格，捕捉漫畫的誇飾元素。以下將分組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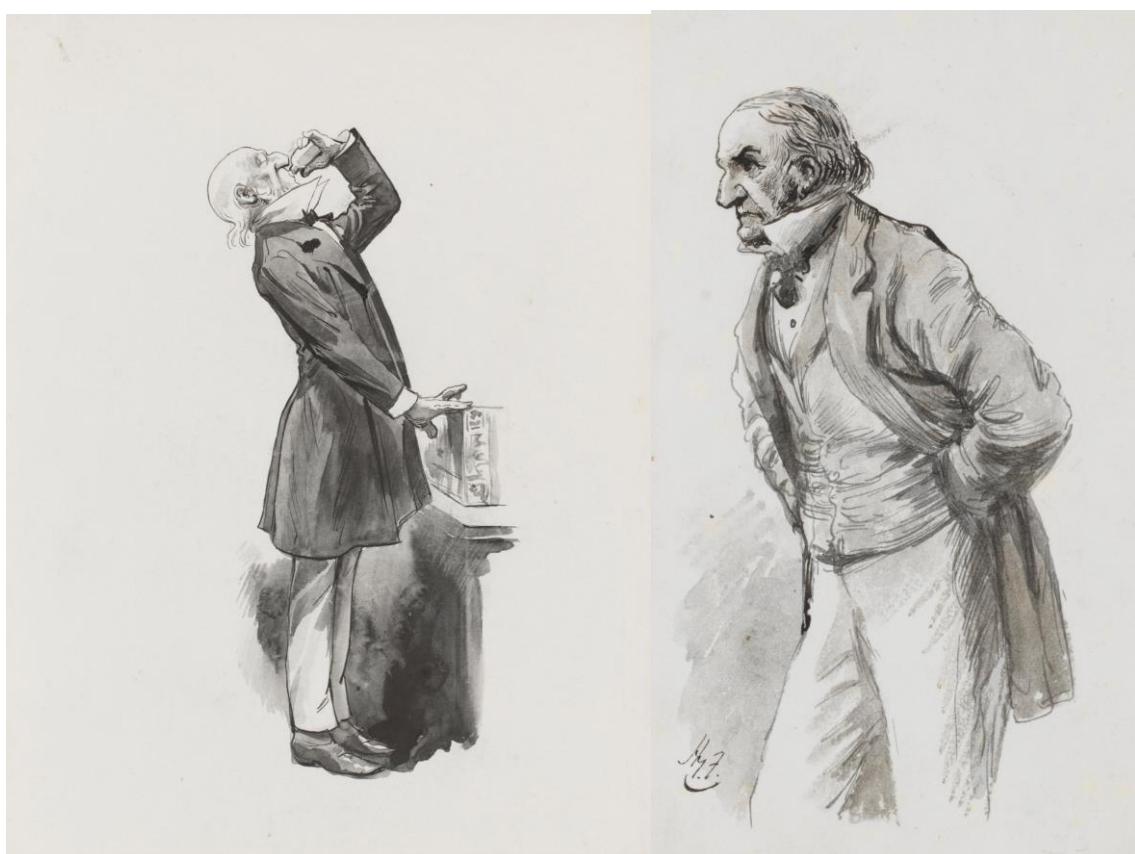
1. 編號 3372、3373、3374、3375，漫畫風，全身像，站姿，高舉單臂或雙臂，身體前傾或向上伸展，呈大吼狀。



2. 編號 3369、3370，漫畫風，全身像，坐姿，向右時直挺，向左時駝背。



3. 編號 3368、3377，漫畫風（左）及寫實風（右），全身像，站姿，飲水（左），雙手叉腰（右），呈休息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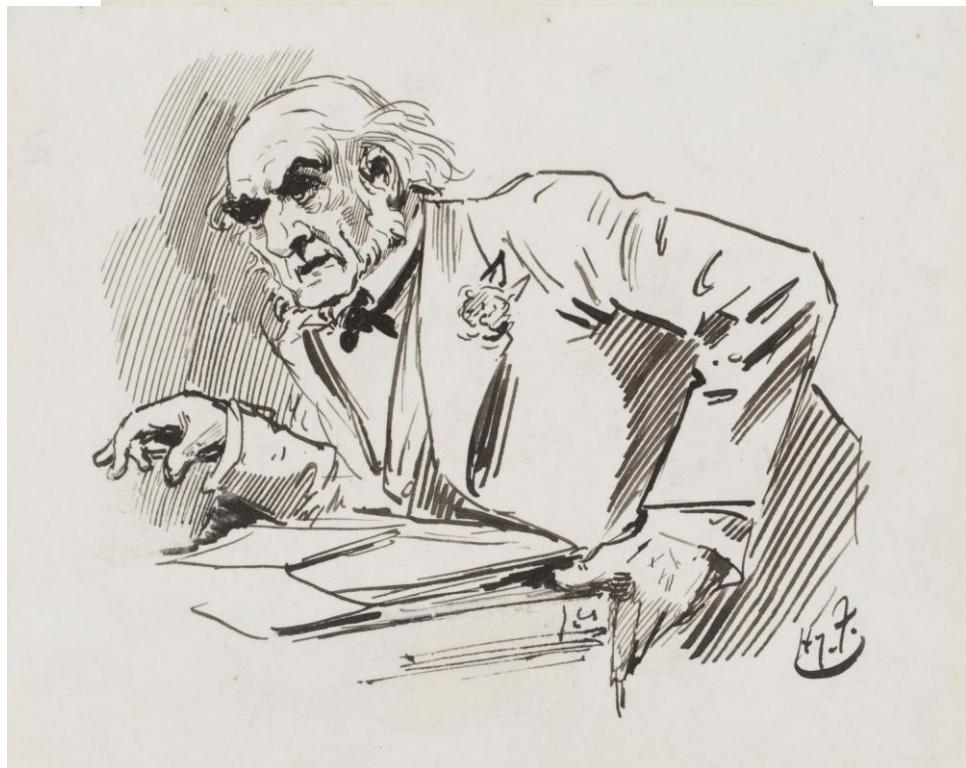
4. 編號 3360，寫實風，半身像，站姿，向左，雙手扶議事桌，做聆聽狀。



5. 編號 3367、3378，寫實風，全身像，站姿，於議事桌前傾，做辯論狀。



6. 編號 3363、3382，寫實風，半身像，站姿，於議事桌前傾，做辯論狀。



7. 編號 3387，寫實風，全身像，坐姿，上身微傾，以腿為桌做書寫狀。

